康生评传

仲侃

红旗出版社

康 生 评 传

仲 侃

红旗 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文内插画：丁　聪

康　生　评　传
仲　侃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88,600字
1982年 8 月第 1 版　1982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5,000 册
书号 3160·007　定价 1.15 元
（内 部 发 行）

前　　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锐利武器。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伪造，都是极端卑鄙的行径，都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康生以伪造马克思主义为业，长期裹着“理论权威”的外衣，行骗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革命队伍里，制造了大量的是非颠倒和思想混乱，把本来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变成了鞭挞无产阶级的大棒！以致成为毒害亿万人民的灾难！

康生不仅是个政治骗子，而且是个极端阴险毒辣的野心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败坏，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和间接的迫害，其数量之惊人，其手段之残酷，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罕见的。

康生的过去究竟怎么样？为什么他能长期骗取种种荣誉？人们至今不甚了了。为此，我们写了《康生评传》。它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而是侧重于康生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对他的思想观点，进行评述。不评不能辨别真伪，不能拨乱反正，也不能还其本来面目。当然，这也不是一本单纯的思想评论，大体上还是康生的政治传略，特别是他的权力膨胀的最后二十年的一些记录。

尽管康生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已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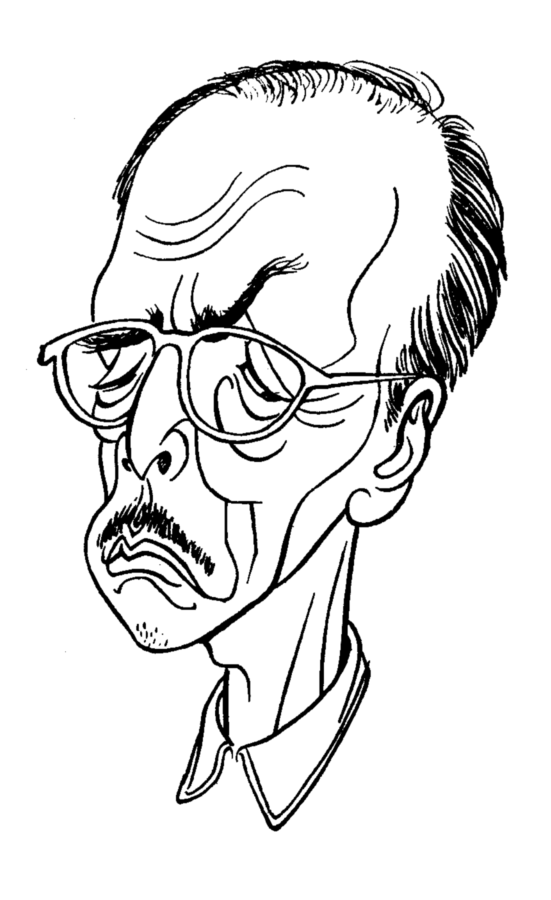
实际资料，尊重历史，如实地按照他的本来面貌介绍给读者。既然是对康生评传，就得力求符合他自己走过的路。

为康生写传的目的，是想通过康生这个以“左”倾面孔出现的典型，看一看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什么危害，以记取我们应得的教训。限于我们的水平，是不是实现了这个目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指正。

作　者

一九八二年

目　录



康 生

第　一　章

地主之家

马克思在评价巴枯宁时说过："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① 这一点用来评价康生，是非常恰当的。列宁在评价托洛茨基时说过："托洛茨基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② 这一点用来评价康生也是非常合适的。

你要知道康生的历史吗？这就需要从头说起。

康生，不是他的原名。他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一八九八年出生在山东省原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

张家的家族是当地世传的大地主。到康生的曾祖父时，有地二十五顷（每顷一百亩，每亩二点五市亩，共约六千余市亩）。土地主要分布在胶县大台、挪庄③ 和诸城的东公、小河北等村。大台、东公是张家的主要佃户村。张家的土地，除留少量种菜自用外，全部租佃给农民，以地租形式进行剥削。开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92页。

③ 大台、挪庄两村现在划归于青岛市胶南县。

每亩每年收租三斗六，[①] 另收公鸡一只，高粱秸或谷草一百斤。后来不收鸡、草时，方将地租改收为四斗。佃户除了交纳地租外，每亩每年还得交地钱（即地亩税）五角。当时，五角可买小麦半斗。这样，地租地钱合粮四斗半，约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收租时，先由庄头（二地主）将交租时间通知佃户，然后各佃户将租粮打晒干净，按时送到张家。虽然到康生父辈时，家庭经济状况略有下降，而且又分了家，但是康生之家仍有土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雇长工八人。这八个长工中，一人管帐，一人种菜，一人打杂，另外还有五个推磨、做饭、看孩子的女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了胶县、诸城县的时候。

张氏家住在大台庄，其实全村都是张家的家族。康生家宅四周又加了一道又高又宽的土围子，显示出大户寨主的森严。土围之外，依偎排列着既低矮又不能挡风避雨的佃户住宅。土围内外，显然是两个世界。

康生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吸着农民的血汗长大的，因而养成了地主恶少的生活习气。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民遭受压窄的境况，他是颇为熟悉的。他从幼年起，就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贵族，从家庭遗留下来的一切剥削阶级意识，没有得到过任何根本的改造，所以，后来在康生身上不断地得到表现。

康生之家又是一个所谓的"书香门第"。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已成了张家豪绅树碑挂匾的门风了。其实明传圣言，

① 一斗粮，在当时当地，若是小麦、大豆，有四十斤，若是谷子有三十五斤。

暗里狠毒。康生的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① 祖父辈弟兄两人，兄张抡元，弟张葆元（康生的祖父），皆为孔孟程朱之徒。其父辈弟兄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②，堂号"北树德堂"（康生的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康生的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康生的叔父）。到康生这一代时，人丁更加兴旺，只是亲弟兄就有四个，连同叔伯弟兄就是七个。他乳名张旺，大概由此而来。

康生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六。在亲兄弟中是最小的一个，是父母的宠儿，希望他能成为张氏家族财产和封建传统的继承者。尽管康生四岁时（一九〇一年），清朝光绪皇帝已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决定实施"新政"，九岁时（一九〇六年），胶县根据"新政"训令也开始设立师范讲习所和高等小学堂，但是，张家仍然承袭儒家之道，坚持让康生读家族私塾。为此，在一九〇六年特地为他请了塾师，专门讲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还有四书五经，向他灌输了成套的忠君孝道的地主阶级思想。

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康生读私塾读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古老的中国爆发了震撼中外的辛亥革命，结果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由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把帝国换成了民国，皇帝换成了总统。除此之外，一切传统，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至于张家这样的

---

① 贡生：是指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学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

② 廪生：是指明清两代称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

地主之家，也许有过一阵触动，礼节、服装有所改变。不过，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他家的匾额、堂号都不需要变动，“天帝君亲师”的牌位照样供在主房。就是胶县城里办起的“洋学堂”，张家也未于理睬。这样，康生在家一直过了三年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这三年中，他身着长袍，头戴帽头，后脑勺上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天天拉板胡、吹笛子、拜把子结兄弟，打架斗殴，采花盗柳、流氓成性，惹是生非。直到一九一四年发展到张家法规不容的地步，致使他的父母不得不将其关在家中不准外出。康生当时结拜的一个把兄弟陈舜庭①，竭力在其父母面前求情讨饶，一再保证放康生出来后，绝不再胡闹，准备同到青岛去上学。他的父母考虑到，长期关在家中也不是个办法，进洋学堂虽然担心染上违背封建传统的邪恶思想，但总可受到学校的一些管教，收敛一些野性。于是同意了陈舜庭的请求，放出了康生，并打发他同陈舜庭一起到青岛入了礼贤中学。② 为了进一步稳住他，他的父母还匆忙决定让他同胶县陈家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了婚③。

---

① 陈舜庭，“文革”前是山东济南三中校长。是康生 1911—1914 年在家结交的把兄弟，因而比较了解康生这段历史。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② 礼贤中学，解放后改为青岛九中。

③ 康生同陈宜结婚之后，生一女一男。女儿张玉瑛，曾嫁给诸城县孔各庄的一地主。不久离婚，进了青岛烟厂当工人。现已退休，闲住青岛。儿子张玉琨，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相依为命。解放后参加共产党。“文革”中，在康生支持下，同王效禹一起篡夺了山东大权。

第　二　章

在青岛礼贤中学

青岛是山东半岛的一个重要港口，也是我国近代史上首批遭到帝国主义侵占的重要城市之一。有必要对青岛和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作点简略的介绍，以了解康生在青少年时期，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影响。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的巨野被杀。这一事件，本来是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引起人民反抗的必然结果，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不敢支持人民的抗暴行动，反而随着列强轰传什么“巨野教案”（当时巨野属曹州府，也叫“曹州教案”）。事件发生后，德国政府借口教案，随即擅自派舰队司令棣利士率领巡洋舰四艘，海军六百余人直抵胶州湾，在青岛强行登陆，我国守将章高元，在李鸿章授意下，未开一枪，被迫退出李村，胶澳全部为德军侵占。德皇又派其弟亨利为远东舰队司令，组织第二舰队开到中国进行威胁；同时德使海靖向清政府提出苛刻要求，又是赔款，又是租借。

次年，即一八九八年，也就是康生出生之年，清政府派李鸿章、翁同龢与德使海靖订立了为期九十九年的“胶澳租约”。此约订后，德国加强了对青岛的统治，建筑港口，修

造船坞等等。租约规定，德国人有修筑胶济铁路之权，而且有在铁路沿线的淄川、坊子、金岭镇的采矿权，还有在沂州、沂水、诸城、昌乐、烟台五处的采矿权和沿海一带的捕鱼权等，几乎整个山东都成了德国控制的势力范围。胶南、青岛、诸城，也就是康生的家乡和他活动的地方，成了德国人侵略扩张的基地。

德国统治山东的政策，日本人有所评论。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外交时报》说：德租胶州，与俄、英不同，“山东诸要市，以胶州为中心，依铁道政策联结之，省中拓殖之权利，几全入其掌握，今且延于行政及警察之权利矣。”“华政府于山东之一举一动，皆受德人指使”。“山东之实权”，归德人矣。德人“以青岛为中枢，致力于山东之开拓”，“以山东全省为己之殖民附庸地”。“铁路之执事人役，华人居七、八，惟重要车站，则用德人。”“由是观之，乘火车者自青岛而赴山东，不能无山东已属德国之感焉。”日本人看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已垂涎三尺，正待机取代。

被统治的中国人民，怎样在德国人压迫之下生活呢？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日《北京官话报》，有一篇生动的报道，现摘录如下。

“自从开了青岛这个口子，招摇华人前去的千千万万，然只有德国的衙门，没有中国的衙门，人多事杂，若是犯了他的禁忌，任凭他德国人凌弱。其审问的时候，还不用下跪，行刑的时候，是用牛肾为刑具，里面贯一铅条，打罪人的两臀，当时受刑的苦楚自不必说，就是日后的刑伤也与别样的刑法不同，其伤纵横错落，深至二、三分，宽至四、五分，其色青紫，一辈子

也退不了去。打完了就押在黑房子里，不定是几年几月才能出来。平日被押的时候，还要给他做些苦工，到释放的日子，还要打他的递解，这便是从前的办法。近来更厉害了。审问的时候也要下跪，用刑的时候，不用从前的牛肾，要用大竹竿劈开，四面见方，约五、六分宽，劈开便用，不去刺，不去稜子，周日家浸在水里，掌刑的俱是外国人，每打一下，用力一拖，便教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还不许叫喊，不许动弹，若其罪该打十下的，或是痛极了叫喊一声，动弹一下，这就要另打，另打这十下，更加狠毒，大概前后这二十下，比中国的一千小板子还厉害得多啦！打完了给他穿上一半蓝一半白的褂子，上带号数，脚带镣锁，周日由黑房牵出做苦工。若该押黑房六个月的，先要割去发辫。做苦工的时候，有中国人当洋兵的跟随，有外国人监押，外国人身上带枪，中国人手中拿棍，些须一怠慢，就随便打骂，所以前年有一胶州人姓匡的被押后，含恨已深，一日在野外与他做工，乘其不备，用铁锨将外国人及当洋兵的打倒，约合众难友逃走，无奈数日之后又教洋兵捉住了，这一回捉住，就上机器铡了；这机器铡是预备着割头用的。列位曾听见说外国有割头的刑罚吗？有下跪的法度吗？有打四方竹板的吗？有押在黑房子里周日吃谷面的吗？唉！我中国人是那世的罪孽受外国人这样的荼毒呢！……这其中的缘故是有两桩：一桩因权操自外人；一桩因中国人吃洋饭的狗奴，把外国人奉承到极顶，所以教他作威作福，便是留他自己作威作福的地步……”

德国人在山东的这种暴行，引起广大人民的义愤和反抗。不能忍受德帝国主义的凌辱和迫害者，进行了英勇顽强

的斗争。

据一八九八年一月九日《申报》报道:“胶州华人中之强有力者,密约二百余人,于某日之夜,身穿短袄,手执长枪,乘德人不备,因风纵火,焚去德国营房两所,击伤德弁一员,迨天明始一哄而散。”

据高密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德人筑路至县境(高密),县民孙文率徐元禄、李金榜等聚众抗拒。夏六月,清廷命山东大吏杀孙文,李金榜下狱。(胶济铁路修至县境姚哥庄,有西乡官亭孙文号召柳沟河西一带,南自葛家集,北至车辋,共百零八村,首领耿家店徐元禄、徐元和、绳家庄李金榜、坊岭的王廷干、毛家庄张福广、杨克明、杨光与、刘效义、杨家庄杨志敬、杨纪瑞等,聚众与德人相抗。三月,清廷派胡景桂将孙文、徐元禄、李金榜、杨纪瑞等捕获,众抵抗益力,六月六日在五龙河不期而会者三千余人,冀围县城劫出孙文等。胡见民气汹涌,势不可遏,遂于即日杀孙文)

又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义和团起。九月,德军入县城,四出弹压,毛家庄,李家营、杜家沙窝等庄被德军焚杀甚惨。十月,德军退出县城,复在县北古城建筑营房,长久驻军。

当时帮助德人镇压者,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和臬台胡景桂。这些洋奴为了维护洋大人的权利,不惜与人民为敌,就象当时《申报》上所说的“宁全国人死,勿触外人怒”(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申报》)。尽管这些走狗和德国人一样凶狠地进行血腥屠杀,高密人民并没有因而屈服。当德军九月进攻高密西乡克兰庄时,用大炮轰击,杀害百姓三、四百人。德军攻打杜家沙窝时,全村起而反抗,虽死伤三百多人,但德寇也被打死二

十七名。当德军进城时，曾有一诗相传：

"可恨官员尽保洋，引来鬼子甚猖狂。

于今书院成兵院，昔日文场作战场。

号桌歪斜拴骡马，讲堂污秽牢牛羊。

门名通德真通德①，始悔当年兆不祥。"

这是德国侵占青岛后的情景。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借口，派兵接替德国人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控制了整个山东，就这样由德国人换成了日本人，奴役山东人民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为取得日本人的支持，竟以拍卖国家权益为条件。象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签订，特别是对山东的出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加上日本人在青岛和山东的侵略行为，比德国人更加残暴，当然，也同样引起了山东人民的强烈反抗。青岛，是工人集中的开放城市，自然也就成了反帝、反封的先进地区，革命总是随着压迫而产生的。有革命者，也有反革命者，有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怒目挺胸的反抗者，也有奴颜婢膝的乞求者，一边是勇士，一边是奴才。这在洋势力所及的青岛，是异常分明的。康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年，接受这方面的影响，是必然的。究竟康生在青岛接受了什么？那在他以后的行为中会逐渐地流露出来。

当然，还要看他所在的家庭对他的影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地主阶级并不完全遵守他们的旧礼圣规。尽管他们家里摆满了四书五经、文房四宝或

① 高密城西门名通德门。

者古玩古画，但对帝国主义的洋大人，却毕躬毕敬，对舶来品垂涎三尺。康生之家，除了固有的封建性之外，也尽量地追求买办性，对侵占青岛的德国帝国主义想方设法去靠拢。

礼贤中学是德国侵占青岛之后的第三年，即一九○○年由德国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卫立姆（Richard Wilhem）创办的。卫立姆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他为了加强文化侵略的效果，除了直接宣传基督教之外，还打起了信奉中国儒学的旗号，极力推崇儒学。他甚至为自己起了一个带有儒学味道的名字。其名叫卫礼贤，是从“礼贤下士”四字中取来的。其字为卫希圣，是从宋代儒家周敦颐所说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中取来的。他还将自己的中国之名命作他所创办的学校之名，起初称作礼贤书院，后来改称礼贤中学。

礼贤学校从创办时起就沿用了大清皇帝钦定的高等学堂章程，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四书五经”、“三纲五常”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体系。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作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学校为了防止反帝反封思想的渗入，特别强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规定学生不得与校外有任何来往，甚至不准学生看报，谈论国家大事。实际上，他们是借助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这一精神支柱，来培养会说德国话，能通西方技术，能为德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财服务的帮办。清政府于一九○六年，以“提倡读经有功，办校有方”为由，封卫礼贤为四品官。卫礼贤得意洋洋，立即穿上黄袍马褂，拍了照片，展览于“礼贤书院”的藏书楼（即现在青岛九中的图书馆）。后来，清政府垮台了，卫礼

贤还把清朝的遗老遗少，残渣余孽，召集在藏书楼供养起来，专门让他们谈经论道，发泄覆灭之恨。一九一六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会”。卫礼贤立即跑到上海去拜会，并捧上二十块大洋作为入会的会费。卫礼贤由上海回到青岛，还同前清三孙恭亲王、遗老劳乃宣、沙俄分子盖沙令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文社”。并且写信给前清皇室，声称代表德皇支持复辟。所以，礼贤中学一方面是个洋学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遗老遗少的黑据点。

康生进入礼贤之时，正是该校由书院改为中学之时，也是礼贤收罗清朝残渣余孽于藏书楼，搞尊孔搞复辟之时。康生进校后，入的是德语班。他在这里学了德语，接受了德国人的训练。这样，封建主义的教育和洋化的买办教育，在礼贤就融合在一起了。他通过礼贤中学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敛，封建思想大为增长，忠于大清王朝的思想有所巩固。这是他父母当初送他进礼贤中学时所没有料到的。无怪乎，他在谈到自己在礼贤中学的情况时，津津乐道地说：“我在青岛曾结识过宣统的老师陆润庠、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其实，这些人未必认识康生其人，但是从康生兴致勃勃的回忆来看，他当时对这些人确实寄于了无限的崇拜和敬仰。

但在礼贤中学，康生最为迷恋的不是孔教，而是洋教。他特别崇尚的是德国。康生冲破家庭的目的，是到德国人主办的学堂里，吸取洋化教育，以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点西方的色彩。经过礼贤的栽培，康生确实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还有奴化之道，这正是礼贤要

学生们日浸月染的。这一点，尽管康生从不向人宣扬，可是，他的处世作人之道，确实兼蓄混杂着中西奸诈之术，这不能不说是康生在礼贤的一大收获。

第　三　章

诸 城 七 年

一九一七年夏，康生这个纨袴子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回到了生身之地大台庄。

当时，北洋军阀正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处于公开分裂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排斥异己，扩张自己的实力；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则以英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与皖系军阀相对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盘踞东北三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他各省的大小军阀，也都拥兵自立，相互倾轧。再加上连年灾荒，致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贫困交加、动荡不安的牛马生活，逼迫人民进一步觉醒，他们继承了无法安身立命的奴隶传统，接受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此起彼伏地开展了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但是，也有为生活所迫，结伙为盗匪者。当时，绑票、抢大户极为盛行。大台庄南望重山叠岭，又距海岸很近，康生之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自然也就成为抢劫的目标。在康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返回大台庄的当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他的家遭到了土匪绑票。他的一个哥哥，正是在这次绑票中，准备爬墙逃跑时，被打死了。经过这次抢劫之后，

康生全家搬离了常年居住的大台庄，到诸城城里避难去了。

诸城县城是他外祖父的祖居之地。但是，张家全家到了诸城并未投奔外祖父之家，而是借助于外祖父的帮助，另行建造房舍。地主造房，无论地点，还是样式，都需要门户相当，不然，县衙和豪绅是不许的。康生之家，虽原属胶县，但在诸城，亦不陌生，所以，他家的房宅很快落居在诸城中心，按照张家的权势和传统，成了诸城名门。这所住宅，除了正房一排之外，东厢六间，还有两层小楼一座。临街有个坐北朝南的门楼，不用专挂牌号，人们就会知道这是豪绅之家。他家的全部经济来源，同过去一样，仍靠农民来供养。

康生到了诸城，改名张裕先，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山东半岛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德国人未走，日本人就来接替。随着时局变化，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思潮传到诸城。此时，康生作为一个青年，也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一年后毕业，改名张叔平，到县立高等小学教书。他在诸城共待了七年。

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江青相识。江青，原名李云鹤，乳名李进孩。其祖父李纯海，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其父李德文，阴险毒辣，贪得无厌，被人称为"李狼贼"。他先是经营旅店木匠铺二十多年，后来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租盘剥。其母是个臭名远扬，心狠手毒的二房小老婆。江青小时，家景已经破落。康生初到诸城时，江青刚上小学，康生离开诸城去上海时，江青小学已近毕业。从年龄上说，康生当时是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江青是七岁至十四岁。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江青上小学，每天路过张

家门口。一为活跃少女，一为富户阔少，一攀一求，自然各取所需。从康生的家门口到江青家门口，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张家居城中心的南街，江青家居东关。两家相距远近，且不必说，反正两人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说他们两人当时相识，已经怀有某种政治目的，那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他们两人相识，恐怕当时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到后来他们互相利用，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那么多政治丑剧，犯下那么多祸国殃民的大罪。但是，也不容否认，他们俩这时的相识，也确实为他们后来的肮脏勾当搭了桥，奠定了基础。

应当承认，康生在诸城这七年，同他在大台庄生活的二十年相比，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诸城七年虽然继续接受着地主家庭的影响，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社会上的影响已经不同于大台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的失败，却为日本取代德国在青岛的势力创造了条件，被侵占被掠夺的仍然是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离青岛不远的诸城人民的不满。

康生到达诸城的第二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虽然也是个战胜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不但不理睬中国关于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等项强烈要求，反而把德国在华的一切权利全部移交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北京五千多学生不顾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英勇举行了五四游行示威。诸城靠近青岛，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积恨已久。当五四运动在京爆发的消息传到诸城，反日救国运动立即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县开展起来。从县城到集镇、乡村，从学生到教师，从农

民、商人到政府职员，几乎席卷了各个地方，所有的青年人都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在诸城县开展的强烈程度，参加人之多，涉及面之广，真是诸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使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济南市学生联合会曾派代表到诸城县指导运动。到诸城指导运动的学生代表中就有后来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的王烬美同志。他热情赞扬了诸城县的学生行动，嘱咐学生们要把运动坚持下去，以求确实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代表们走后，学生们立即掀起反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他们废寝忘食地写发言稿，编写快板、小调、大鼓书，先在诸城县各城镇进行宣传，后又分组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宣传中，学生们作讲演，写传单，恳切动听，慷慨激昂，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使人们深深受到教育，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反日救国的决心。康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诸城县发生的这次如此强烈、广泛、深入的革命运动，因而，确实受到了较深的影响。过去，康生是一个在列强瓜分中国面前，麻木不仁；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面前，无动于衷；在人民起来革命之时，冷眼旁观的人。但通过这次运动，总算在他身上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五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我们既不能否定这一革命运动确实给康生以较深的影响，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但是，又不能夸大这种影响，认为这种革命运动是他背叛家庭，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我们顺便评述一下，康生谈及五四运动对他影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他向新西兰的著名共产党人讲的。他说："一九一九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我

的地主家庭决裂了。当时我受到了反帝运动和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我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我原来姓张，这时改叫康生。以后，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几年，所以，虽然我是山东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故乡。”

这段话纯属康生为了美化自己而编造出来的。第一，所谓“参加了五四运动”之说，起码迄今还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实际情况，他只是亲身“经历”了或“目睹”了，而不是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退一步说，就算他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充其量也不过是摇摇小旗，呼呼口号而已。自称“参加了五四运动”，显然是一个夸口之言，目的是想给人造成一个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假象。第二，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之说，也不属实。据可靠材料证明，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刊物《济南劳动》周刊和《山东劳动》周刊，是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前后才创办的，而且这些刊物主要销于济南、青岛等几个大一点的城市。是否有少量流入诸城，是否影响到康生，现在无据可考。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无非是欺人之谈。第三，所谓“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之说，纯属撒谎。康生硬是这样说，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康生把家庭当时对他的威吓之言拿来当事实表述；另一种可能是将他少年时，因打架斗殴被关在家里不准外出的丑事拿来进行加工而成。第四，所谓“公开声明脱离家庭”之说，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他离家去上海大学，那是五四运动之后第五年的事。离家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五年暑假，还同孟超、李宇超二人结伴同行回家看望过。而且在整个上海大学的学习期间，其经济来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给。至于

"改叫康生",那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之后的事。①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其家庭早就"划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说,他除了只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儿子张子石有联系外,同地主家庭毫无来往。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指出,康生的地主之家,几经变迁和父母的双亡,到解放前夕完全由其前妻和一儿一女维系着。他们相依为命,浑然一体。既然同儿子张子石来往密切,怎么能说同其家庭毫无来往呢!的确,康生同前妻联系是少些,然而这并非因为前妻是地主婆的原因,很大可能是由于有了曹轶欧的关系。再说,康生同其子张子石联系密切,也绝非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事实上,张子石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诸城后,随其母搬入青岛靠收租为生。后来,直到解放前夕,一直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九四八年九月,康生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时,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才将其儿子引进解放区,参加了工作,随着也就参加了共产党。这就是说,"联系"在先,"入党"在后,而不是"入党"在先,"联系"在后。其实,假若站在革命立场上,将自己地主出身的儿子引向革命,培养入党,根本算不上同家庭划不清界限。可是康生为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家庭"划清了界限",连"入党"与"联系",那个在先那个在后,也要违背历史事实地颠倒一番,可见,他真是用尽了心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改变

---

① 康生于"五四"运动之后改名为张叔平,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后又改名为张沄(又写作张耘)。一九二八年改名换姓叫赵容。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了苏联之后才改姓换名叫康生。

的，走什么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不能说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决定了他一生只能反动。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已有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走向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要走向革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彻底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即使参加革命之初还不能彻底背叛地主家庭的话，那么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对于这一点，康生大概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是在真正背叛上，也就是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而是在编造"背叛史"上下功夫。然而，编造的"背叛史"毕竟不会成为事实的。

总之，康生在诸城的七年中，一方面过着富足悠闲的阔少爷生活，继续接受和扩大着地主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



康生在诸城的住房

开始接受社会的，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其内心上唤起了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起码具备的反帝爱国之心。后一方面的影响，对于康生在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可能起了重大作用，① 但是不能把这一影响当作背叛家庭的标志。事实上，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康生在当时并没有背叛家庭，而且也没有想背叛家庭。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了背叛家庭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然而始终也没有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因而，地主家庭的影响一直象幽灵一样，缠绕着他，发挥着作用。了解这个历史事实，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康生所作所为是有帮助的。

① 关于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因为在家赌钱输光了被家里撵跑的，也有的说，因为同其父亲的小老婆耍流氓，被其伯父打跑的。

第 四 章

在上海大学

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离开了诸城，改名张沄（又写作张耘），到上海入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勾结又互相矛盾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最先觉悟、革命力量集结的地方。一方面是黑暗和腐朽在积聚；另一方面则是新生和战斗，革命在发展。这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熔炉。自从外国侵略者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个十里洋场，充满了各色人物，有开银行、剪息票的老板代表各种势力的政客和拥有兵力的军阀，有青红帮头子、特务和流氓，也有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者。当然还有外国资本家、冒险家、投机者以及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没有祖国的亡命徒、杀人越货的海盗，如同嗜腥逐臭的苍蝇，从遥远的异邦滚滚而来，在“领事裁判权”的大纛下面接踵而至。他们都把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当作最后的逋逃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一支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这个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交错

下，为革命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为中国共产党设立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方便。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它是一九二三年初，趁闹学潮之际，将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由于当时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推举国民党老党员于右任① 当了校长。但是于右任不过是挂挂名而已，实际上，学校完全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学校创办之初，李大钊同志就到校讲话，为学校制定了教育方针，建议设置社会科学、中国文学、英文文学三个系，推荐邓中夏、瞿秋白两同志分别就任总务长和教务长。邓、瞿两同志到校后，掌握一切校务，完全按照党的要求经管学校。虽然，该校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被蒋介石封闭了，但是在其存在的四年光景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

康生一到上海很快进入了上海大学。他之所以要进上海大学，一方面是他在诸城受到新思潮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靠先进分子的引荐，再加上他的经济来源不足，而上海大学学费低廉又不需要严格考试即可入学。他进了上海大学，从此进入了革命队伍的大门。

康生在上海大学入的是社会科学系。社会科学系的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史等。社会科学，由施存统主讲，课本是安体诚编的社会科学讲义。辩证唯物论，先由瞿秋白主讲，后由萧朴生主讲，课本自编。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

① 于右任是李大钊同志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由李季[①]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本用的是李季自己编写的《马克思及其生平著作和学说》；政治经济学课本用的是德国博洽德著的《通俗资本论》。社会进化史则是以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为课本，由李汉俊主讲。多数教员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和颜悦色，真诚待人，常和同学促膝谈心。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政治、思想方面给学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正课之外，全校每月总要举办一两次关于政治形势的自由讲座，各班级也要分别组织几次学习会。学习会上，有时就学习中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报上的某些政治消息谈些看法，有时就期刊上的某篇文章进行座谈。总之，学习会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很受同学欢迎。

这所大学同别的大学相比，有个显著特点：革命书刊广为流传，革命空气甚为浓厚。上海书店特地在该校设了个书摊，摆了许多《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期刊，还有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和文艺书籍。同学们都踊跃争购争看，受其影响很大。该校从一开始就提倡把所学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同学们不是关起门来读死书，而是经常深入工厂、街道、学校、机关，搞宣传，办夜校，积极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至于同学之间，更是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学校的党团活动也极为活跃，不少革命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不断地被吸收到党团组织里面来。所以，上海大学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有不少老革命者经过上海大学的学习，才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懂得

---

① 李季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了社会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康生在这所大学里生活学习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过革命理论的灌输和革命空气的熏陶，取得了生平以来的最大收获。康生在上海大学所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康生在到上海大学之前，只有某些反帝反封的爱国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进了上海大学，在先后听了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接触了一些新思潮之后，感到马克思主义很新鲜，很时髦，确实与他过去所学的那一套不同。在当时，他如同信仰过孔学、德国洋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信仰崇拜之心。

第二，投向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随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康生在入学半年之后，即一九二五年初，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康生究竟怎样入党？经谁介绍入党？履行了些什么手续？现在尚未查清。对于这个问题，康生自己先后有三种说法：一说是经陕西人王友直（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介绍入党。然而，王友直在延安时就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介绍康生入党呢！”一说是经李畔缓介绍入党。李也极力否认。又一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虽未直接否认，但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康生对自己的入党情况如此交待，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之嫌了。但是，不管是真入还是混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按当时康生的状况，他并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的组织在当时也不那么严密，这就成了一方有心，一方无意的状况。

第三，接触了上海社会，受到了一些实际工作锻炼。康生

在进上海大学之前，虽然曾经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思想上有过一些变化，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地主之家的浪荡公子，他在五四运动中所唤起的一点进步思想并没有见诸于行动。到了上海大学，就与前有所不同。在这里，他一面学习了革命理论，一面又参加了深入工厂、街道搞宣传、办夜校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受到一些锻炼。

上述收获，当时对康生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使之对革命做了些工作。他加入共产党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在这次罢工中，他同工会干部和义勇队（后来改为纠察队）歃血为盟，曾经宣誓："反对东洋到底，不沾面子不复工，拥护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如有假心，天雷打死"。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五月三十日发动一次有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反帝大示威。康生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五卅运动之后，他到上海总工会当干事。一九二六年回上海大学任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十月二十四日，曾组织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初，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此间，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康生一再宣传的，确实也是康生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关于他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康生曾经专门写了回忆文章。他写道：二十日早七时，他得到江浙区委关于发动起义的指令，立即通知他所管辖的沪东区的工厂、作坊、

商店、报馆、电车、邮政局等党支部，工会的纠察队负责人和市政交通总工会、印刷业总工会、洋务总工会等党团书记，于八时整在法租界西门路西门里的房子里开紧急会议，传达落实江浙区委指示。接着，他于十时赶到闸北，向起义总指挥罗亦农、赵世炎请示任务。赵指示他："与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击五区总警署，得到武器后，进击北车站。"下午二时，他带领沪东武装开始攻打五区总警署，四时拿下。接着带领队伍向北车站进发，协同其他区的武装，共同攻打北车站，直到二十二日晚六时，攻克北车站，起义获得成功。当日夜十一时，同沪西区委书记佘立亚一起赶往广东街向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报告起义经过。① 康生这段回忆，虽然有美化自己之意，但是他作为一个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却是真实的。

康生一生干尽了坏事，但是公平地说，康生在上海大学阶段，可说是他一生中表现较好，对党确实做了些有益工作的时期。不过康生自己是从不谈及这段历史的。他为什么对这段历史默而不宣呢？我们细细查看其言论，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他将这一时期他所发生的转变，偷偷地移置到五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去了。② 他之所以作这种移置，显然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受五四运动影响而背叛地主家庭走向革命的我国首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篡改的历史，毕竟不是真实的。

---

① 见康生《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回忆》(1937年 3 月)。载1937年 3 月21日巴黎《救国时报》。

② 见1965年10月 9 日，康生同一个代表团的谈话。

第五章

首次投机成功

一九二七年四月，正当北伐军胜利地抵达长江流域的时候，原来钻到革命队伍并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却自食其言，背叛革命，转到了江浙财团的怀抱，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了血腥的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当时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再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对蒋介石的反动，既丧失警惕，又缺乏有力的及时的反击，客观上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派，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坚决反对，也撕下“左派”外衣，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革命，并同蒋介石达成反共协议，实现了“汪蒋合流”、“宁汉合作”。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彻底失败，全国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在这种考验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没有被吓退，他们掩埋了同伴的尸首，从血泊中，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幸免于死难的共产党员又继续战斗了。当然也有共产党员彷徨、消极、颓废、沮丧、落荒而逃，甚至叛变。还有人虽然留在党内，却做起投机生意来，康生就是这种人。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决定将白区党转入地下。组织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原来的江浙区委予以撤销，宣布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随之，康生当上了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底，康生同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曹轶欧结了婚。至于他原来的老婆和孩子，也就不了了之了。曹轶欧同样丢了原来的丈夫，才同康生结婚的。一九二八年秋冬，康生调离基层区委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本来，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党的信任和自己责任的重大，然而康生却把这当作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地主家庭中那套勾心斗角的伎俩，康生在二十多年中，见得多，体验深，用得也熟练，搬到党内，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这样就为他以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从此，康生改名换姓叫赵容，为了攫取党内更高更大的权力，开始了他在党内要阴谋、施权术、搞投机的历史。他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康生从自己混迹上海，混迹党内的一些消极经验中总结了一套往上爬的秘诀，这就是：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捧谁；谁说话顶用，就靠谁。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既批判了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瞿秋白同志的“左”倾错误，明确指出，当时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大会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情况下，选举向忠发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由于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说话粗野、开口骂

娘，所以，此后一段时间内，党内的实际大权操在了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同志手中。这样，李立三同志就自然成了康生跟、捧、靠的目标。当时，李立三同志为了巩固领导地位，积极寻求支持者，以形成“左”倾力量，因而极力争夺对党中央所在地——江苏省委的控制权。而身为江苏省委委员兼省委组织部长的康生，观察到了领导的这种意图，当然不会坐失良机的，因而使出了他在地主家庭中长年养成的压别人抬自己的逢迎手段。

由于康生投领导所好，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表现了“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上立了“功”，很快于一九三〇年二月被提拔到中央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对于李立三和后来的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和推行，都非常卖力。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有个过程，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方才使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同志就同李立三同志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立三“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后，又受到江苏省委后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先后在中共江苏省党代会上，五月全国苏区代表会上，特别是九月一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多次反对立三“左”倾错误，批评李立三和中央局夸大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盲目推行城市暴动计划，拒绝在工会和群众团体中进行合法斗争，取消青年团和工会独立组织以及对红军只强调扩

大不重视建设等错误。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反对声中就是不见康生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反对，所能见到的只是他对立三“左”倾错误的追随、拥护和支持。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立三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至此，康生才迅速转向，并为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但是，康生投机之心并未收敛，不久又选中王明作为自己跟、捧、靠的目标。

王明，原名陈绍禹。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由于受到中大副校长米夫① 的赏识，被委任为中山大学学生支部局副书记（书记是苏联人）。不久，他利用职权，纠集了一个所谓“二十八个半”的小宗派，不顾多数中国学生的反对，打着清算陈独秀家长制的旗号，大肆反对中共旅莫支部对中大学生支部局的领导，极力主张中大学生支部局由联共（布）莫斯科区委直接领导。一九二七年，苏联开展反托清党运动，王明就利用这场政治斗争，将不同意他意见的人，同托派观点联系起来，大反所谓“托派”。结果，不少中国学生被定为托派分子或托派嫌疑分子。一九二八年夏，王明作为翻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共中央

---

① 米夫：1926 年曾作为共产国际赴华代表团成员到过上海。1927 年返回莫斯科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28 年原中大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清除出党后，米夫继任校长。

领导人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联共(布)领导人的接触活动，了解到许多情况，于是更加狂妄，根本不把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本本”读得少，马列主义水平低，连什么是革命高潮都不懂，因而没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真是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六大”之后，瞿秋白同志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此间，他根据中大学生的申诉，对中山大学的反托扩大化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中大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然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是以是否无条件的拥护他们的反托斗争作为衡量左中右的政治标准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对瞿不满，认为以瞿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中山大学的反托斗争持调和态度，政治上是右倾，干扰了联共(布)的政治斗争。王明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地反对以瞿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这样，王明就被共产国际看作是中共党内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新生力量”和“斗争干部”，并于一九二九年夏派遣回国，妄图让他替代当时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

王明回国之时，正是康生一味投靠李立三之时。当时握有实权的李立三根本没有理会共产国际将王明留在中央的意图，而是直接将他分配到一个基层工厂(即浦东区南洋烟厂)去作党的支部书记。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根本不知道王明回国是奉命而来的，更没有想到王明后来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神通”，因而也不把正在基层工作的王明放在眼里。不仅不放在眼里，而且还积极支持李立三在一年之内先后给他两次组织处分。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原因是王明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因参加上海闸北地区的一次秘密集会而

被捕后，他为了急于取保出狱，竟把党的秘密机关直接告诉巡捕。幸而机关及时转移，未遭损失。为此，待王明被保释之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政治警惕，严重违犯秘密工作纪律为理由，决定给他警告处分。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原因是王明等四人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公开批评了作为立三“左”倾错误标志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从而触怒了李立三同志，李当场给他扣上“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子进行压制。之后不久，又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今天看来，这两次组织处分，第一次是正确的，第二次是错误的。说第二次是错误的，当然不是说王明据以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理由是正确的。实际上，王明的主张同立三的主张并无两样。早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即对王明进行第二次组织处分之前四个月，王、李两人曾在《布尔什维克党》杂志第四十五期上同时发表文章①，各自阐发过自己的观点。两文相比，除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不平衡以及“第三时期”的认识上有些不同外，在中国革命任务与当前形势的估计上基本相同。他们都主张攻打大城市，很快夺取武汉；他们都混淆两个革命阶段，把武汉的夺取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式开始”；他们都认为当时主要危险是右倾。尽管后来他们相互攻击为“右倾”，但实质上他们都是“左”倾。要说区别的话，就是王明比立三更“左”。王明之所以反对立三，就是认为立三“左”得不够。可见，王明反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据是完全错误的。然而，王明反对立三“左”

① 李立三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新的革命高潮前的诸问题》；王明发表的文章，题目是《目前的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倾错误的意见是在中央工作人员专门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会议上发表的。按照组织原则，这应当是允许的。因而对王明进行组织处分是错误的。我们这里着重提到对王明的两次组织处分，主要不是为了评断它的对错，而是为了说明康生当时确实还没有把王明看在眼里，投向王明。其所以如此，当然是由于王明当时在中央还没有掌握实权的缘故了。

然而，自从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再次来华①之后，特别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来信之后，王明的处境和地位，却发生了突变。

首先，王明利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把自己打扮成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即《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其主要内容是批评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是路线错误；批评六届三中全会包庇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此信传到中国，首先落到了米夫手中。米夫在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之前，先将信的内容透露给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此之前，当因反对立三路线而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的时候，王明曾积极写过悔过书，以求宽恕；当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立三“左”倾错误的时候，王明也曾表示衷心拥护，未提任何异议。直到十一月十三日，在向中央政治局递交意见书时，王明还在说：“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立三路线只剩下残余了”，“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存在”等等。可是，待他从米夫那里得知了共产国际

① 米夫曾于1926年来过中国。

十月来信的内容之后，态度大变，立即打起“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反起“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来了。并且用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个所谓《两条路线》的小册子①，系统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其实，他的主张不过是在新形态下，继续、恢复和发展立三路线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罢了。

第二，利用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所受的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竭力抬高王明的身价。在米夫的坚持下，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等四同志的处分的决议，说王明等人反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立三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并加以“小组织”的罪名，给予党纪处分，都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政治局，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这一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绍禹同志对立三路线不调和斗争的责任”。这个决议，提高了王明的政治身价，使他进一步获得吓唬人的政治资本，气焰更加嚣张，大有天下非我莫属之势。

第三，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挤进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握了中央实权。本来，四中全会之前，中央已经决定分配王明到苏区基层去工作，他就是不去；后来，又把他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还是不干。说什么他非要等着召开四中全会，改选了新的中央领导再说。结果，真的挤进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会期只有一天（十五个小时）。会议从头至尾由米夫包办。会议一开

① 《两条路线》于 1932 年 3 月在莫斯科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始，米夫就在报告中大捧王明等人，说这些人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的”，是能够将“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的”。强调四中全会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中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十分明显地表露出要拉王明进中央政治局的意图。到会议快要进行选举时，米夫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包括王明在内的九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并规定凡是到会者都有选举权。对此，许多与会者深表不满，有的甚至愤然退席。但是米夫仍然坚持继续选举。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当选。这次会议之后，总书记虽然仍由向忠发担任，但实权却操在了王明的手中。

康生作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特别是作为四中全会的参加者[1]，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所搞的这一不正常活动。对此，他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王明虽然处境十分孤立，但是后台硬，有实权。因而，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立刻由全力支持李立三转而全力支持王明。这对于当时处于十分孤立状态的王明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支持。王明当然也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全力支持了他的康生，于是立即提拔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假若说，由于支持立三改组江苏省委之“功”，使康生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话，那么这次又由于支持王明获得中央大权之“功”，使他更进一步在中央掌握了一个要害部门。

---

① 康生是作为大会记录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

第 六 章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吹鼓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同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便直接接任了党的总书记。此时，由于白色恐怖，王明如同惊弓之鸟，一直躲在上海郊区一所疗养院里不敢出来。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被破坏，王明更加胆战心惊，于是辞去总书记之职，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沪赴苏，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总之，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四年之中，不管王明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也不管他任总书记，还是充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实权都一直操在王明手中，王明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

在王明路线统治的四年之中，对康生来说，可说是十分重要的时期。此时，他获得了王明的信任，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同王明分掌了领导大权。就是王明路线结束以后，康生的实际权力还延续了多年。

康生对这段显要的历史，曾经写下连篇累牍的记录，深怕别人忘掉他对王明路线留下的业绩。可是，从四十年代起，随着形势的变化，康生却一反常态，对王明不是怒斥漫骂，就是

讳莫如深。直到他死，也没把这段历史交待清楚。

还是让历史事实来回答人们的疑问吧。

在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四年中，开始，康生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1月—1931年5月)，接着，参与了中共中央某一机关的领导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之职(1931年6月—1933年6月)；最后，离沪赴苏，充当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1933年7月—1937年11月)。王明"左"倾盲动错误猖獗之时，正是康生利用这些职务之便，从组织上、宣传上卖力推销王明"左"倾盲动错误之时。在组织上，康生成了王明推行宗派主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锋。在宣传上，康生拼命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贯彻不力或怀疑者，则无限上纲为反对国际路线。这个既是打手，又是吹鼓手的康生，这样忠实于王明，当然会得到王明的赏识，而成为王明的得力干将的。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为了推行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首先在组织上对各级领导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充实"。他一方面将那些忠于王明的所谓"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安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封之以高位，授之以实权；另一方面，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路线"的旗号下，强力推行其组织路线，对不顺从者，实行过火斗争，从组织上实行"刷新"。其结果，破坏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的正常关系，严重损伤了党的肌体，巩固了王明教条宗派主义的统治地位。康生作为王明当权时的中央组织

部部长，对于王明“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巩固和加强其政治统治，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康生精心物色了王明所需要的“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并帮助选派了大批“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推行其“路线”。他真是不愧为王明的组织部长啊！

对于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康生不仅在组织上竭尽全力以立功，而且在宣传上也竭尽全力以效劳。据统计，他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兼管全国职工运动时起，到一九三三年七月离沪赴苏时止，前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以谢康或骆驼为笔名，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职运指南》等党的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平均每月一篇。其中，只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个月就发表了五篇。他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宣传是何等狂热！

康生在这些文章中具体宣传了些什么呢？

一、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

本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包办下召开的，其结果是扶持王明等人上台，“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统治了党中央，使代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那个小册子（即《两条路线》）实际上得到批准，流传全党，从而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次“左”倾的严重危害，其时间持续四年之久。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而康生却大肆宣扬这次会议的“丰功伟绩”。他说：“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的

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① 在康生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等等用语都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只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容许有半点怀疑，如有谁不象康生那样理解，也不象康生那样贯彻，那就成为康生所说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立三路线残余”，就“必须坚决肃清，坚决打击”！

二、“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应当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分析各种交错的矛盾，向全国人民及时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和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日趋高涨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可是王明等人对于这一新形势，从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各帝国主义一致地“进攻苏联”、“进攻中国革命”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因而他们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而康生就是这种错误估计、错误口号的积极兜售者。他一再宣扬，“九一八”之后是“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新形势，大声疾呼“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公开赤色工会”等口号。他

① 谢康：《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年12月21日），载《红旗周报》第28期。

说：只有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估计"最不愿听"；只有取消派"对于共产党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①] 因而他极力主张"开展动员工人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武装工人的工作"，并要求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②] 这种宣传，既不了解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情绪，也不懂世界形势带来的变化。它只能引起全国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不可否认，"九一八"事变确实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然而康生却利用这一点，过分地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否认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强调国民党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崩溃"、"总崩溃"，革命的力量已大大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他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反帝运动的高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③] 他主张工人的斗争要"进攻"，不要"防御"。谁若根据实际力量的对比，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应当防御，他便批判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有恃无恐地批判刘少奇同志关于当时工人斗争是"防御"的正确主张，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是"在全总中央职工部机会主义领导中的一切错误的根源"。[④] 在康生看来，凡是同王明不一致的意见，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① 《取消派的"工人运动"》(1932年1月25日)，载《红旗周报》第29期。

② 《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1932年4月30日)，载《红旗周报》第41期。

③④ 《机会主义的罢工运动总结》(1932年4月3日)，载《红旗周报》第36期。

凡是同王明的崇拜者不一致的意见，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倘若有谁同康生的意见不一致，那就要自始至终的，甚至连其后代，都得是右倾机会主义！

三、极端行动，适应极端口号。

一味鼓动罢工，是康生文章的主题。打开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不谈罢工的。《学生罢课后干什么》，① 是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标题好象是篇不谈工人罢工的文章，可是一看内容，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康生这篇文章，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书本理论出发，说"无产阶级是反帝运动中最坚决的队伍"，"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扩大罢工的浪潮，才能使反帝运动更坚决更激烈的发展下去"。因此，他极力鼓吹学生罢课之后，都要"到工厂中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其他文章，更是突出地鼓动罢工了。不但要罢工，而且要长期坚持罢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康生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中，直接批评江苏省委与工会在"九一八"后，不是"完全放松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就是"空喊罢工，纸上罢工"，前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后者则是"立三路线"的表现，提出全党在"目前反帝运动中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务"，就是以"十倍的努力去扩大工人的罢工"，并责令江苏省委"深入到企业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发展罢工"，要他们"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方式，要利用公开的路线活动，公开地组织工厂中的反帝组织"，要"经常的召集群众大会，领

---

① 载《红旗周报》附刊第26期，写于 1931 年 12 月上旬。

导群众斗争，号召罢工。”①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中，武断地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责令省委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实际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②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中，康生又责令说：“党与团的省委必须将领导罢工工作作为他的第一等的任务”，“区委也必须将一切的工作集中到领导罢工中”。③ 王明打的旗号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康生当然也会抓住这个口号不放的，所以他在文章中，甚至在题目里都要塞上“布尔什维克”的字样。这不仅为王明相呼应，也为自己贴金，至于中国的实际，他们是不管的。他们的办法是，只要口号喊出来了，那就只好要事实去适应口号！

康生不只是鼓动罢工，而且特别强调将罢工引导到“武装工人”，“夺取政权”上去。他说：要使“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要“广泛地组织工人的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并“要领导这些队伍由要武装走向夺取武装的道路”。④ 他认为：“只有将罢工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才能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从而“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⑤ “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

① 载《红旗周报》第 27 期。

② 载《斗争》第 1 期。

③ 载《红旗周报》第41期。

④ 《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1931年12月10日)，载《红旗周报》第 27 期。

⑤ 《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1932 年 2 月 24 日)，载《职运指南》。

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彻底胜利”。① 因此，他极力主张在罢工中，要“把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② 康生宣传的关键就在于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才是王明所说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立三的“左”倾错误就在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就是靠批立三“左”倾错误起家的，康生也是靠反戈一击而得到王明赏识的。康生的本领就在于他能用一套内容、一套手法，得到两个不同的门庭的支持，而且都能得到宠爱！

四、向黄色工会“进攻”，公开建立赤色工会。

康生在这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说：黄色工会成了“积极的阻止反帝运动的发展，破坏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罢工”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维持他垂死统治的支柱”，因此，黄色工会也就成为康生进攻的主要目标，于是他对黄色工会加紧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活动”，极力主张“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去夺取他们之中的下层群众。③

与此同时，康生又在许多文章中大声疾呼：“立刻在工反（即工人反日会——作者注）的广大的群众中，宣传赤色工会

---

①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2年2月27日），载《红旗周报》第33期。

② 《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年12月21日），载《红旗周报》第28期。

③ 《怎样反对国民党的黄色工会》（1931年12月15日），载《红旗周报》第28期。

的纲领，公开的活动，吸引工友积极干部及广大群众，大批的加入赤色工会，深入各个企业里，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赤色工会，坚定的在黄色工会中进行建立反对派的组织，是不能再拖延一分钟的。要反对那些不敢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敢于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不去广泛的吸引群众来加入赤色工会而采取脱离群众秘密狭隘的方式，在亭子间里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① 把话说明确点，这就是要在白色恐怖中建立公开的、没有任何掩护的、脱离群众的、第二党式的“赤色工会组织”，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以便于敌人的破坏和全歼！

五、对“右倾机会主义”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康生在党内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不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同志。同他们的调子稍有不符者，也在斗争打击之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在《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一文中说：“革命的急速发展和党的伟大进步”，引起了“党内不彻底的两面派，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路线的残余，重新组织小组织”。“他们破坏党的新策略是：一，勾结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 团、取消派等，来破坏党的工作。二，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怠工，破坏群众的斗争。三，利用党的个别错误，实行反党的阴谋。四，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向党攻击，斗争激烈时，取消他们的意见，承认错误，保存组织上的活动。五，煽动欺骗幼

①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2 年 3 月 25 日)，载《红旗周报》第33期。

稚的同志，扩大他们的小组织，假借领导斗争，到工人中活动。……"①根据这些，他提出的办法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派，反对两面派，反对党内右派暗探"，"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一切企图对国际路线的怠工"。康生责令要把这些斗争，"深入到支部中，群众中，实际工作中"，并要"在组织上得到反应"。

在康生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成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心腹大患，必须集中火力进行无情斗争。所谓在"组织上得到反应"，就是以组织部长的身分，下令清洗就是了。对于王明的领导，康生深怕党内有人不服，他象只警犬，到处搜索与王明意见不同者。他认为，放弃组织赤色工会，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摆一摆工会工作中的困难，就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康生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因此要对它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不这样做，就不是国际路线，不遵照他的主张去办，就不能保卫王明路线。尽管实际上，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已经危害到党和党领导的工会，康生却仍然这样大喊大叫，说明他对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真够卖命的！

① 载《红旗周报》第28期。

第 七 章

王明的国际伙伴

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康生觉得需要转移阵地了，于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偕同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康生之名，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起用的俄文名字——"Кан Щен"的译音。到达莫斯科之后，康生对米夫、王明竭力逢迎，因而更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搬进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的办公室。康生对于他能有机会同王明坐在一起办公，并成为他的有力助手，感到无上荣耀。从此，对于王明表现得愈益"忠诚"，看着王明的脸色，跟着王明的腔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从而成为王明形影不离的独一无二的国际伙伴。他俩简直象搭配好的相声演员，处处是双双出面，同台演出。

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都干了些什么呢？

第一，继续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作。康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全力贯彻的正是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可是实践证明，这本小册子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带来极其

严重的危害，正是它，导致了白区工作的大失败，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撤离上海。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些事实。他一到苏联，就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到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康生曾先后兼任这两个学校的中国部主任）等学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及其小册子。他说，王明的小册子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它“体现了党的路线”。一九三四年前后，曾在国际列宁学院学习过的卢竟如等同志，就曾亲自听过这些报告。

康生既然对王明表现了奴才式的依附，那么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贯彻和执行，当然也是忠贞不二的。在国内时是这样，到了莫斯科就更加露骨。在康生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比靠上王明更保险的了。所以，他象热衷于传教的牧师一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真诚信仰和卖力推行，作了充分的表演。

第二，利用共产国际讲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四个月，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好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康生随同王明参加了这次全会。会上，王明、康生都作了长篇报告。会后，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这两个报告，冠以《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标题，公开出版。这两个报告，都是总结几年来推行王明“路线”的所谓“业绩”，鼓吹王明“路线”如何“正确”。不同的是，王明的报告是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全面说明，而康生的报告只是侧重从白区工作上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作些补充说明。

王明的报告，完全不顾我党白区工作已经遭受破坏，党中央已经被迫撤离白区的事实，也不顾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已

经遭受失败,红军正在被迫长征的事实,连篇累牍地论述了“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所谓“胜利和成绩”,并以此为据,说什么“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而这种“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所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他还特别强调说:“根据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着重号均为王明所加)显然,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用谎言来说明四中全会的“正确”,用捏造的“事实”来证明王明路线的“胜利”。

康生报告的题目是《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康生在这个报告中,也不顾王明路线给白区工作所造成的损失,硬说王明路线在白区工作上,特别是在白区组织工作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说什么只在“最近一年来”,非苏维埃区域内党员人数“从三万人增加到六万人”,“使我们在上海的党的工人成分从百分之六十增到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更有甚者,他竟说:“当(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开会时,八十个工厂代表听了共产党的报告,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这里使人怀疑的是,当时革命并非处于高潮,而白色恐怖又是如此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那也只是在极左情绪煽动下,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怎么可以将这个别现象拿到国际讲坛上作为典型大肆炫

耀呢！然而康生是顾不得这些的，他为了说明王明路线的"胜利"，特别是要说明他自己的"胜利"，就是没事实，也可以加以编造，反正没有人去核实。在康生看来，这样做，既可骗人，又可捞功，是一个不亏本的生意！

康生在报告中，不仅列举了发展的"事实"，还分析了发展的原因。他说：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我们的组织为什么能够得到极大的发展呢"？这主要是实施了"真正实际的具体的活的领导"。这无非是向共产国际会议的参加者宣扬王明领导的党中央。所谓"活的领导"，就是王明和康生的领导。康生接着鼓吹说：当时"曾经动员了中央的同志组织支部巡视委员会，以实行对支部的帮助和监督"，帮助支部吸收党员时注意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帮助支部"把征收党员的运动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帮助支部"采用苏联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经验，广泛的利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利用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支部"，去发展党员。当时白区党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由公开转入地下，由进攻转入防御。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去突击发展党员，这本身正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地使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这本是令人痛心的失败的教训。然而，康生只讲组织发展，不讲组织破坏，这实际上是把党的失败当作王明、康生的功绩来宣扬。康生这种宣扬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标志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

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①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王、康等人多年来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以及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的报告所作的否定性的科学结论。

第三，蔑视遵义会议，继续搞拥戴王明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了挽救处在危险中的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在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之下，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军事上，总结了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分析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带根本性质的错误，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康生很快得知了遵义会议情况。但是，他得知之后，不是

① 《毛泽东选集》1953年版第3卷第970页。

高兴，不是拥护，更不是贯彻；而是表面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实则蔑视和反对。他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会议情况，而且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加紧了继续吹捧王明、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

请看事实：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康生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事后，康生承认确有此事，但是多方辩解，说自己没有参与此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① 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大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②

一九三六年三月，吉合同志为离苏返国之事，曾去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找过康生。康生当着王明的面，径直介绍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就瞿秋白同志逝世一周年，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自己亲笔起草的《我国共产

① 吴坚同志于1979年的揭发。

② 侯志同志于1979年2月25日至3月5日的《谈话记录》。

党领袖王明康生等对于瞿秋白之哀辞》。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几年前，康生还在积极尾随王明对瞿秋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哩！现在，即瞿秋白逝世一周年之时，康生却假心假意地表示起"哀悼"来了。谁都看得明白，"哀悼"是假，借机吹捧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是真。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莫斯科为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高举金杯虔诚地"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对王明吹捧得如此肉麻，真可说到了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而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都统一于蒋介石，一切都服从于蒋介石。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着力宣传王明这一投降主义言论。①

一九三八年，在共产国际任中国党代表的王稼祥同志从莫斯科回国。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委托他带给中国共产党两个重要指示。王稼祥同志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同志如实作了汇报。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当时，王明在武汉，他要中央全会到武汉去开，遭到中央拒绝。王稼祥同志电告王明，立即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如不参加会议，后果自负。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才回到了延安，参加了会议。在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

① 延安中央党校第五期学员李一夫同志揭发。

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这不仅给王明当头一棒，也给康生当头一棒！①

当然，以上事实仅是举其要者。但仅仅这些就可看出康生在遵义会议之后对于王明及其路线是什么态度了。

第四，炮制"王、康指示"，使东北抗日联军遭到破坏。

自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中央由上海撤至江西中央苏区之后，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后，我东北的党组织就开始失去了党中央的领导。趁此之机，身居苏联的王明、康生，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指令中共东北党组织直接接受他们的领导，并下达了所谓的"王、康指示"。结果使东北党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对抗日联军的危害甚大。但是，长期以来，康生为了掩盖自己破坏东北革命事业的罪恶，极力否认有个"王、康指示"的存在，并疯狂迫害知情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给知情者扣上莫须有的种种罪名，不是关押，就是逮捕，甚至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残害以至灭口。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既然没有被蒋介石杀绝，当然也不会被康生杀绝。不管这些穿着不同衣服的封建法西斯多么凶残，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坚持斗争的幸存者还活着。不仅有不少知情者还健在，更重要的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王、康指示"也被有心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了下来。

"王、康指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由莫斯科发出的。其要点是：现在苏联不能帮助你们东北，中央也不能援助你们东

① 见1981年2月4日《工人日报》所载王震、廖承志等《回忆与继承》。

北，你们要"保存实力，待机而行"，"如实在坚持不了，可以撤出根据地到别的地区活动"，"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云云。

这个指示，散布了悲观情绪，借"保存实力"为名，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所谓"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正好符合了日寇搞无人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从这封指示信看，王明、康生又从极左转到了极右，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

当时，东北党接到这封指示信，立即在黑龙江省诸河县开了一个会(即东北历史上有名的帽儿山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这封"指示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示坚决反对，并作出了拒绝执行"指示"的决议。但是，大权在握的王明、康生，首先将"王、康指示"的坚决反对者赵尚志同志开除出党，接着又将东北党的干部分期分批调往苏联，长期进行迫害，致使东北的党和军队均遭严重破坏。本来，我们的东北有辽阔的土地，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的广大群众，地形复杂，有利于建立抗日救亡根据地，可是长期建立不起一块象样的根据地，就同"王、康指示"有密切关系。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在东北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任凭他怎么狡辩、耍赖，都不能抹杀铁一般的事实。

第五，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我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关于这个问题留在后面专章评述，这里从略。

从上述事实来看，人们不免产生疑问，康生本来投机起家，善于见风使舵，而且已经尝到了甜头，可是，为什么在遵义

会议之后，康生不但没有马上“反戈一击”，甚至在四、五年之后都没有明确表态，而且在莫斯科如此，到延安之初也是如此呢？难道康生真的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忠贞不二，没有一点“灵活性”吗？不，这里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情况没有改变。当时共产国际还是全力支持王明的，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中还有显赫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心向上爬的康生，当然还会以王明的是非为是非，抱他的粗腿。在他看来，紧跟王明，就可稳步上升，只要王明这个靠山不倒，门庭是不能轻易改换的。实际上，康生死盯着不放的是权力和职位，始终不变的是他的野心！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
康生作为王明的副手在共产国际

第八章

借题目搞陷害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二年，突然发生了基洛夫被杀事件。不久，苏联宣布此事系由托洛茨基派所干。于是，在苏联全境之内迅速掀起了一个“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正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的时期。

康生在国内就曾利用领导错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而且从中捞到了“好处”。对于苏联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当然要重操故技，再次陷害别人以抬高自己。事情也就这样发生：正当苏联“镇反肃托”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康生就闻风而起，伙同王明迅速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按照苏联的规格，在中国共产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也要照样搞一个“镇反肃托”运动。本来，康生自己的历史就不那么干净，但是由于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使他不仅不受审查，而且还能审查别人。康生正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打着“肃反”的幌子，以“叛徒”、“特务”、“间谍”、“奸细”、“托派”等等罪名，通过苏联公安机关任意捕杀大批好同志。这那里是肃反，这纯粹是借肃反之题，达其杀人灭口、排除异己的目的。

康生认为，地处异国，知者甚少，又无从查对，实属秘密，怎么会走漏风声呢？任何干见不得天日的罪恶勾当者，都以为神鬼莫知，藏起屠刀，就当菩萨！可是，血债，总不会在历史上自行消逝的。当时旅居苏联的同志中还有幸存者，他们现在仍还健在。他们共同回忆了当时康生借题害人的情景。有的同志说：当时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经常有人失踪或被捕。这些失踪或被捕者，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至今下落不明。例如：

一、肖寿煌、武胡景、欧阳新等四人的被害。肖寿煌，广东人，一九三二年到中共中央某机关工作。武胡景，又名林大生或吴福敬，山东人，曾任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一年调东北任北满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调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三年复任中央某机关负责人。欧阳新，又名王子春，化名老大，湖北人，一九二九年前曾去苏联学军事，一九二九年后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曾任某机关二科科长。还有一位，也是湖北人，详情不清。他们四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受中共中央某机关所派，去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六年，皆以“托派”“特务”之名被捕处死。

二、王环、苏长（又名罗佐）、刘光等三人的被捕。这三人当时都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们三人突然于一九三六年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三、王德夫妇的被害。王德，又名马良，一九三二年由上海调任满洲省委书记，大约一九三四年去莫斯科，曾在《救国时报》工作过。一九三七年突然被捕，至今下落不明。其夫人唐国夫，又名谭国甫，曾任满洲省委宣传干事，一九三五年去

莫斯科，也曾在《救国时报》工作过。王德被捕后，唐国夫被迫去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地方给人家当佣人。从此，也下落不明。

四、杨光华被流放。杨曾继王德之后任满洲省委书记。因省委遭受破坏跑到苏联。王、康诬他为“国际间谍”，让苏联公安机关予以逮捕。不久被流放到北冰洋附近达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五六年方才获准回国。

五、王润成被判刑。王曾在抗日联军二军二师任政委。一九三六年，经组织批准带了几个中国干部去苏联学习。途中，遇上一位姓姜的朝鲜女同志带着全家老小在逃难。王未经组织批准，就把他们全家带到苏联。康生得知此事，信口诬说这位女同志是“叛徒”，硬是交苏联公安机关判了刑。王润成本人也以带叛徒去苏之罪，交苏方判了八年徒刑，送到北极地区的一个煤矿去劳动。刑满后又劳动了八年，一九五三年方才回国。

六、李立三被判刑。李立三同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被解除中共中央职务，送苏联长期检查反省。王、康先后到达苏联后，进一步加紧对李的打击迫害，不准他回国。一九三七年冬，王、康两人正准备离苏返国之际，突然通知苏方，以所谓“托派”之名，将李逮捕判刑。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去苏治疗臂伤时，经过多方交涉，方才把李放出，后来，回到国内。

七、陈郁被劳改。陈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六大的中央委员。苏联“镇反肃托”时，王、康突然以“同情托派”之罪，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并将他化名“彼得”，送到列宁格勒一拖拉机厂

去劳改，妄图让其默默无闻地了其终生。还是周恩来同志那次去苏治病时，得知此情，立即派人将陈接到莫斯科，随即带回国内。

以上所举被害者，仅是知其姓名，知其概况者。实际上，王、康借苏联肃反扩大化所迫害的中共党员干部，比这里所列举者要多得多。

针对上述同志的被害，不少同志曾经当面质问过康生。康生或者含糊其辞，说他们有历史问题，但又说不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他那时在法国不在苏联，被害情况不清楚；或者把迫害责任完全推到苏联保卫机关身上，说什么那是苏联人干的，与他无关。的确，除了仅受党内处分者外，凡是被捕判刑者，都要经过苏联保卫机关之手。但是，当时的苏联党还是尊重中国党的。当时的苏联保卫机关，如不得中共代表团的批准或申报，是不会任意逮捕中共党员的。而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团正副团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和康生。特别是康生，他作为代表团副团长，主管我党在苏干部的审查、分配和遣返；在“镇反肃托”运动中，又是运动的主管者。因此，康生的任何掩盖、推脱、遁词都不能抹杀他“借题害人”之罪。

康生为什么要借苏联肃反之题，诬害我党干部呢？从上面所举确实被害者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怕人知道他的历史之谜。一九三五年被中央某机关派到苏联学习的四位同志全部以“特务”之罪予以处死。说他们四人是“特务”，这完全是莫须有的强加之罪，是拿不出任何证据的离奇之说。所谓“特务”云云，不过是康生的诬陷。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四位同志或是与康生同时，或是继康生之后

在中央某机关工作过，康生生怕这四位同志知道他在上海工作时的一段历史之谜。做贼心虚的康生，为了消除后患，便利用职权，捏造所谓"特务"之罪，一一将他们灭口。

第二，怕人知道他伙同王明破坏东北党的罪恶。已知的被害者，许多是在东北工作过的同志。他们深知"王、康指示"给东北党的危害，并曾积极反对过"王、康指示"。为了掩盖自己的这桩罪行，康生乘机，将在东北工作过的主要党员干部，一一调往苏联，或以"国际间谍"之名，或以"叛徒"之名，或以别的什么罪名，统统加以逮捕、流放。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所谓"国际间谍"、"叛徒"等等，当然都是捏造，是对知情者封闭的有效措施。

第三，为了向王明邀功请赏。比如对陈郁同志的迫害就是其中一例。本来，陈郁与康生并无任何利害关系。康生之所以加害于他，这完全是为了迎合王明之意。原因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王明为了排除异己，拉帮结伙，硬把不跟他走的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负责人周大文同志诬为反党分子，送远东地区伯力城劳改（至今下落不明）。对此，当时正在该校学习的陈郁、林铁、杨秀峰、何一鸣等同志均表反对。然而王明却一意孤行，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将林铁、杨秀峰、何一鸣等反对者全部送到乌拉尔附近的加利华工厂去劳改。只因陈郁同志是六届中委，王明一直未敢动他。可是，待康生到达苏联之后，王明自感如虎添翼，就肆无忌惮地迫害起陈郁同志来。而善于溜须拍马的康生，早已把王明的心意当作待人处事的标准，并且竭尽全力作为向上爬的梯子，加害于陈郁同志，以得宠于王明，从而邀功请赏。

第四，为了排除异己。武胡景同志惨遭杀害，固然他曾在上海中央某机关工作过，担心他知道康生的肮脏勾当，是个重要原因，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据武胡景的爱人侯志同志揭发：当初，康生曾经千方百计地拉拢过武胡景夫妇，以便使之成为自己的驱使者。只是这般拉拢未能凑效，方才对他下了毒手。在王明、康生那里的逻辑：顺者就昌，逆者则亡。

第五，为了捞“革命”资本。王润成同志的被害，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在赴苏的半路上碰到一个逃难的朝鲜女党员，并将其带到苏联，而康生不经任何调查，就一口咬定那位朝鲜同志是叛徒，硬是将王润成同志加以逮捕判刑。这完全是为了表白自己对苏联“镇反肃托”的拥护。康生就是这样以捕人来立功，借国际支柱来飞黄腾达的。

可见，康生手段之毒辣，目的之卑鄙，是出乎做人道德之常规的，更不用说共产党人之道德了！值得深思的是，康生的这一切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却一一如愿以偿呢？现在看来，他之所以通行无阻，首先是由于他一开始就伙同王明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有权就有一切！康生早创于林彪。有了权，他就可以把自己排除在被审查之外；有了权，他就可以任意诬陷好人。这是康生积四十多年的经验总结！第二是由于苏联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认为一切地方都是特务如麻，叛徒成堆。这样，康生就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按他的目的来任意危害革命。第三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当时的共产国际是以是否拥护苏联的“镇反肃托”运动作为是否赞成革命忠于国际的标准的。拥护者，就是赞成革命、忠于国际；否则，就是不赞成革命、不忠于国际。这样，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就可以

臆造罪名，大肆残害革命干部，以便踏着革命者的尸体去领取奖章！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呀！

应该指出，康生在苏联疯狂害人，同其在上海党中央追随王明对我党干部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相比，显然是一个“发展”。然而他的这个经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第九章

陈独秀是汉奸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康生尾随王明由莫斯科经新疆回到延安。从此，结束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生活。

康生把这看作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他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从三七年，我就下决心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跟毛主席走。"此话有真有假。说它真，因为康生在这里无意中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对毛泽东同志是不信、不跟的。说它假，因为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后也不是象他所标榜的那样。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应当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要跟一个人，应该跟党，跟党的正确路线。倘若跟人的话，谁正确，就跟谁！对康生来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因为康生信任和紧跟的是权力，谁权力大、职位高，就跟谁；他还跟"左"倾路线，谁"左"倾，他跟谁！或者说得清楚些，谁满足他的私欲他跟谁。若从口头上说，康生由信任、紧跟王明，改口为信任、紧跟毛泽东同志，那是他抵达延安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的事。若从事实上说，恐怕康生一生一世也未曾离开过王明的投机思想及其"左"倾路线。

康生抵达延安的头一年，正是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之时。在这一年里，王明仍是康生顶礼膜拜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他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并借机继续吹捧“王明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1]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追随王明将苏联“镇反肃托”扩大化的错误移植到中国，也来个这样的运动。他的逻辑是：陈独秀是托派，托派都是日本侦探机关的特务，因此，他一口咬定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制造了一场离奇古怪的政治风波。我们就此事，做点考察，看看事情的究竟。

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所谓“汉奸”的“证据”，是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写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2]中提出的。其主要“证据”有这么一条：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这个“证据”，只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事实说明，他这个“证据”完全是信口雌黄的凭空捏造。

---

① 陈伯达于1979年5月28日的交代。

② 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期。

首先，所谓托派“中央”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经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唐有壬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之事。事实是这样的：该“中央”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但是不久因内部有人告密，除陈独秀、彭述之等四人外，全部“中央委员”被国民党逮捕，因而，托派“中央”受到严重挫折，处于瘫痪状态之中。一年后，陈独秀才把它重新整顿起来。但是，接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这个新的“中央”的大多数人，包括陈独秀、彭述之在内，又被蒋介石逮捕入狱。所以，在“九一八”前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罗汉等人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到处躲避特务的盯梢监视，怎么会自投罗网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其次，所谓唐有壬的“亲日派”问题。唐有壬的确是一个“亲日派”，但是，他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那是一九三二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作为汪精卫的副手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以后的事。在这之前，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个时候，连后来成为中国最大亲日派头子的汪精卫，为了利用人民抗日运动，与蒋介石争夺权利，也在争抢“抗日”的旗子，更何况唐有壬呢？既然“九一八”时唐有壬还在争抢“抗日”的旗子，何谈“亲日派唐有壬”呢？又何谈托派“中央”“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的编造中所安排的唐有壬这个人物，不仅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用心甚奸。唐有壬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蒋汪矛盾中被刺身死。康生特把这个幽灵请来，扮演“亲日派”兼“日

本侦探机关代表”这个决定性角色，无非是想来一个“死无对证”！

再者，所谓“谈判的结果——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问题。康生在“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句话上特意加了引号，以告诉人们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那里呢？就在康生制造这些谎言的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之中。那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明确的指出：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很明显，所谓“不去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一语，就是从托洛茨基给平行总部的信中偷来的。这么说来，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他俄国信徒的指示，却早在一九三一年就被中国的陈独秀们执行了。可笑之至，真是令人惊奇！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之说，也同样是荒唐的。康生此说，显然是在重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的诬陷。可是当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的同时，王明又在一篇文章中谈了另外一个情况：“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继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① 人们不禁要问：收买“托匪”的骨干分子每月花五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三百元，前者为何如此“昂贵”，后者为何如此“价廉物美”？这除了王、

---

① 《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6期。

康之流胡诌瞎说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其实，当时陈独秀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得三百元。而且，他在狱中和出狱后，贫困交加，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经常送钱给他，他一般都不收，收下一些，也都是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被认为清高而著称，社会影响并非一般。因此，康生的诬陷文章一出，立即受到舆论界的广泛谴责，说"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①

最后，从陈独秀对日寇侵华战争的一贯言行来看，康生的编造更是荒诞无稽了。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陈独秀就在托派"中央"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使排斥日货"收实效"；指出对日之战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②

当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底制造"一二一七大血案"时，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杂志，立即编了一期"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亲自撰文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血腥罪行，有力地戳穿了当时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由汪精卫出来鼓吹"民主政治"、"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继续推行卖国政策的阴谋，热情歌颂了学生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

① 《傅汝霖等九教授的公开信》，载1938年3月16日武汉《大公报》。

② 《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载《火花》第3期。

"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财产私有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是，"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陈独秀、罗汉等人还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合作抗日的建议"。② 只是因为那时党内王明"左"倾路线正在横行，未予理睬。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对此，陈独秀从来直言不讳。在法庭上，在回答法官的"何以打击国民政府"时，陈独秀就曾公开宣称：那是因为"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当时律师章士钊为陈辩护说，陈并不反对国民政府，陈独秀当即起立声明："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③ 明确表白了自己反对对日妥协投降的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正因如此，国民党法庭才判了陈独秀十三年的有期徒刑。

陈独秀即使在服刑期间，也未曾忘记对日斗争。他曾于一九三四年赋诗曰："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④ 意思是自己老而未衰，梦里还看到自己驰骋在东北冰天雪地的抗日战场上。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出狱后，无论作讲

---

①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载《热潮》第4期；《谈谈越轨行动》，载《热潮》第5期。

②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载《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25日。

③ 《陈独秀案开审记》。1933年4月14日—26日。

④ 《金粉泪五十六首》，作于1934年，上海"一大"纪念馆藏。

演，还是写文章，都主张抗日，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到临终还瞩望抗日事业“取得最后胜利”。①

综上所述，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所谓“证据”，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而用一些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的手法捏造出来的。然而康生还在他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中，一再强调这些捏造的东西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铁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事实”两字在他那里只不过是“谎言”的别名。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曾为我党的创建和宣传有过很大功劳，但也犯过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过巨大损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如何评价，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实事求是。根据历史材料来看，陈独秀确实参加过托派组织，而且在他出狱后也确实没有接受中共中央要他“承认错误，声明退出托派”的意见，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再和托派搞在一起，并且拒绝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拉拢；尽管他在理论上、路线上与我们党有分歧，但还不是充当日本间谍的汉奸，也不是主张投降的分子。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些区别，也不看十年内战时期反蒋，抗日战争时期反日的鲜明立场，硬将陈独秀诬陷为“匪帮”、“拿津贴”的“汉奸”。

那末，康生究竟为什么一到延安就演出这场诬陷丑剧呢？这当然有其深刻的背景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康回国之前，我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应陈独秀、罗汉的要求，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陈独秀就是在国共合作实现时，在我

---

① 《钟复光谈陈独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

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政治犯的形势中，被营救出来的。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就曾派亲信朱家骅拉过他，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作诱饵。“陈独秀不为所动，坚决表示不干”，[①] 从而引起我党的注视。在接触过程中，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明确指出陈独秀、罗汉这一派人是“赞成抗日的”，[②] 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③] 周恩来同志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④]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二十四期的“时评”中，还以尊敬和期望的口吻“希望”陈独秀“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所以，当罗汉为陈独秀活动到延安时，党中央特地为此作出了要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等“三项条件”的决定，[⑤] 并对不愿恢复党籍的托派，提出了可取“党外合作的办法”。[⑥]

所有这一切正在顺利进行之中，王明、康生由苏联回到延安。他们得知了这一情况，急急忙忙，首先由王明出面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坚决反对，说什么：“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当即有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

---

① 《黄理文谈陈独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②③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载《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25日。

④⑤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给《新华日报》的信，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331页。

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类"；"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还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①]——就这样，非但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大门被关上了，而且还被诬陷为每月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抛出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以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相配合。在这篇长文中，康生按照王明的调子提出了陈独秀的所谓"汉奸"的"证据"，并且用十分明白的语言攻击说："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既然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已属"不能容忍"，那么把陈独秀从狱中营救出来，并要把他们接到延安来的党中央，又当何罪？很明显，王明、康生一回到延安就急急忙忙地制造这一假案，其矛头所向就是想乘当时苏联在国内审判"右派和托派同盟"大叛国案的狂风，攻击我党团结陈独秀等人一致抗日的政策。

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侵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忾，团结自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但是由于康生在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

---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331页。

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打成“汉奸”，这不能不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感到费解和不满，从而对我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我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只是由于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才防止了事态的发展。但是，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却成了悬案，团结陈独秀一致抗日的愿望却成了泡影，党因陈独秀问题所蒙受的损失，却一直未能挽回。这就是康生回到延安头一年所犯下的永远抹不掉的罪过。

第十章

辨风转向

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也是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日本侵略者鲸吞整个中国之势正猛，日军占领了我东北、华北之后，并未止步，仍然以全力向内地扩张，也从沿海向西进犯。上海、南京早已失守。沿长江大埠，包括九江武汉也不能保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向敌人后方挺进，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成了抗日救亡的唯一希望，大批青年涌向延安，大批爱国人士转向共产党。速亡论是日本人和汉奸的论调，速胜论则是侥幸者的心理。抗日战争一年多的事实驳斥了这两种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持久战，则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在这种形势下，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被许多人识破了。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远远超过了王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接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自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的康生，紧跟了一段王明之后，感到延安的政治气候同莫斯科是迥然不同的，王明的领袖

地位已经不保了，于是就赶紧刹车，辨风转向。

通过辨风，康生认识到，王明靠的大山是共产国际，现在这个大山靠不住了。他发现，在延安真正的靠山是中国人民，而王明毫无群众基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新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毛泽东同志却备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已深入广大人民心里。他还亲眼看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了王明所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鉴于这一切新的政治变动，康生深深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顺风转舵，变拥护王明为拥护毛泽东同志。

长期紧跟王明的康生，假若真的明辨是非，知晓对错，决意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投向真理，这是应当欢迎的，也是正确的。不仅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在内，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不教而诛，是同我们党的原则不相容的。但是，也无庸讳言，由于康生在王明集团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党对康生的转变，确实寄于了更大的希望，做了更多的争取工作。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分配去武汉作了长江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留在中央作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又先后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就是一个证明。然而康生却怀着另外的目的，利用中央给他的职权，重操他熟练的故技，投机钻营起来。

且看康生是怎样故态复萌，搞投机钻营的吧！

第一，同江青互相利用，包藏祸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只是吃了特务的耳光，就被吓破了胆。为了取得特务头头的欢心，她在监狱的优待室里，陪特务吃喝，并为其演唱。最后填写了“自首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明“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江青出狱时，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特务留作纪念。

江青叛变后的演出，得到了蒋帮的喝彩。她演出的《狼山喋血记》，就曾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蒋介石“五十寿辰”，蒋党大搞“庆寿”活动。他们以加强“国防”为名，向外国购买八十多架战斗机、轰炸机，作为蒋介石的“寿礼”！其实，这批飞机决不是为了抗日。蒋介石说得非常清楚：“匪未肃清绝不言抗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去”，日寇的飞机向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来”。蒋介石的这批飞机就是为了增加“剿共”的军事力量。当时江青积极地参加了“献机祝寿”的活动。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江青粉墨登场，演出了独幕剧《求婚》。特务崔万秋在《大晚报》上，对江青的“效忠”一再宣扬，又是组织专访，又是发表消息和剧评，特别刊登了江青的剧照，说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

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她的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以情报专家自居的康生，对于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可是，由于他们两人各怀鬼胎，互相利用，因此，对各

自的阴私和丑恶，是心照不宣的。至于他们如何暗使机关，彼此都是心中有数的。江青有求于康生的包庇，康生则认为江青奇货可居，向何处投放，就象交易所老板手中的砝码，要认真掂量。为了自己投机的需要，只好隐恶扬美，避丑说美。经过康生的精心安排，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第二，制造冤案，以标榜自己"立场坚定"。

康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的。当时正处在武汉失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其主力改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也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加紧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驻地。同时，还加紧派遣特务、汉奸，渗入我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就显得特别重要。假若康生不负中央所任，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准确地打击敌人，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然而康生却歹心大作，认为这是显示自己骗取信任的好机会。为此，他滥用职权，放肆地制造冤案。他于一九三九年一手制造的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三大案件，即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就是他的重大"业绩"。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陷钱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察。不久，下令将其逮捕。在关押期间，康生组织了由中央社会部、保卫处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参加的所谓"审讯示众会"。康生亲自到会审问，最后亲自定性为"叛徒"、"特务"，将钱关押七年之久。

王尊伋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投奔延安。康生毫无根据地怀疑她是汉奸叔父王克敏派到延安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将其逮捕，关押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的黑窑里，大搞逼供信。先是三天三夜不准她睡觉，搞得她两腿粗肿，头晕目眩。并威吓说，再不承认就拿两条大蛇来放在窑洞里。当时，王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经不住这种恐吓，就根据小说《双城记》上所说打毛衣记人名的故事和当时传说的各种汉奸活动，编说自己是王克敏派来的特务，而且编得有声有色，说什么她同敌人进行联系的密码结在毛衣的花纹里。康生明明知道，把密码结在毛衣上是完全虚假的事，然而他却到处宣扬。并把王比作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押至枣园中央社会部，亲自组织和参加对王的群众审讯会。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康生又亲自写信给王尊伋专案组，断定“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尊伋”，“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一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底，康生竟以“走路象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等理由，令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将李逮捕，硬是逼李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内奸”。更为荒唐的是，康生竟然在一次审判会上对李说：“李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从这三个假案看，三位被诬陷者都没有在康生手下工作过。他们三人既不知康生的底细，又同康生没有什么冤仇，更

没有反对过康生的什么"指示"，那为什么康生非得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他们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康生想用制造假案的办法来标榜自己立场鲜明、革命坚定、工作得力，以便骗取更大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假案制造得越多越耸人听闻，越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七、八月，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党中央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

一向为王明卖力，作为王明心腹的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好好整整自己的"风"，以便使自己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同王明决裂。可是康生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就在一九四一年底，经高岗许诺，他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真是越是婊子，越要标榜自己是贞节烈女！

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

康生认为，这个伪造的证明可以作为自己反王明的资本。因此，他一直把这个带批注的王明的小册子留在自己身边，借以表白自己一贯反对王明，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前期，他在钓鱼台组织写反修文章时，还把这本小册子摆在自己在钓鱼台的办公桌上，任人传阅，任人摘抄。

其实，康生留下的追随王明的记录，百倍、千倍于这个批注，而且刊于党的正式出版物和党内文件，就是用斧头都不能砍掉的物证，还有大批的活的人证哩！康生对此只字不提，半句不讲，却偏偏拿出自己伪造的一个批注来骗人，这不是公然愚弄人又是什么呢？

康生这些做法，别说让那些知情者见了都会嗤之以鼻，就是让王明见了也会慨叹他为无耻之辈！请看另外一个人的话："王明很不满的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佞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的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这两段话是从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伏拉第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中摘引下来的。这本日记的作者对我党进行了不少歪曲、攻击和诬蔑，但是同我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的揭发结合起来看，这里所摘引的两段话，还是可信的，因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述，只是康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耍弄顺风转舵、投机钻营之术的几个重要手法。由此可见，康生多么善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好！

康生之善变，确实胜似变色龙。他不择手段，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择手段，把有碍于自己攫取权力的人打下去，以至肉体消灭。康生在延安整风中，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之能够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今天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仅从这点来说，我党就有不少教训应当记取。

第十一章

“抢救失足者”

一九四一年七、八两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之前，毛泽东同志于五月份，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还于三、四月份，发表了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文章。应当指出，两年前即一九三九年还发表了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篇重要文章。所有这些，都在预告了中国共产党向党员和干部提出的要求：思想方法的革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演说，动员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反对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借以达到改变思想、作风和团结同志的目的。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同志之间互相教育、互相帮助，真正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使全党思想提高到马克思

列宁主义路线上来。这就必须清算王明先“左”后右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这场运动，当然会涉及到而且主要矛头会指向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及其追随者。

且看康生在这场运动中，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前边已经提到，在整风准备阶段，康生已经制造舆论，给自己重画脸谱。他知道，在这场运动中，他怎样利用江青，江青又怎样利用他？

这时康生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已经是中央领导的核心人物，而且直接掌握了反奸肃反的大权。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同反奸肃反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康生就自己过去的经历说，应当自觉地作为重点检查对象，清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他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这种条件插手领导这一运动，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可以领导这个运动。

可是，事实却不然，整风运动由总学委会领导，毛泽东同志兼任总学委会主任，而副主任则是康生。这就是说，康生除了掌握反奸肃反大权之外，又掌握了整风运动的领导权。

真是小人得志，踌躇满怀，有空就钻，有权就抓，你说你的，我搞我的。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尽管党中央作了决定，发了指示，规定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于四月三日专门作了整顿三风的具体决定，《解放日报》又发了社论，而且各个机关和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学委会进行领导。可是，康生照样利用职权，塞进他的私货，对中央业已规定的整风计划，进行疯狂地干扰和破坏，企图拉向康生设制的轨道，使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康生是怎样领导整风运动的呢？

康生虽然标榜他同王明是对立的，他是反王明的，王明是迫害他的。这只能给自己挂上一个并非假王麻子的真王麻子招牌。他的那套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作风、习惯和心理，却是处处事事都还是王明路线的模式。他想问题、出主意、提措施、使手段，都是“左”的。对他说来，用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对干部进行教育，倒还说过；从书本上摘引几句话，也有过；而和风细雨，团结同志，实事求是等，则是陌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在他看来，党内斗争就是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康生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这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是铁的规律。康生的部署是，整风开始于机关学校，把许多干部，经过群众的七斗八斗，变成谁也弄不清楚的严重问题，最后交给社会部按肃反对象处理。在他看来，整风运动就是整人运动，整不成坏人也整得你长期苦痛！这就是康生津津乐道的专业。

在运动初期一段，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都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对每个文件，都要精读，都要作笔记，都要进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听领导同志讲解，受到具体的教育和启发，然后联系自己的历史，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对照，作检查。在小组中，同志间互相帮助，进行同志式的交谈，进行同志式的批评。确实感到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真正可以辨别真假是非，特别是对王明路线有了统一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认真的了解。

康生看到了这个情况，觉得形势发展不妙，有抓住自己狐狸尾巴的危险，刚刚表白了自己是美丽的凤凰，人们很快就会

认出自己是只讨厌的乌鸦；刚说自己是蜜蜂，别人一看是苍蝇！要制止这个危险，必须刹车转向。怎样下手呢？还是从自己熟悉的行当做起，顺手得多！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声言派兵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并派特务、奸细到延安进行捣乱。康生认为，这是转移整风部署，制造事端，借以蛊惑人心，进行煽动的大好机会。因此，当整风刚刚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康生就在自己管辖的社会部搞了一个离奇案件。事情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发端的，曾经轰动了整个延安和边区。

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是康生的试点。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叫张克勤。他原在甘肃，一九三七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调到延安学习。康生认为，这是个特务的典型疑案：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张的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后出了问题。第三，张平时向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康生突然下令将张克勤关押起来，进行审讯。对张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斗争，威胁利诱，强行逼供，要他交代怎样当了特务？又怎样被派到边区进行破坏？不交代就受各种肉体折磨。连续几天，终于达到了康生原来设想的目的。成了康生亲自树起来的第一个特务被“抢救的典型”！康生便借这个“典型”推广他的经验。让张克勤到“控诉、规劝”大会上去作“坦白”报告，以这个“典型”去带动、去挖掘新的“典型”！康生从这个案件得出的结论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新

的估计，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会有特务打进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是靠不住的，是被敌人收买了的"红旗党"，不仅甘肃是这样，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份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的嫌疑，都应是审查对象！谁不这样看待，谁就是右倾。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胡宗南的一个代表因公到延安，康生借口怕内奸与这个代表接触，批准保安机关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二百多个"特嫌"，进行所谓"秘密突破"。康生根本不顾客观根据和可靠材料，也不理其他同志的意见，说什么"抓起来再说，关起来审问"。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认为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于十五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这是一篇有名的报告，曾经流传全党，至今都不会被人遗忘，因为它曾经被一代青年称为恐怖信号而臭名昭著。奇文共欣赏，我们在这里摘引若干：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一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

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因此，从四月十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为什么共产党这样苦心的要救你们？为什么在现在紧急的时期还要抢救你们？这正是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不要再被欺骗着为敌人服务。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

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你们被日寇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强奸了，欺骗了，拉你们去做了第五纵队，由于你们幼稚无知，贪名图利，贪生怕死，而走入了特务泥坑，我们共产党为使你重新作人，用了宽大政策、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法促你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当一个人向党坦白了，我们急急地将他的材料证据收起，从特务群里将他的名字除去，我们高兴他自己已经自觉了！共产党又救了一个人了！……”

“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的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们，要重新反省，彻底的迅速的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后，我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的问题不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与非无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对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现在，要提高你们的警惕性、责任心，学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本事，要发挥你们最大的积极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的人向党悔过，挽救他们离开敌人的第五纵队的陷阱，这是你们神圣的责任”。……

康生的讲演，又是诱骗，又是高压，一会儿象个狼外婆，慈善得很；一会儿象只老虎，口沫四溅，凶得要命。把满腔热情的革命青年，弄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串串的煽动家的辞藻，充满了数不清的阴谋家的废话！

在这个报告之后，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任何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康生所说的第五纵队已经打入了整个延安和边区。康生说得有名有姓，活人坦白，材料具体；讲的活灵活现，听的不知底细，真是草木皆兵，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之危机，人心之不安，使人感到严重的恐怖气氛。

所谓“坦白”，就是突然袭击，强逼着你说假话，承认自己

是特务，承认到延安搞破坏。所谓"规劝"，就是逼供，诱供，指供，软的硬的一切手段都用上，把原来设想的意图，让抢救对象自己说出来。大会、小会、个别谈、小组帮，都是为了"挖掘"特务，挖得越多，成绩越大。所谓"坦白大会"和"控诉大会"，就是康生搞的"典型引路"，用逼供信的办法，让挖出来的假特务登台报告和控诉，用来推广这种经验。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政治上靠不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特务和坏人！在他的领导下，按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有的单位除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成了被抢救的对象，甚至把大部分人打成了"特务"。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竟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时间，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就是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了十多个"特务"。以挖特务多少来证实康生的成绩和情报的"正确"。

这些"特务"是怎样挖出来的呢？

康生从三十年代起，就和王明一起在干部队伍里专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借审干肃反，把同志诬陷为敌人，是他们的专长，颇有经验。他干这种行当，象蒋介石一样，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里通过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点名的几个"特务"看看康生的"杰作"吧！

许遇之同志自己说："我一被关起来，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你的问题，康生早就知道，你是大特务，是汉奸，不承认是

不行的'。……"逼得受不住了，就承认了特务，按照康生的要求编自己的历史。最后，党给许平了反！

杜征远同志揭发："一九四三年河南省委奉命由陕西马栏镇撤回延安。当时我是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被调回延安中组部。调回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关进一个窑洞里，说我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威逼说，河南省委都有问题，就是你是好人？河南省委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你是交通科长，能没有问题吗？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党、是红皮萝卜，是国民党搞下的党。你家属是由敌占区来的，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

肖煌（黄达生）同志揭发："当时，我在延川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正在开展工作之际，突然派来武装人员，把我押回到陕甘宁边区银行，要对我进行'抢救'，责令我到大会上交代问题，接受批斗。经过几次批斗，我逐渐明确押我的理由：(1)因为我的生母是日本人。(2)我是从后方来的，关系复杂。(3)我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接触面广的目的何在？(4)延川银行办事处一起短款三千元事件，未予查清（后来查清系会计记错了帐）。这就是他们怀疑我是"日本特务"的证据。转入小会对我进行围攻，软硬兼施，逼供、诱供，并以短款三千元要杀头来威胁。"

彭尔宁同志说："我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延安，改学农业于自然科学院。……运动开始，自愿的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家史、个人的一切交给党……就在此学习正浓，联系自己的阶段，就组织了一些人……将一些想不到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如问：'你同你的父亲是什么关系？''一二九运动中，别的同学都

被捕，你为啥不被捕？’‘你大学毕业了，为啥还上学？’如果答以真情，还须再问，直追到符合他们的目的为止。这样以逼供为手段审讯得你莫明其妙！”

这些具体做法，都是康生的“创造”。党中央一再指出，不要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而康生却公然说，要用一切办法弄到口供，“咱们逼供而不信”。当任弼时同志批评说：“不信，为何要逼供？”康生则向工作人员布置：“不管他，编假口供，也是犯人的心里有话想说，想说就让他说吧！”在诱逼之下，得到了一些编造的口供之后，康生对干部说：“犯人供出这么多的问题，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么能不继续追查呢？”有的干部问康生：“交代好的，是否可以宽大释放？”经他一解释，完全变成了骗人的手段。他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代不清楚，交不了卷吗？”他还教给别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他永远答不完！”

采取这么一套办法的结果怎样呢？

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成风，追比例，达指标成风。一人被逼，顶不住，受不了，便相继株连。特别是康生让每人怀着敌情观念残酷斗争，又怀着菩萨心肠进行抢救，说真话按敌人对待，说假话，笑脸相迎。于是说假话、假坦白成了光荣。绥德师范的一个年仅十六岁的男学生叫马逢臣，手提一包石头，在“坦白大会”上交代：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在坦白大会上说：她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党员、干部。康生非常得意，他认为这次反奸工作“创造了新的路线”。劝说的方式，有大会劝、小会劝、硬劝、软劝、苦劝、集体劝、个人

劝等；斗争的方式有硬的、软的、虚的、实的等。① 劝不成，就完不成任务！有的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被逼疯者有之，被迫上吊、投井、跳河者有之。所谓"顽抗"而长期被关押者更多！"特务"如麻，草木皆兵。没有一个机关纯洁，没有一片土地干净！象牛魔王祭起的妖风，一下子刮来了数不清的大批"特务"！康生庆幸着自己胜利的丰硕成果，而受害者的苦难和领导者的麻烦，都作为遗留问题摆在广大干部面前。

混乱和不安，捕人和自杀！跟延安的革命气氛极不相称。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广大干部都不能不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疑问。党中央对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正当康生兴致勃勃地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任弼时同志了解了逼供信的严重问题，并听取了"坦白"者和关押者的意见，及时地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提出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当周恩来同志听到关于所谓"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么能这样搞呢？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康生："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康生的一套"左"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因为有了中央的决定而得到完全制止。康

① 见康生1944年3月29日《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一文。

生却利用了决定中提出的，“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等提法，而把审干发展成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就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二千六百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报道这个大会的情况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决定精神的。可是，康生却将绥德大会的方针、方法全面肯定，并指令将这一材料印发各个中央局，以推广绥德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批转这份材料时说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成了以后肃反工作的重要方针。这一政策和九条方针的贯彻，才制止了康生在审干肃反工作中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抢救运动”持续数月。扭转这一阶段错误的甄别工作，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的。

延安各地根据中央精神进行甄别，结果证明，按照康生部署的一套做法，所挖出的特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搞错的，是冤、假、错案，这些被诬陷受冤枉的同志，获得了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抢救运动”时，他说，抢救运动时期发生了过火的“左”的毛病，过火要不得，群众的逼供信不好，九条方针中的两条：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在那时没有实行。抢救或硬救，只有群众运动，缺乏区别对待。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在甄别平反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向受了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说他是发号施令的。可是，主持

抢救运动的康生，始终未作半句自我批评。一九四四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个被关押在延安保安处的犯人。这些犯人就是康生坚持的“钦定”的内奸、特务。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了延安，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撤离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准，秘密杀害了。这就是康生对“一个不杀”的具体态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抢救运动”犯了过火斗争的“左”的错误。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翻案，仍然认为他搞的逼供信是正确的，并把他的经验大大发展，大大推广了。十年内乱不正是“抢救运动”的重现吗？在延安曾经被他点名的“特务”，“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被他“关照”，再一次被关进监狱。象曾经被他封为第一个被抢救的典型张克勤同志，就是其中一例。一九六八年，康生在北京接见甘肃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省的张克勤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应该抓住不放”，“甘肃地下党再有三十年也搞不清楚”云云，于是张克勤又以“大特务”的罪名关押了起来，并把张克勤开除党籍和公职，投入牢狱，其根据就是康生在延安搞的那些假材料！一直到康生死去，“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张克勤才又一次得到解放和平反。许遇之、杜征远、肖煌、彭尔宁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看，抢救运动经三十五年之后，被诬陷而受迫害的同志，才能真正平反，还其本来面目，也才能了结这桩历史公案！

第十二章

在土地改革中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不满和义愤，却没有引起康生本人应有的检查和应得的教训。不过他依旧仗势压人，在延安，在党中央机关，确实不灵了。特别是党的"七大"之后，他的"威风"随着他的实际权力的缩小而大大降低了，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要他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到群众中去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同本本上的一样，老坐在上层发号施令，不会不跌交子的。中央派他去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之后的十年，康生就离开了党中央机关。正是这十年，中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必须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指示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

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异常光荣的，是难得的锻炼时机。谁都知道，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并不象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从城市到农村，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到农村领导农民，以农村为根据地，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在中国从事革命，如若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的要求，也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便不懂国情，不懂中国革命之路，就算不上懂得革命，当然也不会了解毛泽东思想。康生，长期以来看重权势，无视真理，离开中国实际，自以为最懂革命，学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一套。其实，他到一九三七年为止，还未曾到过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他虽然到了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一直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工作。所以，他根本不懂农村。现在中央决定让他去农村了解情况，参加土改，这无疑为康生提供了一个真正改造的机会，以便让他去掉那些同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的恶习。

康生参与农村调查和土地改革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去陇东地区搞了一次农村调查。第二次，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七月去晋绥地区搞了一次土改试点。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到河北省平山县参加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第四次，是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到山东省渤海地区又搞了一次土改复查。前后持续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实际在农村不到十个月。

现在让我们看看康生是怎样活动的吧！

第一，陇东调查。

陇东调查是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委托，前去了解实行土地公债情况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成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返回。来回途中走了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时间虽短，但对康生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他自一九二五年参加党以来，已有二十二年，要说接触农民这还是第一次。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多多了解情况，好好了解中国农村，以弥补自己的严重缺陷。然而，他却以农村工作的行家自居，所到之处，夸夸其谈，大发指示。不仅如此，回到延安还大作报告。

二月二日，即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康生就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了他陇东之行的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四条结论：(一)"土地是一切工作的重要环节"；(二)当时土改运动中主要倾向是"与地主妥协的情绪"和分配土地上的"富农倾向"；(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处理，这样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四)"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二月八日，康生特别作了一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武断地说，整个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与地主妥协的右倾。二月十七日，又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大讲土改问题。他说：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进行；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倾向。

在康生的这些报告中，最为突出的有两条：一条是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同地主妥协的右倾，因此，主张要大张旗

鼓地加以反对；一条是说，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要把土改中的一切问题都交给群众去解决。康生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右倾，至今还没有材料来说明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康生这里所下的结论是仅根据陇东调查得出的。也许陇东地区在土改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与地主妥协的右的倾向，但这未必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就算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又未必是其他地区的主要倾向。然而康生却根据自己的调查，大肆推广，武断地说整个解放区的主要倾向是右倾，要各地毫无例外地去反右，这本身就是“左”的表现。至于明确提出放弃党的领导，主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其“左”的表现就更加明显了。真是，“左”根未除，遇有适当气候，则旧病复发。

第二，晋绥土改。

一九四七年三月，康生随军撤离了延安。正当他要东渡黄河之际，突然接到党中央关于要他去晋绥边区搞土改试点的通知。这样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土改工作。康生的这次土改，具体地点是晋绥边区山西境内临县郝家坡。他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到达的，同年七月，即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前夕离开的。前后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康生在这次土改试点中，确有不少花样，他自己也认为有不小的“贡献”：

（一）“搬石头”。这是对着我党农村基层干部的。意思是说，我党农村基层干部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是土改工作的“绊脚石”，必须予以“搬掉”，即撤职、清洗。尤其荒谬的是，我党农村基层干部在抗日时期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团结地

主”的政策，也成为包庇地主，阻碍土改的“罪证”，一一当“石头”搬掉，统统予以残酷批斗。这种错误做法流传甚广。可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不顾自己是“搬石头”的首创者，厚着脸皮批起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八年的土改中搞“搬石头”的错误来。

（二）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康生在土改中有一句名言：“运动未起来之时，照顾中农的利益，就是右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运动一开始就无所顾忌地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后来，康生还把这条“经验”带到全国土地会议上，竭力为其侵犯中农利益进行辩护。他说：“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即使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什么关系。”①

（三）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康生在土改试点中不顾中央关于划阶级的正确标准，在剥削条件之外，又增加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等条件作为划成份的标准。结果把许多本来是富裕中农、中农，甚至是贫农的人错划为地主、富农，从而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据晋绥分局兴县蔡家崖村的统计，由于受康生试点的影响，全村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超出实际地主富农户数的二倍多。

（四）乱斗开明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有两个著名的开明士绅，一为牛友兰，一为刘少白。这两位开明士绅，有爱国心，对于抗日战争有过贡献，是我党重要的统战对象。

① 1947年9月9日，康生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

然而，康生在土改中却把牛友兰先生揪来，对他说：你不是姓牛吗？那你就应该象牛的样子。于是指令人把牛友兰的鼻子穿了个孔，套上铁圈，拴上绳子，让其儿子牵着游街示众。沿路流血不止，影响极坏。后来，又想批斗刘少白先生，幸被中央得知，严加制止，方才未能斗成。

（五）对地主不加区分，乱斗乱杀。康生当时有一个论调，认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乱打乱杀成风，死人甚多，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怖气氛。至今晋西北人民谈到康生搞土改时的情景，还有些不寒而栗呢！

（六）在土改工作队内查出身划成份。对于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甚至把人家积存的一些生活日用品都给没收了。另外，还不准他们同出身好的同志一起吃饭，他们吃饭只能在右边，称之为“王八席”。

这就是康生在晋绥搞土改试点的一个概况。如果说康生的陇东调查，只是露出了他在土改问题上“左”的苗头的话，那么在晋绥土改中，他就将这些“左”的苗头，加以培植，扩大，并付诸于实施，从而创造了一条完整的“左”倾土改路线，给土改工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种“左”的错误出现不久，就被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发现和纠正了。为了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重新颁布了一九三三年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阐述了我党关于土改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

批判了“左”的错误倾向。接着，任弼时同志又利用养病时间，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土改情况，针对当时严重的“左”的倾向，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都对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成为正确进行土改的指导性文件。

这里我们应当提一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总结晋绥土改工作时所讲的一段话：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乙）晋绥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

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①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要讲晋绥土改工作之所以获得成功，从领导上来说即反了右又反了“左”。康生在反右反“左”中，反右有份，反“左”没有份。因为后期反“左”时他早已离开了晋绥边区。就前期反右来说，确有康生的份儿。然而反右有两种：一种反右是为了发动群众，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土改工作。这可说是以正反右。也有另外一种反右，则是打着搞土改的幌子，干着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蠢事，推行其“左”的路线。这是以“左”反右。康生的反右就属于后者。不可否认，康生的土改试点，对于一九四七年这次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来说，确实起了带头作用，但他究竟带了什么头，那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毛泽东所批判的种种“左”的表现，几乎没有一项不是康生所造下的罪孽。

第三，渤海土改复查。

康生是一九四七年底由中央派遣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的。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同半年多以前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是显然不同了。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不仅有了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搞土改的经验教训可借鉴，而且有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新精神为指针。因此，如果说前次搞土改试点，犯“左”的错误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次去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再犯“左”的错误就没有任何理由了。事实怎样呢？康生却照样推行“左”的一套。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2—1253 页。

康生到了渤海地区，借传达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为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复查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将山西的一套搬到了山东。甚至连当时中共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也被当作“石头”给搬掉了。康生还讽刺景晓村同志说：“你二十几岁就当区党委书记，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还晓村呢，你连自己都不晓得！”对于不执行他的“指示”的赵寄周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扣押起来，扬言要枪毙他，在干部中造成恐怖气氛。

康生不仅打一批人，同时也拉一批人。凡是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唯康命是从者，都成了康生培植的对象，依靠的力量。刘格平、王效禹、王力、关锋等人，就是在这时受到康生的赏识，而后来又都被推荐在“文化大革命”中掌了大权，有的成了打砸抢的首脑，有的成为制造内乱的头子！

康生不只着眼于渤海地区，而且还插手于整个山东省。山东革命根据地是罗荣桓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开创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共产党员。各级组织，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政策，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使根据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可是，康生硬说山东的共产党组织保护地主，实行富农路线，是地主富农党，并把当时山东党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华东局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其撤职调走。随后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予以排挤和打击，并趁机在山东党的各级组织中，搞了一次领导成员大换班，为

其在山东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了组织准备。

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康生则违背党中央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提出了所谓“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并对土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极左办法，结果，将晋绥地区的恐怖状态，引进到渤海地区，从而造成了更加恐怖的恶劣影响。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进行民主革命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挖掉蒋介石的社会基础，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康生的种种活动，以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为打击目标，以极左的办法制造农村恐怖气氛，弄得革命队伍互相猜忌，离心离德，使革命力量不是壮大而是缩小，在根据地内部制造了各种混乱，当然不会得到巩固和发展。他的一套做法，需要党的组织花很大力气去纠正，需要增补党的政策以防止其他地区效法康生！这就是康生在土改中留下的使人难以忘记的深刻教训。

第十三章

养"病"之谜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革命处在一个新的转变关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上海、南京、武汉等相继解放，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堵截追歼逃窜敌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于全世界，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即将矗立在东方。作为长期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又有多少繁重而紧迫的工作在等待着共产党员去承担呵！特别是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更是夜以继日的紧张地奔波着。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

康生的"病"，来的迅速，生的离奇。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在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怎么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病"就发了呢！这不是使目睹者难以理解吗？康生"病"发之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小姨子通奸而和老婆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就"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这不是贵人怪病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对外宣告说他有"病"了，因而，从此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他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五

月，在青岛荣成路四号别墅养了一年。接着，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初至七月中旬，去杭州养了两个多月。最后，又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医院养了五年。这样，前后共养六年多，直至彻底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了，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放过的时机，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康生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养“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养“病”之谜。康生是不是真的病了？他究竟患了什么病？说来也怪，康生的病是同他的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大小以及争夺的对手，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病”。这一次的“病”，完全是由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

事因还要追溯到一九四八年初。当时，康生结束了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被调任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做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康生岂能容忍？在他看来，排位名次，“七大”早定，权力分配不得越位！康、饶两人虽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入党，但因两人都是权欲熏心、野心很大的人物，所以，两人自调到一起，就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按他们固有的剥削阶级的政客习气，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康生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在康生领导之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另外，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康生继续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按康生的逻辑，大谬不然，满肚子不服气。因而，一心想把饶漱石排挤走，以便取而代之。而饶漱石呢，他也是一个有权不让，见权就争的人。他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特提议将原鲁中、鲁南、滨海、泰西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大区(相当于山东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让康生去任这一大区第一书记。这一提议既符合当时大军南下的需要，又经过了党中央的批准。饶漱石这个提议的目的，就是想以满足康生的权势欲望的办法，把康生拴在山东，以便将来华东局随大军南下迁往上海时，使之不能一起前往。这实际上是想把康生赶出华东局。而康生呢，虽然想在山东老家做官，但是他从未放弃做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想法。因此，他一方面欣然应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之职，另一方面又多方向中央暗示他可以离开山东去华东局任职。

不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与康生愿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华东局准备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这本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可是权欲膨胀的康生和饶漱石，都把这看作是他们长期争权的揭晓。饶听了中央决定，认为自己终算保住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争权的胜利者。康听了中央的决定，则认为自己没有争上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胜利者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失败者康生，却越想越觉得是降级使用，象吃了耗子药一样，心里总不是个味儿。心想，这是谁不信任我呢？是谁捣我的鬼呢？一定要抓住他，狠狠地斗，狠狠地整，叫他

知道我康某的厉害！现在只当一个省的书记，而且是放在华东局之下，特别是放在饶漱石之下，怎能甘心情愿地吞下这口气呢！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

康生的“病”因，不仅仅在于同饶漱石争权失利，而且还在于由争权失利出发，进而怀疑到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关于这一点，现有饶漱石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拍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为证。电报说：“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这个电报，确实反映了康生的内心世界。他诚惶诚恐，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的丑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反映意见。

其实，康生的“病”源，他自己吐露过一点真情。一九五四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句话，只说了“病”源之一，其他病源他早已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谈过了！

在康生闹“病”期间，其精神状况是处于极度空虚、颓废之中。他完全脱掉了那套虚张声势的伪装，业已习惯的革命词句和革命口号，也全然不要了。真是原形毕露呵。这里不妨略举几件康生在养“病”期间所干的丑事：

第一，生活糜烂，同其小姨子通奸。康生的小姨子名叫苏枚（又作苏眉、苏梅）。早年，康生在上海时，苏枚就为康生“住机关”。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离沪赴苏时，苏枚也随着到了

苏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苏返国时，康生又把苏枚带到了延安。一九四七年底，康生被派到山东搞土改，苏枚也随之前往。总之，康生走到哪里，也就把苏枚带到哪里。因此，早就有人怀疑他俩关系暧昧。只是慑于康生手中权力，他平时又装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样子，所以一直未被揭露。可是，一九五〇年五、六月间，康生带苏枚去杭州养"病"的这一次，由于精神需要寄托，地主少爷、风流公子的习性复发，男盗女娼公然放肆起来。这样，康生的老婆曹轶欧难以忍受，于是姐妹二人争闹不已，家庭风波打个不可开交。苏枚觉得暗的不如明的，妹妹争不过姐姐，不甘于败阵，为了赌气，便跳楼自杀。结果，虽然没有造成人命呜呼，却弄得风雨满城！

第二，查选票，图报复。一九五〇年，山东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此时，康生虽然闹情绪不工作，但他是中共山东分局的第一书记，当然要列入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果，康生入选，只是比起满票来少了十票。这本是正常之事，可康生疑心大起，怀疑山东分局的一些负责同志"捣了鬼"。他竟然破坏法制，侵犯选民的权利，指令人查选票，看看究竟何人不选康生，以便进行报复。

第三，疑心过分，诬陷好人。康生长期以情报、反特专家自居。名曰提高警惕，实为疑神疑鬼，诬陷好人。如果说这是他的职业病，那就是说，他的职业是专门害人！对其秘书沙韬同志的诬陷就是其中一例。康生装病躺下之后，疑心之"病"日趋加重。他怀疑中央对他不信任，怀疑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在反对他，怀疑周围的人在监视他。由于他怀疑过重，总觉得人们在怀疑他！康生怀疑他的秘书沙韬同志是被派来

“监视”他的，因而诬说沙是“特务”，“是饶漱石的小走狗”，“是坏人”，硬是将沙辞退。不仅如此，康生还加害于沙韬一生。一九五○年十二月得知沙被保送到人民大学学习，他就指使曹轶欧给中组部写信，说沙有政治问题，在人大学习不妥，应当调回军委联络部监视起来。一九五五年底，康、曹听说沙韬同志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非常不满，说：为什么不处理他，反让他做干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将沙韬同志投入监狱，继续整他。直到康生死后三年，沙韬冤案才得以平反。真是“秘书三载，班房十年”呵！

正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投入火热的战斗的时候，康生却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一边是严肃和紧张，一边则是荒淫与无耻。提起康生养“病”，不少同志便嗤之以鼻，因为揭丑者都知道他的阴私。

康生养病六年多，并没有停止他的坑害干部的活动。凡是被他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难逃的劫运。真是魔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灾难丛生。

不过，这个六年多，是不同于一般的。对康生说，很不得志，权力最小而且是不得伸张的时期，祸害所及，无非是直接接触他的一些人，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冤家”。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一段时间。我们党的胜利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受到康生的干扰和破坏，康生的黑手，没有伸到中央，特别是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前进得最为顺利。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康生和没有康生，显然是大不一样。

第十四章

抓理论，谈发展

一九五六年初，康生经过长达六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甦出蛰了。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是他长期窥伺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另一方面，他深知党中央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积他得志就猖狂之经验，欲攫取权力，必须接近最高领导者，欲爬上高位，得象藤萝一样，必须缠着树的主干。因此，他力争留在中央工作。党的“八大”选举结果，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他当然十分恼火，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认为应当含恨隐忍，以待时机，将来报仇不迟。

康生复出的活动情况，都在报上得到了反映。报纸是这样记载的：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越共总书记长征。

四月间，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接见过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出席过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参加党的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些活动中，康生都没讲什么话，没干什么事。只是为东山再起作些准备和预告。康生自己在这些公开场合出面，一方面是亮相，另方面是向干部表明，他又在中央工作了。同时，他也需要摸一摸政治气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一下环境。

党的"八大"，是康生复出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会。因而，他很想发表讲话。可是讲什么呢？他自己说，"曾经想在大会上讲讲四二年整风经验，但由于起草的稿子不满意未讲成；也曾想'抛砖引玉'，讲讲十大关系问题，但由于不象砖头，也没有讲成。"没有讲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他讲的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从他已经准备好但没有用的稿子看，他还想在"八大"会议上讲讲理论工作。他在这篇未出世的稿子中写道："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应制定一个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计划"；第二，"应充实并合理使用现有的研究机构，增设必要的新机构，有计划的培养干部"。总之，康生曾想在八大会议上讲的问题有三个。这三个问题都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这就是说，康生与过去不同，他已经探听到毛泽东同志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了，于是，他这次东山再起，就必须想尽办法夺取理

论工作的领导权，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康生看来，这里首要的是先拿到领导权。只有先拿到领导权，才能对下面被领导者进行威吓。然后再把这个领导权穿上理论的外衣，挂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词句。这样就可成为“理论权威”而通行无阻了！

为此，康生就千方百计去接近毛泽东同志。他听说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理论研究，于一九五五年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康生于一九五六年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同为毛泽东同志准备的办公室联在一起。康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月，即十一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康生根据自己的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①。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就真的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他自己的设想就一步步地实现了。

康生是怎样领导理论工作的呢？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向全体干部介绍《再论无产阶级

① 长期以来，康生以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身分到处招摇撞骗。其实，中央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小组”。他的所谓“理论小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之下的“理论小组”。

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曾讲了以下三点：第一，“《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第二，《再论》中提出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转化问题，是“毛主席最近对于矛盾问题的新发展”。第三，《再论》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五条，“这五条是我党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概括，是一个主要贡献。”这里所讲的三点已经清楚地说明，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决议精神，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突出宣传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着力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敲门砖，作为阶梯，以便敲开权力之门，以便爬上更高的位置。他用尽心机，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他认为这样就会敲得开，爬得上那种使其他人处于不能反对的地位。

事实正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时，康生到会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

几天之后，即三月十八日，康生又到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而这些新理论的“核心”、“关键”或“红线”，就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和转化的问题”。还说：“这是一个新问题”，“马恩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系统讲过”，斯大林虽然讲

过，但“不彻底”。

一九五八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又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就“发展”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在报告中，否定了“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特别解释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个“最高最后标准”，无疑是康生“超顶峰”的一个“发明”。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的大国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确实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康生怎样谈“发展”呢？他采用主观臆断、任意扩大的手法，说

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最明显、最突出、最全面”，是“全面发展”、“全面超过”，是“顶峰”，是“最高最后标准”，等等，等等。这哪里是谈“发展”，这完全是曲意逢迎，无耻吹捧，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当然，康生抓理论工作，不只是借谈“发展”来制造“个人迷信”，而且也是为了借谈“发展”，来制造整人的“棍子”和“帽子”。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观察处理问题的“最高最后标准”，那么，就得表示“拥护”和“紧跟”，就得将它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上，对其来不得半点犹豫，不能提出半点问题。否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就是康生刚刚开始谈“发展”的时候，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老婆曹轶欧，干涉起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来。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一九六〇年初，康生“发明”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入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大整特整。

再者，康生借谈“发展”贩卖私货，也是他抓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康生从来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些为

自己野心服务的谬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就非得把他的这些谬论强加于人不可，这就只好借助于“发展”了。在这方面，康生确实有一套特殊的本领，不管多么荒谬的观点，都可让它穿上“发展”的外衣，到处招摇过市，欺骗别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康生在河北省高校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自诩为“理论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大发议论，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一套的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厂长是国家代表，这是上层建筑，可是他又参加生产，也是生产关系，从李富春同志来说，他是计委主任，属于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来，这是十分明显的肆意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原理的荒谬论点。然而康生硬是把它打扮成“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拿来骗人。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康生曾为留苏归国学生介绍过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其中说到，按照毛主席发展了的观点，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同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不同了，完成之前“主要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而完成之后“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的”。这显然是后来所谓“以政治思想标准划阶级”观点的萌芽。从这个萌芽，可以清楚地看到，象“以政治思想标准划阶级”这样十分荒谬的观点，也是打着“发展”的幌子问世的。

此外，借谈“发展”还可把自己打扮成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理解得最深的“理论权威”，打扮成对毛泽东同志“无限崇拜和敬仰”的“忠实追随者”。关于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这

里不再赘述。

总之，康生在这次复出之后所采用的抓理论、谈“发展”的策略，确实起到了他所预想的“一箭多雕”的作用。借谈“发展”，即可制造“个人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又可美化抬高自己，标榜自己是“理论权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可诬陷好人，贩卖私货。可见，“发展”是康生的遮丑布、是护身符、是保护色、是万能法宝。在“发展”的幌子下，他可以说他想要说的一切话，干他想要干的一切事，实现他想要达到的一切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的这套策略是获得了“成功”的。康生自这次复出到病死，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尽管他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他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原因很多。从社会上来说，有“左”倾思潮的泛滥，欺骗领导使人上当受骗，民主生活不正常等等原因；从康生本人来说，还有善耍两面派，善于观察领导需要而逢迎，善搞一套政客手段等等原因。但是，不容置疑，抓理论、谈“发展”、制造“个人迷信”的策略，对于康生的后二十年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党来说，也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啊！

第十五章

“大跃进”的鼓吹者

一九五八年，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份，也是为中国人民难以忘记的年份，它确实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了“大跃进”的一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接着又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这样，使人觉得胜利似乎可以垂手可得，有的领导明显地变得头脑发热、骄傲自满，不怎么谨慎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作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然而，恰恰这时，康生表现得特别活跃，成了“大跃进”的鼓吹者。

康生主要精力，在于钻营逢迎之道，研究谗谄之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当中，他已摸到了如何把反右派扩大化，又如何搬用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绝招，以达自己之目的的门道。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康生已为自己的伸张铺平了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康生活跃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他知道这是批评周恩来、陈云同志的，他不管批评是否符合实际，只是观测风向，调整调门。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康生当然摸到了底数。在他看来，在社会主

义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和路线，被搁置在一边了。对此，康生颇为得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时机，是将积压多年的闷气吐出来的时候了！他知道，毛泽东在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怎么新？又怎样走？康生是茫然的，他熟悉的是“左”的一套，煽动狂热是拿手戏。于是，他精神抖擞，干劲倍增，决定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以三寸之舌，以吓人之面，去作煽动“大跃进”的游说。南宁会议一散，他就跑到四川视察了将近二十天。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和一次一届五次人代会之后，很快于二月二十六日出发前去东北视察了四十天。再次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一次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之后，从六月三日起又在北京、天津、河北视察了二个半月。八月，康生到北戴河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钢铁要翻番，即由五百四十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高级社要升入人民公社，教育要大办。出现了很多全民大办之事。在这种形势下，康生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跑到山西、河南、安徽、上海等地视察了二个月。康生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用了六个半月的时间，先后跑了九个省市。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停地鼓吹，不断地煽动，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我们已经超越了整个时代！他的讲话记录，现在已清查到的就达七十一份之多。如果把他的讲话连续记录下来，就是一部难得的《狂想曲》。

康生究竟鼓吹了些什么呢？

第一，“教育大跃进”。

所谓“教育大跃进”是康生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在辽

宁大专院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其含义何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康生在这次讲话中只是叫喊："当前影响教育大跃进的主要障碍是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过分强调正规化以及培养目标不明确等等"，要"实现教育大跃进"，就"要认真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解释。不过从这一叫喊中，人们已经粗略地感到，康生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秩序和教育中的一切规章制度。

果然如此。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召开的长达十八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先后五次讲话，全盘否定教育部的工作。他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把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搞"。还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花钱很多，但（花的）不是地方，没有（办学的）经济政策。钱多了，没有勤俭建国的空气，对学生思想有害"。并在这个会议上擅自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称这些规章制度是"绳索"，攻击教育部"吃罢（饭），没事（干），天天开绳匠铺，放绳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康生跑到华东师大又向师生煽动说：你们"要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你们对教育部过去的东西没有进行批评，那怎么行？这是基本建设。没有群众运动，要扫除旧习气是不容易的"。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康生又号召师生"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

随之，康生又否定了学校的一切。第一，否定学校的基础课教学。他说，基础课教学，"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

是“不结合实际的理论，虚假的理论”，是“被列宁称之为无用的累赘的东西”。① 第二，否定教学计划。他说，教学计划是“绳索”，“凡绳索都可取消”，因而教学计划也可“取消”。② 第三，否定按时上课。他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有的其实只要讲十分钟，结果（非得）凑四十五分钟”，“从前认为恰恰讲四十五分钟的教师是好教师，其实是最差的教师”。③ 第四，否定假期，他说，学校放假没有“科学依据”，“我问过许多生理学家，医学家，（他们）也搞不清。理由无非两条，一种认为学校是脑力劳动，所以要放假，但有个问题他们不肯回答，中央算什么？我想也是脑力劳动，为什么我们不放假。还有一个理由，学生年龄小要休息，但农村小孩，如果没有升初中，就没有休息，这又是为什么？”④

康生否定了这些，他究竟如何大办“大跃进”的教育呢？他讲“大跃进”的教育，分量很大，次数很多，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大跃进”，听众常常是“保守”的，所以听来感到他的话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我们还是从中看看他讲的几个要点吧：

一曰：“学校要停课劳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康生多次鼓吹的精神，决定“停课劳动建校”。康生得知后，立即赶赴现场大加赞扬，说：“这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并不神秘，挑土、挖泥、建人工湖，这就是文化革命的

---

① 1958 年 11 月，康生在听取上海市教育局汇报时的插话。
② 1958 年 10 月 16 日，康生在河南八院校汇报会上的插话。
③ 1958 年 11 月，康生在上海铜仁合金厂的讲话。
④ 1958 年 10 月 30 日，康生在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的讲话。

一部分”。并且极力主张人大师生“冲出红庙，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很快又从“停课劳动建校”发展成“下放劳动锻炼”。后来，康生对这些提法和做法，虽然有多次改口或声明，比如说，“停课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下放不叫下放，而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等等，但实质上就是把劳动看作是“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正因如此，他极力主张，“在现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指令全国一亿小学生“都参加炼钢铁”运动，要使学校成为“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曰：“学校要大办工厂”。这是康生“大办教育”中讲的最多的问题。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他向辽宁、江苏、河北三省高校和中学来京参观的同志讲：“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甚至连农林院校也不能例外。七月十九日，康生指责北京农业大学，“一进学校就是一种安静美丽的环境，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那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康生之所以如此指责农大和林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按照他的指令也去“大办工厂”。

三曰：“学校要走综合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康生有多种讲法。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所谓“走综合的道路”，就是“一个学校，最低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一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山西平遥一中视察时，

又指示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所谓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就是让他们，“同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就是把中学、小学和工厂综合为大学。十月十六日，在听取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汇报时又说，所谓“办综合大学”，就是“从初中一直到大学，象工厂的各种工序都有”，“初中以上归厂办，初中以下归车间办，幼儿园归宿舍办”。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视察鸠山红专大学时，康生又提出“全县办一个联社，全县是学校，是政权，是联社，来个政教社三结合”，大学要“打破学校的框框”，“加入县联社”。说这样做的好处，“便于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消灭资产阶级残余，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便于军事化、集体化、生产计划化，便于集体活动”。总之，康生的所谓“走综合道路”，就是办成一个工农兵学商五业俱全，大中小学幼儿园样样都有的，政教社结合为一的学校，也就是康生所说的便于消灭差别的综合体。

四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康生极力煽动学校“停课劳动”、“大办工厂”、“走综合道路”的目的。在康生看来，所有他下令要人大办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努力实现这些，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康生在同中央党校下放上海劳动锻炼的干部说：“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很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开始采取了纠“左”的措施，人们逐步冷静清醒起来，特别是领导人不随意说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一点康生是清楚的。但是，一

纠"左"，他已经唱了这么久的"狂想曲"又怎么再兜售呢？于是他采取了你搞你的，我唱我的，公开对抗态度。一九五九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抱怨说："去年以前，什么都是共产主义"，"可现在有些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苦干五年，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的口号都提出了怀疑，难道学校讲《共产党宣言》是搞社会主义吗？学校搞义务劳动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我们在民主革命就搞了共产主义大学，为什么现在倒不敢提共产主义了呢？"康生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人们，他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当党中央纠正这种荒唐做法时，他又采取什么诡辩手法进行抵制。仅仅这些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是取消教育、取消学校、搞"学校消亡论"。所谓"大办教育"，就是"大毁教育"。

第二，肆意打击、陷害知识分子。

康生在"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肆意进行打击、侮辱和陷害。因为，在康生看来，知识分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实现"教育大跃进"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八年五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把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康生的确是善于维护自己谬论的专家，常常摆出满腹经纶的架势，时而讲马列书上如何讲，时而讲党的决议怎么说，不然就是发展和创造！总是似乎有根有

据，使你感到他过去正确，今天正确，以后仍然正确！不管在他管辖的领域里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他都解释得别人百分之百错误，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领导反奸工作时，特务多似牛毛！现在他抓文教工作，知识分子又都成了敌对者！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康生在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宣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他还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剥削阶级，这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来划分的，而不是象土改时那样主要是从经济上划分的"，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说明他们"怕革命"。

由于康生将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所以，他竭力主张采取孤立、冷淡、威逼等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长会议上，就极力主张逼压知识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他说：现在对知识分子，"从总的来说"，是"逼得还不够"，"压得也不够"。怎么办？"如果现在是四面楚歌，那么我们今后就应该给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跑到安徽对农学院的教职员说，你们要统统到农村去，"不愿下去怎么办？不愿下去，要结婚，要找老公，也可以，但要弄清思想，要辞职，要开欢送会"。他对怀疑产量有浮夸的教授大肆叫嚷："有的教授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不点头，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三头主义'"，"问问他，谁叫你点头来？你有什么资格点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点头权，我们争的就是点头权，你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点头，我们越有信心，你点头反而糟了。你有摇头之

权。有几个摇头的有好处，都点头就危险。可以大鸣大放，就是有摇头权。我们希望你低头，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总之，是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康生在上海的一次汇报会上，公然主张：对于下厂教师“要冷淡，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为康生的恐吓政策所代替了。

第三，职工宿舍大调整“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职工宿舍大调整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由组织上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职工是非常欢迎的。这件事康生视察山西时作为一大“发现”大肆夸耀。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太原听到了阳泉市各厂矿职工宿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赶往阳泉市视察。在这里，他听汇报，作指示，又座谈，又参观。他说：调整职工宿舍是真正实现“两参一改”的关键，是改善人与人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是实现政治挂帅以及使生产领导又见人又见物的重要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很好形式。他认定：“这种形式，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为了放出这颗特大“卫星”，他立即撰文《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送《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向全国推销。

十一月十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干部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倒感到“工房分散实在

不方便”。

十一月十一日，康生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个尖端问题”。他还说:“农村怎样建设？有的主张把中小学集中起来，一万人口一个中心，(平原)周围直径五里，山区二十里，有的主张学校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房屋设计问题”。

这就是康生喧嚷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叫《论住宅问题》，那是一八七二年为了揭露和清算蒲鲁东派的思想而写的，这一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住宅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恩格斯这本著作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康生的大吹大擂，能给人留下什么呢？不过是梦呓的胡话和笑料而已！

第四，宣扬科学就是“胡搞”。

康生在煽动狂热的时候，说了许多热昏的胡话。如果这种胡话出自幼稚无知者之口，人们可以当作神话或童话，不予理采，可是出自康生之口，那就不能不听，甚至不敢不听了。人们怕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和他那样高的职务。

请看康生是怎样以公开否定科学，鼓吹“胡搞”，作为自己的行动哲学的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康生在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汇报教改情况时“指示”说:“象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安排教学已经不可能”，竭力鼓动他们“胡搞”，说只要“敢于胡搞就行”。十月二十五日，在视察河南长葛三中时，听到洧川小学汇报“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浮夸“经验”时，康生当即表

态，予以肯定，说："这种精神好！"并且指令长葛县县委，以长葛三中为基点，搞一个"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试验。十一月十日，跑到上海又说："河南有一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十天把三年的课程学完，且经考试及格"。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只要敢于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十月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用说书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又说，"从全国来说，中国的科学在大跃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科学大跃进"。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上海科学院农业研究所不如小孩，农学院有个教条，凡是不同科的（植物）不能接，小孩他就不管同科不同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同济大学视察时，又鼓吹搞钢铁也要"敢于胡搞"，说河南栾县就出了许多"小炼铁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吹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一九五八年）
康生在山西机床厂"红专大学"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搞反应堆、加速器、火箭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被这些吓倒了，只要胡动手，很快就能成功"。"你们要有一个气概，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什么一机部、二机部、哈工大、清华都不要管，就是胡搞就是了"，"胡搞就是科学研究"，"你们胆子要大"。十一月四日，在上海参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说："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基础上敢于胡搞，青年人是敢于胡搞的。"他指示说："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三百公里高空，就考三分，否则，就是二分一分，……三级火箭加卫星，得五分。这容易得很，上海人过年都放高升炮，学校难道不会放？"十一月七日，又要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说"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干"，"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要象河南人那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康生认为，有些话需要请马克思来支持，不然，怎么能和"理论权威"相应呢？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康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象马克思那样，允许讲胡话"。这就告诉人们，他的胡话都是经过马克思批准的。

不可否认，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因而，我们不好将这一错误简单的归结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这绝不是说促成这错误的每个人不可分析，大家都一样。事实上，促成这一错误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促成错误的出发点也不同。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利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到处煽动跃进，制造狂热，象持有上方宝剑的瘟神，散布康氏毒菌，使许多地

区和省市处在无法抵制的境地，这就增加了危害的蔓延，使之不能随着中央纠正错误而及时得到应有的制止。这就不能不是康生所起的特别作用了。

第十六章

在“反右倾”中推波助澜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逐渐有所察觉，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召开会议，从政策上采取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一些措施。但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许多“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按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本来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左”的。事出意外，仅仅由于彭德怀同志经农村调查后，出于忧国忧民，对“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就引起了会议主题的逆转和反常。随即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通过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的方式表达的。其主要内容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党从领导上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一九五八年“有失有得”，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这个意见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分析

了党应当吸取的教训。但是会议却认为这是对党的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于是纠“左”变成了批右，变成了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对这一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这样，“左”倾指导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更加发展了。

纠“左”是康生的疼处，从内心世界就有说不出的反感，道不尽的牢骚。要把自己到处宣扬的“跃进”宣言，收回来承认是“狂热性”，那真象挖了祖坟一样的难忍。一说反右，他象吃足了鸦片的烟鬼，象着迷的赌棍，一股子邪劲使他顿时活跃起来。康生得到了会上印发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之后，认为宝又押对了，于是与上海的同伙串联，研究如何从鸡蛋里挑骨头。他一面利用种种机会进谗言，一面又强词夺理造舆论，说什么彭的信是“反毛主席”的，诬蔑彭是“魏延反骨”，“搞分裂”，是组织“章罗联盟”，还说什么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同志拉过去了”。这种鼓噪，对于庐山会议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会议上作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的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这几位同志于八月三日至十日分别在小组里接受批判。康生正好同彭德怀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象他历来的调门一样，恨若仇寇，如临大敌，激昂慷慨，口沫四溅，又拿出他那股一九五八年到处煽动“大跃进”的劲头。康生批判说：“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他的话有的是诬陷，有的是假话，只有一句——“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吐露了一点真情，不过这个俱乐部是以极左的狂热凝

聚在一起的，结果危害了中国革命事业，迫害了大批实事求是的干部。

康生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庐山会议之后，更加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在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都留下了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声色俱厉的讨伐记录。其中以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批判最系统、最全面、调门最高、“理论性”最强。

康生以“理论权威”姿态宣布：现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进入到用理论去批判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究竟怎样用理论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呢？他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典型示范。

康生的确比向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高明得多，他对他所攻击的对象，用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手法，把本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革命家，化装成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然后蛊惑上纲：“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污蔑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这是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公开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凡是读了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干部，都很难得出这种奇特的论断。康生又作了“深入”的“分析”，硬要引导人们离开信件本身去挖掘：“彭德怀同志的信，开始说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末尾也讲几句好话。张闻天同志也是这个办法，这是这

次斗争的特点。这种人实际上拿种种借口，披上外衣，装作不反对的样子，实际反对。”看，把被批判者的好话，当作披外衣，装样子，照批判者的设想来定罪，这是康生对彭德怀等同志所作的第一点“高深的”“理论批判”。其实，这不过是唯心主义横行的展览，王婆骂街式的扣帽子打棍子而已。今天，我们重新打开彭德怀同志的信看一看就会知道，一片赤胆忠心，却被诬陷的不实之词所遮掩；完全是血口喷人，而被当作卫道来宣传！这该是多么深沉的历史教训啊！在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把一切错误的东西肯定下来。这样，既诬害了真正的革命同志，又糟踏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这正是康生多年来用的最多用的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招。

康生在报告中又说：“理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保卫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有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这个工作做了一些，但极其不够。如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答复。他讲的第六条，题目叫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问题。说党和毛主席‘对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很高的程度，干劲很大，但不讲条件，有些过分，造成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说党中央、毛主席‘只要政治挂帅就行，甚至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恶毒的攻击主席是好大喜功、不合实际、弄巧成拙、欲速不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于这些反党怨言，在庐山会议以后受到全党全军的反对，批得体无完肤。但做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必须进一步从世界观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对那些以种种借口反对我们主观能动性的

议论进行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我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他们反党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对此，要进行理论的揭发工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承认，而且首先承认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根本问题，但是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仅仅认为这一点就解决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就沾沾自喜了，不去研究物质、精神的相互关系，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相互关系，不能成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承认物质第一性，由此自满，而且从这出发，否定、轻视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的重大作用，是极端错误的，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康生这段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批判，可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的转述；后半部分是对这个发言的批判。应当指出，前半部分对张闻天同志发言的转述还是基本属实的，不实的地方就在于康生为张闻天同志戴了些诸如“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党怨言”之类的帽子。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的发言针对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诚恳的批评，这完全是出于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和拥护，根本不是什么“反党怨言”，更不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什么“恶毒攻击”。真正反对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专进谗言，一味迎合，竭力想把党推向错误深渊的康生之类。康生诬说张闻天同志“反党反毛主席”，这纯属康冠张戴，把自己的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这大概就是康生的所谓“大公无私”吧！更可笑的是，康生在这段话

中对张闻天同志所作的理论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主观能动性”，说什么仅仅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否定和轻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康生好象十分重视“主观能动性”！不过，他所说的那种“主观能动性”是“目空一切，旁若无人”的“胡搞”，是“不管同科不同科”的胡乱嫁接，是“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要干”的蛮干。这哪里是辩证唯物主义，纯粹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唯意志论！康生在这里虽然为主观能动性加上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定语，但由于他主张“胡搞”、“蛮干”，那么，他所加的定语，也只能是幌子，是用以掩盖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遮羞布。康生明明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然而却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批起别人的轻视主观能动性来，他真不愧为是一个善耍魔术的大师呀！

在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批判中，还有一段奇文，不可不引。他说：

“我们党的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改斗争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斗争中，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老干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比较少。有些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和家庭政治、经济、思想关系割断了。因此，老干部革命是愉快的，革命是革地主、富农、资本主义工商业家的命。和自己本身经济、思想关系比较少。但革命深入到消灭个体经济的时候，情况不同了，许多干部，包括老干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没有或很少，但和小生产者经济、富裕中农关系比

较多，某些人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个别人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种思想不是偶然的，和革命深入有关系。所以，过去的功臣，今天成为祸首。……有些老干部、老战友，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现在暴露出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路人。……这次整风，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根本性质和一九五七年是一样的，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可是表现形式不是在党外，而是在党内，表现在干部中，更主要是老干部，因而，两条道路性质的斗争表现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这样，必然联系到许多理论问题，……。"

康生这段话本是想分析"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然而却变成了对老干部必然成为"今天的祸首"的论证。康生认为，过去革命是革地主、资本家的命，老干部同地主、资本家经济联系少，所以，"革命是愉快的"；而现在革命是革个体经济的命，而老干部同个体经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愿革命了。这就等于说，老干部尽管过去是"功臣"，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必然变成今天的"祸首"。也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说老干部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同路人"。这正好为后来"四人帮"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康生在这段话中还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同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性质是相同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形式上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表现在党外，后者表现在党内。这就为后来"四人帮"所说的资产阶级主体由党外转移到党内的论点，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康生不仅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而且还竭力想在理论界找出个批判对象，

以便把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康生这时接到密告说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辽宁抚顺党校的谈话有问题。于是，他就如获至宝，立即揪住不放。

杨献珍同志讲了些什么呢？主要是批评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是“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批评“穷过渡”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穷骄傲”是“乞丐的骄傲”，揭露“五风”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唯心论”。这些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舒服，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纠正错误是有好处的。这些话是在极左思潮大肆泛滥，“五风”猛吹时讲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然而这却刺到了康生的痛处。

康生明明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本来他宣扬了唯心主义，却倒打一耙，反诬那些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甘居中游”、“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和“反马克思主义”等等。在康生的亲自策划下，对抵制“五风”的杨献珍等同志，进行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批判。从此，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则成为被批判者；鼓吹、宣传唯心主义谬论的康生，倒成了批判者、“胜利者”，从而造成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局面。

在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所谓“右倾”时，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发动了围攻。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在我国，这个问题激烈争论起来，那还是庐山会议之后。

庐山会议之前，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出版问世，其中关于同一性问题是这样写的：“象战

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是公开否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一观点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观点是对立的，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是对立的。在我国理论界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康生由此加以引伸去为自己的谬论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康生长期打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幌子，大肆煽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到处鼓吹“敢于胡搞就行”，把思想作为第一性，把物质作为第二性的。这显然是在宣扬“思维即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点完全是两回事，为了区分两种同一性，杨献珍同志写了一篇《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其目的是批判“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维护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发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和对立面的同一的‘同一’，这两个‘同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一个‘同一’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后一个‘同一’是说的‘统一体’，‘对立面的同一’，是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两个‘同一’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文章打出三份清样，除了作者留了一份外，一份给了陈伯达，一份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清样，感到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第一种“同一性”刺痛了他，因为他在一九五八年到处兜售的正是这种观点。于是，一口咬定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宣传形而上学观点。康生为了骗取毛泽东同志

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立即拿着清样去找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游泳。康生根本没有将清样拿给毛泽东同志看，只是简单地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他这样提问题，毛泽东同志自然根据《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回答说："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回答，显然是指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回答杨献珍同志提出的问题。可是康生硬说毛泽东同志否定了杨献珍同志提出的"两种同一性"的提法，授意报刊对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制造了哲学界所谓"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大争论。待杨献珍同志被康生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后，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学术观点，也就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政治批判。

康生为什么在一九五九年如此积极的"反右倾"呢？其目的无非有三：第一，这是他对自己极左的本能维护；第二，是为了掩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狂热煽动等错误而施展的以攻为守的策略；第三，有意要借"左"的指导思想去迫害"不顺从"他的干部，以达其危害党和人民的目的。

第十七章

在“三年困难”时期

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得到恶性发展，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赫鲁晓夫撤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六〇年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开始认真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指出凡一平二调者，必须坚决退赔。十二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中央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和广东调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调查组的活动。正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随着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央又相继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系列条例。一九六二年初，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这个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国民经济。事实

证明，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对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当全党，特别是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需要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之时，康生这个“大跃进”中的狂热煽动者，反右倾斗争中的急先锋，却突然转移了他的兴趣。过去那股狂热的劲头，频繁的指示，空洞的号召，严厉的挞伐，突然不闻不见了。他干什么去了呢？查查他当时的行动踪迹，方才得知，他去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去了。这时，他对开放诲淫诲盗的禁戏颇为热心。真是闲情寄趣，逍遥世外，似乎又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地主之家，当然，地位、权力、架势都远远不是一个地主阔少爷所能比拟的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的时候，康生刚刚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归来。他回到北京，不顾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同紧张战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完全相反，却热中于长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解放后一直禁演的《花田八错》。康生担心著名艺人不愿意或不敢照原样表演，特在演前亲自跑到后台鼓劲说：“你放手演，过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很象解放前上海滩上的青红帮头子那样：“出问题我给你顶着”。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大劈棺》、《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淫荡戏。

一九六一年新年刚过，康生就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先后到云南、四川。他不象其他领导那样，对国民经济遭到的破坏，

人民生活遇到的困难，感到忧心如焚，去做调查研究去了，而是充当钦差大人出巡"视察"来了。康生认为，管他什么国家经济困难，人民没有饭吃呢！只要我能天天嚼着山珍海宝、住着豪华宾馆，白天看看秀山丽水，古刹绝景，搜一些名砚名帖，珍书珍画，晚上兴致勃勃点上几出"过瘾"的旧戏即可。在云南，他曾点演了《辛安驿》、《十八扯》、《宝蟾送酒》等。当时，中国京剧院出国演出归来的同志，路过云南，见此情境，甚为吃惊。康生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吃惊，"那就非演不可了，你们也就非看不可了"。当时有人问康生为什么点演《宝蟾送酒》时，他反问说："你们在学校时为什么提倡读《红楼梦》？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宝蟾送酒》，真是怪！"在四川时，主要点演了《柴市节》、《战绵竹》、《十八扯》等旧川剧。康生看后，一再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到北京去或少到北京去。如果要去，必须防止一条：不要把川剧的特点给抹掉"。

同年二月底至三月，康生在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又借机点演了许多旧戏。其中有《十八扯》、昆曲《八阳》等。当他看了上海演的《十八扯》之后，在演员面前评论说："你们不行，你们不如云南扯得好"。

三月下旬，康生由沪返京。当时，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正在北京举行。三月二十二日，他特地赶到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即紫光阁讲话），不遗余力地鼓吹说："《花田八错》、《辛安驿》、《盗魂铃》、《十八扯》等都可演"。《宝蟾送酒》是"一出很好的戏"，"无论如何要传一传"。并责令某某某教教妓女戏《胭脂虎》，某某某学学川戏《柴市节》，某某某学学川戏《战绵竹》，某某某把河北梆子《红梅阁》搞一搞。要"把剧目搞宽一

点"，"不要太窄了"。此话一传，戏曲界的同志都为之吃惊，使"戏曲剧种挖掘整理上演"工作出现了混乱。据一九六一年七、八期合刊《戏剧报》报道，当时北京就上演了《打樱桃》、《盗魂铃》、《一两漆》、《胡迪骂阎》、《打砂锅》、《浣花溪》、《双摇令》、《顶锅》、《王宝钏》等。上海戏曲界也根据康生讲话精神搞了个传统剧目会串，公开演出了《十八扯》、《顶花砖》、《翠屏山》、《大五花洞》、《花田八错》、《虹霓关》、《七侠五义》、《荷珠配》、《战宛城》、《打侄上坟》等剧目。

一九六一年十月，康生对于昆曲《李慧娘》正式公演表现了特别的热心。昆曲《李慧娘》是北方昆剧院于一九五九年请孟超同志改编明代传奇《红梅记》而成的新作。孟超在改编过程中，多次请康生提过意见。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并且提过不少修改意见。一九六〇年彩排期间，康生多次到剧场观剧，出主意把李慧娘所戴的蓝色鬼穗子改为红色鬼穗子，并且为剧本改词，把"美哉！少年！"叠句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间正式公演。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甚为满意，特写信给作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康生除了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表演之外，还说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称赞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指令"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一九六二年春天，江青到杭州"养病"，康生也去杭州休养。江青要看戏，康生就帮着点戏。从三月二十日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江青戴着大口罩，由康生陪同，差不多每天都到剧场看戏。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早已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如《虹霓关》、《大五花洞》、《斩

黄袍》、《战太平》、《沙桥饯别》、《打銮驾》等。这是些什么戏呢?《虹霓关》,内容极其低级庸俗。讲的是隋唐时的瓦岗寨将领王伯当杀死了虹霓关总兵,总兵老婆东方氏披挂上阵,为丈夫报仇,但是一见王伯当年轻美貌,顿时神魂颠倒,爱上了王伯当,就在战场上调情卖俏。江青特别欣赏这种调情卖俏,说"舞蹈很好"。《大五花洞》,写一群妖魔鬼怪变成四个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公堂上胡闹,嘲弄县官。在旧社会,这出鬼怪加色情的戏,是流氓、把头用来显示女演员色相的。演员对演这种戏历来是抵制的,解放后早已停演,而康、江非看不可。《斩黄袍》,讲的是北宋初年,赵匡胤的歌姬韩素梅玩弄阴谋诡计,爬上了"梅花宫贵妃"的位置,对于开国大将郑子明竭尽诬陷,险些动摇了北宋中央政权。康、江对韩素梅这个人物非常欣赏。当他们点看《战太平》和《沙桥饯别》时,杭州京戏团当时没有演这两出戏所必备的红蟒和红靠,不得不两次派人坐专车到上海去借,当天赶回。这就是一九六二年春天,康生和江青在杭州看戏的情景。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对《桃花扇》一剧又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五月四日,他亲自写信给北京人艺导演梅阡、孙敬雨二同志,谈他对剧本的修改意见,要他们"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七月中旬,《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对于欧阳予倩改写的话剧《桃花扇》流露出否定的情绪,康生看了甚为恼火。他说:"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把侯方域作为正面人物歌颂,而不揭露他降清行为,是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欧阳改编的话剧在政治上比原著好,只是艺术

上有缺点。目前要演这个戏还是以欧阳的改编本为好。报上的文章对这个改编本流露的情绪不好，应该批评。”

戏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我国的传统戏剧，需要认真研究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继承和发展。康生热中旧戏，并非出于这个目的，而是欣赏其中的低级庸俗、色情淫荡和封建迷信、奇案、怪盗之类的东西。不但自己欣赏，而且凭借权力让人演出，极力推销。当然，在这里，不是否定我国的传统戏剧，我们的很多传统戏剧为人民喜闻乐见，有不少是文化珍品。特别是解放后重新改编搬上戏台的戏剧，使它们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成为教育陶冶群众的一支力量，象昆剧《李慧娘》就是戏剧舞台上出现的一朵新花！

应当指出，康生陶醉和鼓吹旧戏，并非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

早在延安时，康生就故态复萌了。关于这一点，他在后来有过一段表白。他说：“那时，戏曲不象现在，在全国、全世界都吃得开，而是到处吃不开，没人敢看，谁演谁就是反动思想。这帽子没人敢戴。那时，我在党校工作，因为在中央党校，人家批评时要看点面子吧，这我戴一戴看，我们就演戏了，……职位也有个好处，我想我是个中央委员，我来打鼓，你们批评吧！有没有人批评呢？有，但是在背后骂得一塌糊涂，明着确实有点不敢，公开讲有反对中央的嫌疑。……毛主席总是在政治上撑着，演戏就去看，你们说京剧有封建意识，但不能说毛主席有封建意识吧？用这样的办法才撑起来。”

康生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曾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方昆剧院举行建院大会。康生在大会开始前就赶往文化部送了一封祝贺信，并在纪念册上题了“作始也简，特毕也巨”八个字。建院的各场演出，他几乎一场不漏地一一观看，对其中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康生特地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康生直奔后台大发雷霆：“我要给你们泼一缸冰水！”“服装改变太大了，比海派还大胆。”“如果有人提出要取消北昆剧院，我举双手赞成”。并说：“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还强令北昆剧院“立即排练演出旧的《红娘》，不准改动一点！”事后，还召集了文艺座谈会，专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进行围攻。充分暴露了康生反对戏曲改革与创新的本来面目。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康生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剧跃进情况及六〇年打算，在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同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座谈中，他提“首先要挖掘老戏”，说“传统戏无论如何不能丢，昆曲、京剧还是以演传统剧目为主”。当他听到几位“传”字辈老师说，他们原会昆曲三百多出，但现在只教了一百多出，他立即说：“一定要教下去，学校无论如何要把三百多出戏教给学生，不然，越唱越少，是自己消灭自己”。

一九六〇年七、八月间，中国京剧院对于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叉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看后极为不满，指责两位负责的同志说：“是粗暴的代表”。同时，他曾对人说：“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看！康生对于维护旧戏，反对改革，其态度是多么显明！立场是多么坚定！历史又是多么悠久！

可是，事隔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天，康生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京剧传统戏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的这种龙卷风，刮得人们晕头转向。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突然对孟超的长女陆原同志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回到北京正准备参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他又给孟超写了一张条子："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康生为什么这样急转弯呢？原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讲话。他认为这又是坑害人的时机了，需要为翻脸不认帐作准备了。

到了一九六四年，江青跃跃欲试，要搞京剧"革命"了，要当"旗手"露峥嵘了，康生当然摸得准跟得紧，腔调和面孔都需要相应配合。

同年年初，康生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改编的剧本拍摄的《桃花扇》，竟不顾两年前他对欧阳改编本的赞扬，斥责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又因为影片《桃花扇》聘请了北昆的一位同志为音乐顾问，选了一位演员的唱腔，康生就非常专横地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后来，他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同年八月三十日，康生又一反过去反对戏剧改革的面孔，变成了京剧改革的激进派，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说：这次会演"给了过去反对京剧改革、反对演

现代革命戏的一切错误理论以有力地回击"，"证明了京戏现代化、革命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报告中还指责北京剧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本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接着上纲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相反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最后，他责令北京剧协对"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作出答复；责令各地剧协对出现演旧戏的问题，"都要彻底检查一下！"

康生把自己带头煽起大演旧戏之风的事实全部抹掉之后，把自己支持、赞扬《李慧娘》的全部事实赖光之后，再要人"答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谁能答复呢？当然是无人能够"答复"的。最后还是康生自己答复说："六二年我才发现，我们共产党内部有的高级负责同志反对党的这个方针（即江青的所谓"京剧革命"的方针），进行反党活动。这些反党分子拉拢戏剧团体的人在他们的周围，你们西北方面的剧团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北昆剧团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反党分子有时候也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同志们不晓得情况，利用你们向党进攻，扩大他们的影响……。"象康生这样的"答复"，只有康生最清楚，别的任何人都是无法答复得使康生满意的。除非跟他一样制造弥天大谎！康生还批判《李慧娘》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康生就是用这种耸人听闻、信口雌黄的罪名，一下子把《李慧娘》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本来专门鼓吹传统戏中的糟粕的就是康生，可是现在，他却要别人“彻底检查”了！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使人服气的。在观摩大会的一期《简报》上所载的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浙江省观摩团指出，一九六二年“某中央领导”在杭州点看旧戏。他们说：“有的反复是下面来的，可有的反复却是从上面来的”。当时中宣部负责同志看了《简报》后批道：“请文艺处调查一下，是谁点看的，要吸取教训。”一调查，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和江青。当时中宣部的负责同志立即将调查报告连同《简报》一并批给“康生、江青一阅”。这下可戳穿了假象，然而也犯了“御禁”。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在调查报告上批了一大堆话，说她当时“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看过戏，没有点过戏，按报纸上登的剧目看的，看了《虹霓关》提出过批评意见”云云。接着，江青又给中宣部打电话，说她几夜没有睡好觉，浙江有人陷害她，并责令华东局、浙江省、杭州市，还有文化部的有关同志“写检讨”！然而康生却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虽然同江青一样，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但他除了在自己名字上划了个圈以外，并没有象江青那样在调查报告上乱作批示。可是后来的所有报复行为，没有一件不是他参与的。正是在江青、康生的报复之下，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不仅在当时受到批评指责，被勒令“检查”，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说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并为此株连了数十人之多，有的被揪斗，有的被关押，有的积郁成疾含冤而死。《李慧娘》的作者、导演、演员以及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同志，也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作者孟超同志把康生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交给了“专案组”，

但是没有想到掌管他的专案的就是康生本人。这两封信，自然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不仅如此，康生为赖帐灭口，竟将孟超定为“叛徒”，使孟超沉冤难雪，抑郁成疾，含恨而亡。

康生在三年困难中，和平时一样为非做歹，不过他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加突出罢了：一方面为炫耀自己，不顾事实真象；另一方面，为陷害别人，不择任何手段。

第十八章

《刘志丹》奇案

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刚刚渡过，中共中央于八月在北戴河、九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肯定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决定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要求全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继续斗争。这是会议的正确方面。但是，会议也有某些错误方面。当时，彭德怀同志由于对过去诬指他“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不服而向中央写了长篇申诉信；在农村，由于经济困难而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了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不正之风；另外，封建迷信也有些抬头。对于这些情况，要是认真调查研究的话，是会作出科学分析的。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指导，会议片面夸大某些“敌情”，把上述一切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是翻案风，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而又重提阶级斗争，大批“单干风”和“翻案风”，并且把社会主义一定阶段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夸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使康生的思想有了扩散的市场，也为后

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在这种气候下，康生顿时又活跃起来，一心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作文章。他到处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以达其害人的目的。小说《刘志丹》就是他借以制造冤案的材料之一。

《刘志丹》是一九五六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定了一个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这个计划中的选题之一。作者李建彤，最初考虑这题目太大，而自己思想、艺术准备不够，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是否应约有些犹豫。后经工人出版社的同志的动员，方才答应下来。本来一部艺术作品的写作和出版，特别是以革命烈士为体裁的作品，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不会受到阻挠和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一些熟悉刘志丹同志业绩的老同志，最初并不知道李建彤应约写《刘志丹》之事，但当他们知道李建彤决心要写，并已积极搜集材料时，他们都高兴地鼓励作者写好。作者经过两年准备，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动笔。一九五九年夏，当作者写出第三稿时，出版社就想公开出版，但是习仲勋同志认为没有写好，给否定了。后来，作者又接连写出了四、五稿以及准备定稿的第六稿。从这部书创作的整个过程来看，目的和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阴谋的问题。

可是作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特殊的警犬似的嗅觉，又开始搜罗“阶级斗争”新动向了！适逢《刘志丹》第六稿的若干章节被《工人日

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选出并开始连载之际，康生突然得到有关该书出版情况的告密，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于是，《刘志丹》及其作者，便大祸临头。康生立即命令上述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康生善于根据自己的想象顺藤摸瓜，相继株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很多人引入迷魂阵。他诬蔑习仲勋"勾结"刘景范及其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历代的奸臣，都是靠欺上压下，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金科玉律"。康生承袭了历代奸臣的手法，随意诬陷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曾写条子向毛泽东同志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同志只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念了念这张条子，他就到处宣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后来竟然把它编入了新的《毛主席语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的积极煽动，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是这一反党集团篡党篡国的"纲领"，马上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立案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

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彤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另外，还把西北五省的大批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诬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从一九六二年一直整到一九六六年都定不了案。

"文化大革命"中，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更是变本加厉。康生声称他要"继续算《刘志丹》这笔帐"，并亲自窜到作者机关公开煽动说："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李建彤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不算革命"。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诬蔑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说什么"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历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这还不算，康生还把天津高校的一批"红卫兵"调来北京，进驻作者机关，联合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成立"六二专案兵团"，在全国建立联络站，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长沙、延安……都贴上揪《刘志丹》小说的大字报，甚至把刘志丹、刘景范都诬为"叛徒"。康生还把他们搞了四年的专案材料，没收的采访记录，统统交给了"红卫兵"，让他们按照记录上的名字，到全国去揪人。

因小说《刘志丹》而被株连的情况，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解放军报》曾刊文作了如下揭发：

"习仲勋同志，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审查了十六年，关押了八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同志，撤职下放，'文化大革命'

中被害死在(北京)郊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同志,'文化大革命' 中被关押六年。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同志,在一机部被斗死,说是因为他为小说提供了'炮弹'。湖南省劳动局的副局长刘宗焕同志,被沉在河里,含冤而死。原工人出版社的社长高丽生同志受尽肉刑,折磨致死。该单位的吕宁同志被打成内伤;周培林同志受了电刑;该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只给三十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困中病死了。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边界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就连习仲勋同志在饭馆里吃了几次饭的一个饭店经理,也遭逮捕,说他是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株连到烤鸭店的经理、湖南饭庄的经理。仅这个行业,株连五十几户,逮捕十几人,死了五、六人。"

这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小说《刘志丹》冤案的一个概况。

康生为了制造这一离奇案件,究竟为小说《刘志丹》捏造了些什么罪状呢?

第一,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是康生听了密告,还没有来得及看书的情况下,信口说出的一条罪状。众所周知,刘志丹同志和敌人打了一辈子仗,同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奋战了一生,同战友们一起为团结群众,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毛泽东同志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赞扬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这是集人民群众之心而立下的纪念碑,是任何刀斧都砍不掉的纪念碑!怎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里，共产党人写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烈士，写象刘志丹这样的英雄，反倒成了“为高岗翻案”！成了“反党阴谋”！岂不怪哉！原来康生有着自己的逻辑：既然刘志丹和高岗共过事，一块创建过陕甘革命根据地，那么，高岗是坏的，刘志丹就不能是好的，说刘志丹好，就是说高岗好，就是“为高岗翻案”。这显然是打着维护后来中共中央关于高、饶反党集团决议的幌子，否定过去刘志丹流血奋斗的历史。高岗成为反革命是建国以后的事，高岗后来变坏，在康生看来，他原来也坏，生来就坏，一坏到底！其实，说穿了，所谓不许“为高岗翻案”，就是不许宣传刘志丹！但是，鉴于中央对刘志丹早有定论，康生不敢外露，便强词夺理地说：“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其实，小说中的罗炎，是用五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的，他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只是罗炎。康生说罗炎是高岗的唯一根据就是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罗炎也给照金送过信。在康生看来，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别人就不能再送信，一送信就成了高岗。且不说小说中没有高岗，即令有高岗，那也是历史事实，也构不成翻案啊！

第二，说《刘志丹》“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本来，小说《刘志丹》中的人物，除了几个烈士之外，全是虚构。小说并未写习仲勋同志。虽然小说人物多系虚构，但却反映了真实，它是西北地区无数革命先辈英勇斗争的集中表现。对于这些人物，不管是指名道姓的也好，还是通过塑造典型也好，都应该大书特书，尽情歌颂。然而，时刻梦想篡党夺权的康生，却对宣扬这些人物怕得要命，说什么这是“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其实，他这是拿着“篡党篡国”的帽子，以害

人的策略，来掩盖、实现自己真正“篡党篡国”的野心。

第三，说《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

这是由何说起呢？原来，《刘志丹》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强调刘志丹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求教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表示“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样子去做，去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说过“井冈山是咱们的希望，也是咱们的榜样！”等等。意思是说，陕甘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康生却说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假若一定说这是“剽窃”，岂不“剽窃”得越多，革命胜利得越快，“剽窃”得越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才可以燎原于全国吗？然而康生却说这种“剽窃”是一种罪恶。这不就充分暴露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又是什么呢！

第四，说《刘志丹》“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写《刘志丹》，当然要写同刘志丹连在一起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要写这一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实行武装割据的。当时中央不仅希望建立一块中央苏区，而且希望苏区遍布全国。事实上，当时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全国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好形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小说《刘志丹》，反映了这种好形势，描述了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而且特别写明这块根据地是学习井冈山，照井冈山的样子建立的。为什么一写这块根据地就是“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呢？原来，在康生看来，井冈山道路的发明权和通行权只能统统归于中央根据地。别的地方不仅不能早在中央苏区之前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不能在中央苏区

之后跟着走井冈山道路。就是说，井冈山道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显然是打着突出中央苏区的幌子，反对对中国革命同样作出贡献的所有其他革命根据地。

凡此种种，康生为《刘志丹》作了一个结论：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怎样“反党”呢？就是因为小说歌颂了刘志丹和无数革命英雄，描写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宣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见，“反党”一词的含义，在康氏词典中，同在革命人民的词典中，是何等的不同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真正含义，原来是说，利用小说《刘志丹》，制造冤案，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是康生的一大发明！

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奇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第十九章

阴谋和“理论”

我国的理论战线，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一样，经历过不断地瞎折腾，遭遇到沉重的灾难，特别是康生主管理论以来，理论工作者陷入了魔掌之中。我们仅就哲学界的“合二而一”问题，看看康生领导理论工作之一斑。

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怀着宣传辩证法的热情，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短文。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文章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究竟事物是不是“合二而一”的？这本是理论界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地展开讨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可是，这一问题刚刚提出，康生象是抓住了整人的把柄，竭力施展了他的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大兴问罪之师，对其大加讨伐。

康生是怎样组织对“合二而一”问题进行围攻的呢？

第一，秘密部署。

《光明日报》收到艾恒武、林青山的稿子，编者拟予刊用。排出清样，除送作者外，也分送康生审查。同时，也送一份给康生的亲信——关锋审阅，因为关锋是康生在哲学界的一个

打手，他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拉了一帮子人组织了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他消息得的快，气候摸得准，跟着康生的指挥棒，又出击得迅速。由于有所仗势，说话气粗，架势吓人，象个封建把头，唯康生之命是从，是个通天的重要门神。所以不少朝拜者，总要到他那里去烧香。

康生看了清样，喜出望外，不由得哼起京剧来了。按一按出鞘的剑，自有如意算盘！他断定：艾、林既然都在中央党校工作，那一定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决心抓住不放。关锋看了文章清样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是一条大鱼”，“不能让它缩回去”。这究竟是有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我们暂且不管，反正两人的目标完全一致了。康生立即把关锋找到跟前，密定要借此兴风作浪，为此，他们一方面，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另一方面，指令“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出出击的文章。显然，康生为了“有意识的搞一下学术斗争”，“引起大家讲话”，而积极准备钓大鱼的“诱饵”！

此间，中央党校曾两次请示康生：“‘合二而一’是否正确？”尽管康生早有定见，但一直避而不答，反而指示中央党校要查一查谁先提出“合二而一”的；“可否就艾、林文章进行批判？”康生说，哲学界会讨论的，党校领导不要急于表态，并再次指示要查一查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证据。目标既然已定，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把矛头集中在杨献珍同志身上。他设置的陷阱，必须逼人跳下去！

第二，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引蛇出洞”。

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一切准备妥当。康生是以“情报专家”自诩的，对于学术理论也象他早已习惯了的肃反反特一样

地部署。他指令《光明日报》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快登”出来。这样，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就先登出了艾、林的文章；一星期之后，即六月五日，又登出了经过密谋而炮制的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一来一往，真的摆出了学术讨论的架式。

康生对于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特别重视，亲自把关修改。他看了这篇文章后，立即找作者说："文章总的还可以"；只是文章后面提出一个公式，即“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进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新事物出现，又有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再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不知“有无把握”。康生又说："对此我无研究，……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不然）人家抓住小辫子，反而麻烦。”寥寥数语，就足以证明，学术讨论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招牌，惯于整人才疑心被人抓住小辫子！

不仅如此，康生还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一起，对于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都是费尽了心机的。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升级和反击，都要仿效反右派的做法，每一篇都要经过具体研究和安排。开头一段时间，或者把赞成“合二而一”和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上，以示不偏不倚；或者搞轮流突出，这一期把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下一期又把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总之，表面看来象是学术讨论，其实，则是“诱敌深入”。一些不知奸诈成性的康生底细的理论工作者，有的信以为真，便积极写稿给报社，表示支持“合二而一”。

第三，撕掉面纱，凶相毕露。

经过一段所谓"学术讨论"，到七月上旬，康生准备公开"揭盖子"了。他一方面指示中央党校加紧追查"合二而一"的所谓"后台"，发动全校教职员工对杨献珍同志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又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赶紧草拟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七月十五、十六两日，康生亲自主持会议逐字逐句地修改批判杨献珍同志的这篇文章。修改定稿后，以什么名义发表，康生也煞费苦心。起初他想用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然而一再易人，都感不妥。最后决定以中央党校的同文章并没关系的两位同志的名义发表。这样，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就在康生亲自导演下于七月十七日公开见报了。这一举动的意图何在？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他说："六四年'合二而一'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第四，升级和围攻。

公开点了杨献珍同志的名之后，康生说："点名批判之后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下步《红旗》要开展政治批判"。按照康生的这一计划和步骤，康生亲自指挥《红旗》杂志，根据"'合二而一'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写了一篇康生授意而又不署康生名字的文章。文章以什么名义发表，康生又绞了不少脑汁。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吧，康摇头说："从文章水平来看，用'评论员'的名义，分量重了"。用

“本刊记者”的名义吧，康又摇头说：“如用‘本刊记者’名义，会使人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他设计出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名义，叫“本刊报导员”！由此可见康生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不管文章用什么名义，都以康生的既定方针为准。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所有文章就得反复论证这个观点的危害性。他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所有舆论也就一再宣扬开展斗争的必要性。表面看起来，康生指挥的这场斗争很热闹，实际上不过就是那么几句吓人的空话。

康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说：“合二而一”，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后来，他曾经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要把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五日，康生又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迅速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① 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这些都为康生在全国范围内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作了准备。

① 康生把赞同“一分为二”观点的，叫做正面意见；把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叫做反面意见。

所谓政治批判，就是把被批判者的申辩权利予以剥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被批斗了。当时，他们对待赞成“合二而一”的同志采取了会下攻心、会上交代、报上鞭鞑相配合的形式，攻势凌厉，来势凶猛，确有一举消灭“合二而一”之势。这次批判，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之广，迫害之惨是罕见的。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杨献珍同志除了被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了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不顾他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同志，因和杨献珍同志一起工作，竟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也被逮捕入狱。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同志，早在一九六三年就调到陕西省党校工作了，同“合二而一”论没有牵连，仅因同杨献珍同志“划不清界线”，也千里迢迢从西安揪回中央党校进行批斗，一直被逼含冤而死。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仅因讲了句“‘合二而一’讲少了”，一九六四年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含恨而死。至于林青山同志，则作为“祸首”的“马前卒”，被撵出中央党校，轰出北京，到东北一城市菜店卖菜去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个江苏省的解放军战士陈波同志，曾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军区特等射手，多次出席过省军区先进代表大会，就是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而被处死碎尸。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因赞成“合二而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被处分、被流放、被关押等等，已无法统计了。但从中央党校的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全国因“合二而一”受迫害

的大概情况。据统计，一九六四年，中央党校因“合二而一”受株连挨批判者有一百五十四名。其中受党籍和行政降级处分的有七名同志；受重点批判的有四十五名同志（学员十三名，干部三十二名）；小组“帮助”的有五十名同志（学员四十二名，干部八名）；虽然没有“重点批判”或“小组帮助”，但也在档案中被塞进了黑材料的有五十九名同志。这只是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又都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因此，一提“合二而一”，人们便谈虎色变，成了理论禁区，好象它真的象康生诬蔑的那样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宣扬调和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康生在攻击“合二而一”的时候，总是振振有词，从“本本”出发，大量引经据典。然而他却卑劣地隐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使用“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并非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① 明确无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合二为一”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也说：“‘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页。

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上的概念了。"他又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① 这里阐述得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不应当引起任何误解。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用的是"合而为一"，同"合二而一"有什么本质不同呢？能不能说"合而为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呢？除了别有用心者外，是不能这样说的。如果说"合二而一"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的话，那末，第一个"背叛辩证法"的就是马克思，接着是列宁。显然，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康生的权势可谓大矣，他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如此"理论权威"，人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这完全是对"合二而一"的肆意歪曲。本来，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这正是承认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斗争，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斗争的统一体，这同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毫不相干。他硬是这样说，这正好暴露了他把自己对"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强加给主张"合二而一"的同志了。在他看来，正象"一分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8、10页。

为二"是排除任何统一的斗争性一样，"合二而一"就是否定任何斗争、矛盾和转化的同一性。这难道是辩证法吗？马克思好象预见到将来必定会有那么一些不肖子孙出来歪曲他所说的"合而为一"，因而特别说明："合而为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无怪马克思曾借用海涅的诗句慨叹过："我下的是龙种，出来的却是跳蚤！"列宁首次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概念时，也曾预见到将来会有人歪曲这一概念，因而紧接着解释说：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否定斗争，排除矛盾，反对转化，他所抓到的唯一"证据"，就是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他认为，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就是否定统一体可以破裂，否定事物可以质变。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清楚这里所说的"矛盾双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意思。当着条件改变时，原来的统一体无疑会破裂，矛盾双方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不再存在。

这里我们需要看看被康生打击的主要对象杨献珍同志的主张究竟是什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九七九年《哲学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杨献珍同志于同年二月改写的一篇《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的文章①。文章一开头，首先作了如下三点声明：

① 该文收入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一书第245—251页。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从一九六四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己有，欺世盗名。

“(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地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1964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一分为二’在宋朝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他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易》)又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类语》六十七)明朝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于天启四年(1624年)在他编著的《类经》一书中也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主张。在该书第二卷《阴阳类》一开头，原文是：‘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张景岳注释：‘道

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①'合二而一'为明朝思想家方以智于永历六年(1652年)前著的《东西均》中提出的，在该书的《三征篇》中方以智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

杨献珍同志把"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作为"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他说："前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为二'，后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二而一'，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可以看出，康生所强加给"合二而一"上面的一切批判都是荒谬的。那他究竟为什么对"合二而一"大加讨伐呢？假若当初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是为他贩卖"分裂哲学"、"斗争哲学"、"整人哲学"扫清道路，为他推行极左错误提供哲学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提出"斗争就是政策"，"斗争就是一切"的口号，搞随心所欲的"斗、斗、斗"；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大搞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在反对阶级调和论的幌子下，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随意害人，推行"全面专政"；只有批

---

① 《类经》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35页。

判“合二而一”，才能借口“路线问题”，大揪“走资派”，搞什么党内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以便把革命领导干部一批批地整掉，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很清楚，虽然“合二而一”是作为学术探讨提出的，丝毫没有康生所捏造、诬加的那些所谓“政治背景和企图”；可是，康生对“合二而一”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大加讨伐，却是实实在在地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和企图的，这就是为他的阴谋服务的。只不过是，康生的阴谋在这里采用了理论形态而已。

第二十章

“文革”前夕三绝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而康生表演得淋漓尽致，历史导演很难寻觅这样的角色。本章不拟一一列举他的所有节目，仅就“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几桩重大事件，看看康生的三绝。所谓三绝，是康生在三桩重大事件上所使用的绝招。他的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因而当了“顾问”，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

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争宠邀功的题目，以便为自己树碑立传增添内容。作为“顾问”的康生，的确名不虚传，他认为他有可以同“旗手”媲美的“特殊功勋”，不信吗？请看：

第一，“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一九六五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上海经过七、八个月的秘密策划，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人们都清楚了。当这篇文章刚刚出笼的时候，张春桥就

说："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场大战"。江青则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和突破口，说什么"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然而这一着"棋"，康生没有参与怎能成为格局呢？要害人物是善于抓要害的，于是康生独独抓住这篇文章的要害。此话别人说不清楚，只有康生自己交代。康生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多次在毛泽东同志身边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

这是康生根据自己的臆断捏造出来的。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曾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并向大家推荐《海瑞传》。胡乔木同志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到北京向明史专家吴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建议吴晗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有可能的话还可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写出《论海瑞》一文，京剧《海瑞罢官》也已开始酝酿。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事。庐山会议之后，《论海瑞》一文公开发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动笔。最初的剧本叫《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从第四稿起才改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即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三年，剧本方才发表和演出。从吴晗的文章、剧本的写作动机到发表演出的全部过程看，都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同志被"罢官"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康生不顾历史事实，硬是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蔑吴晗为彭德怀翻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因为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以此进谗言而得宠，抢头功而有份，康生真不亏为高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的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康生同彭真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学术批判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同志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听了这个回答，毛泽东同志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后来，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时，康生方才没有吭声。可是两个月后，康生不仅不矢口否认、默不作声，而且争着大肆宣扬了。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康生说："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六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我向毛主席讲的"。六月三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八月十一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再次说："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康生为什么对他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事，开头矢口否认，默不作声，后来又大肆宣扬呢？康生所奉行的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事实面前可以撒谎，谎言说一千遍就可变成真理！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不认帐，而且还可以说得完全相

反。开头，他不摸毛泽东同志的底，不知毛泽东同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究竟持什么态度？假若持批判态度，康生承认自己的发明权，问题还不大；假若不是这样，康生要承认自己的发明权，这不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吗？因此，康生只好采取硬抵制和软抵制的办法，以便为自己留条退路。两个月后，康生摸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他胆子就大起来，于是抢功并大肆宣扬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康生到处宣扬“要害是罢官”是他向毛泽东同志讲的同时，又说“这话是毛主席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指示”。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些讲法，出自一人之口，岂不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然，怎么能叫政治骗子呢？他的意思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是他康生的指示，你怀疑吗？你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就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待弄清时，就需要作为冤案平反了！

第二，“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

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五·一六通知》，用当时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说法，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然而这“进军的号角”又是康生争当吹鼓手的。

康生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而且是仅次于彭真的主要成员。他参加了制定《二月提纲》的全过程。情况要略如下：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康生出席了为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而召集的第一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中，康生一直沉默不语。后来，当彭真同志根据调查声明

“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时，康生仍然一言不发。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作了全面发言，并指定许立群、姚溱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康生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二月四日，《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立即打印几份分送所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的人。康生收到《提纲》草稿，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听取彭真同志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汇报后，康生没有对汇报提出任何意见。当刘少奇同志问到吴晗同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时，彭真同志据实回答，康生仍然一言不发。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次汇报中，康生对《提纲》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二月十一日晚，彭真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提纲》批转全国的批文，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亲笔在批文上画了圈，对《提纲》和批文还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上述事实说明，《二月提纲》从起草到定稿，康生始终是参加者，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宣称的那样，是“背着他”搞的；讨论过程中，康生始终没有发表意见，因而也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捏造的那样，进行了什么“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康生当时支持《二月提纲》呢？不是。因为《二月提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反对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而这

点，恰恰同他自一九六四年来多次向毛泽东同志所进的谗言是相违背的。康生当然不会同意《提纲》的观点。正因如此，当他参加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又秘密布置其亲信写一篇“批判”吴晗为彭德怀翻案的文章。这充分说明，康生当时同时准备了两手，象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

非常清楚，康生之所以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沉默不语，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摸清毛泽东同志底数的缘故。这样，他只好把自己摆在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上。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康生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此次谈话中，康生就《二月提纲》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方使毛泽东同志作了这样的表态：“《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这下子，康生胆子壮了。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康生又一次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在此次谈话中，康生完全摸清了底细。于是他便积极准备筹码。在五月四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一反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变成了激烈的批判者，系统地批判了《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康生的揭发和批判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次揭发批判之后，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才被“撤销”，《二月提纲》才被“停止执行”，《五·一六通知》才得以产生。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康生和陈伯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主持人。康生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这个《通知》中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

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捏造，怕人不信，他又急急忙忙找到××交代任务说："光有通知还不够，还要搞个附件，弄个大事记，摆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还有，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开脱。"××按照康生的旨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于是，××就同康生的秘书一起编造了一个应康生需要的大事记。颠倒是非，当然需要编造的本领。若要骗人，就得撒谎。"绍兴师爷"的刀笔，就在于在要害问题上下要害之笔！他们写道："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也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让别人一看，这哪里是正常工作，明明是在搞阴谋。的确，搞阴谋搞习惯了的人，看别人待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是阴谋。就象蝙蝠不能见阳光一样，天下全是灰暗的。本来，起草文件是彭真同志交给许、姚二同志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起草人能在会议上而不在安静的房间里写作吗？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也成了康生没有参与其事的借口。另外，大事记中还造谣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康生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欺骗了全党。康生把这件事说得比唱的都响，不仅在国内说，也向国际友人说。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同胡志明主席谈到《二月提纲》时就曾厚颜无耻地说过："我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指彭真）背着我干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胡志明主席当即插话说："你也有缺点"。康生狡辩

说："是的，我的缺点是，我在看电影，彭真的秘书交来文件传阅，我不满意，叫我的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仍看我的电影。现在应该说这是对党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康生应和小组其他成员一样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把自己打扮成"五人小组"的坐探。不过，他的扶摇直上的前景，不知要践踏着多少同志的尸首和鲜血！

第三，"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

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夕，康生就背着中央积极策划点火于基层了。五月十三日，他先是指使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只是由于吴传启看人对事都要拿天秤去衡量的，怕"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既想伸手，又怕烫手，迟迟未决，最后只写出一张矛头指向杨述同志（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是社会科学学部负责人）的大字报（题目是《评杨述的"青春漫语"》），交了差。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揭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梓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她贴北大校

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梓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于是曹轶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珮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形式。""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贴出的。大字报一出，当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仅半天时间，群众就自发地贴出上千张大字报进行反击。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康生得知了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态度之后，惟恐其阴谋勾当被揭穿，二十六日紧紧扣着大字报底稿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将大字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同志，以求侥幸获得支持。此事，是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干的。

六月一日，康生的赌注得逞。他说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并决定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给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电台连夜将质问的情况，整成《简报》报给康生。康生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珮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硕、陆平、彭珮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曾详细介绍了他支持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和心情。他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是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珮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露了彭真黑帮……"，又说："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反革命想扑灭它，我们伟大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在六(月)一(日)看到大字报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等同志也感觉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他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什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甚至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

六月二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使我国进入到一场灾难和内乱之中。

康生对他亲自指挥炮制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事，一向是作为资本来炫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同两位外宾会谈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同一位外国朋友谈话时也说：“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中央文革的促进推动下产生的”，“他们同我们发生联系时，我们鼓励他们写大字报”。这里所说“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就是指康生及其一伙。康生如此炫耀，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要人们知道它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



第二十一章

“二月兵变”的真相

自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后，似乎出现了什么重大案件，象大战来临一样，人们处在疑虑不安之中，很多干部不理解，广大群众在观望，学生们很惊异，只有少数人象发疯一样做狂热地煽动和串连！北京自从作为人民的首都以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谣言不胫而走，小道消息满天飞。你不信吗？你保皇！你右倾！你信吗？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没有文件和部署。似乎都要靠“造反派”重新考虑一切！

事情还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那篇著名的政变经讲起。他把中外古今的政变罗列一番，无非告诉人们当时在中国有人要搞政变。林彪既然发起了进攻，吹鼓手就得把林彪的话想方设法加以证实。康生跟得紧，领会得快，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立功的机会。于是，他就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要案！也是康生继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放出的又一颗轰动全世界的卫星！

善于制造事端的人，总是要捕风捉影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组建一

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建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卫戍区考虑到该团新建，官兵不相识，需要集中训练三、五个月。这样就需要解决一所营房问题。为此，卫戍区曾派人去北京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通县、朝阳、门头沟、丰台等地找房，均未找到合适空房。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同志介绍说："现在有些大学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可以暂借。"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校去交涉。当时北大、人大都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合适，遂决定不住学校，而由南苑教导队腾出部分房子交那新组建的团使用，不足部分可以搭些帐篷。

这本来是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并不需要作过多的说明，但就这么一件并不复杂的事，却被称为"情报专家"的康生放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吹肿夸大，加上他的丰富想象，大胆假设，于是制造了一场轩然大波。

"文化大革命"烈火正在燃起，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正在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中广为传抄。本来就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平时就把猫说成虎，把蜻蜓当飞机，这下子，可找到"蛛丝马迹"了。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二月间北京卫戍区曾去北大联系空房准备驻军之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要搞政变"。会后，有的学生把会上议论的内容加以整理归纳，把会上谈到的"政变"取

名为“二月兵变”贴了一张大字报。一处点火，处处冒烟，这张大字报很快被传抄了出去。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质问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同志知不知道在人大驻军搞政变的事。

有关“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如获至宝，立即派他的联络员去北大、人大调查了解。他们不去卫戍区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听大字报起草者片面之言，就向康生写了一个书面汇报，说北大某人揭发的“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康生拿到这个“调查”报告，如同得到一枚重型炮弹，准备借机发难。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康生首先将这发炮弹抛出。会上，他突然质问列席会议的郭影秋同志：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答：没有看见过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康问：你知道，汇报过没有？郭答：没有汇报，因为我认为大字报所谈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当即把他的联络员写的“调查”报告拿给郭影秋看，并指着报告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半个月之后，即七月二十七日晚，他率领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去参加北师大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康生宣布：“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的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后，北大（是）用大字报

揭出来的，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在六月二十日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这张大字报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但是这张大字报被孙友渔（当时是驻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歪曲了，孙友渔在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是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覆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就这样，在广大群众面前，由于康生的宣布而肯定了政变！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二月兵变"是造谣吗？那你或者就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把同学们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替彭真辩护"；或者就是"二月兵变"的参加者！怎么办才好呢？要么被罢官，被撤职，被打倒，被关押；要么按照康生的旨意，把"谣言"当"事实"来接受，把"假的"当"真的"来传播！于是，这场纸上的"二月兵变"变成了康

生迫害干部的借口，也变成了他向林彪、江青表忠诚的标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罗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字、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并挖掉。"

林彪这篇贼喊捉贼的讲话，康生认为是投靠的机缘，他立即伙同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批示，说：这个讲话，"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康生一手制造的"二月兵变"，就是他对林彪这一讲话领会得深刻，运用得具体的表现。在林彪那里，还只是"嗅到了"一些"政变"的"味道"，而在康生这里却抓到了"兵变"的"事实"，甚至连"兵变"

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统统抓到了，真可说是林彪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林彪对此当然感到满意。正因如此，一边欢呼英明贤主降临，一边慨叹自有保我臣子！

林彪认为，妨碍他篡夺军事大权的是罗瑞卿同志，因为他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急于排除这个直接障碍。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个人迷信、空头政治和毁坏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些措施，都遭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抵制。林彪的野心驱使着他消灭异己，通过打倒罗瑞卿而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实际工作的贺龙同志。

康生看透了林彪的心思，又符合自己的害人高升哲学，于是"二月兵变"就应运而生了。这样既为彻底打倒彭真制造了口实，又为诬陷、打倒贺龙放出了第一颗试探性的信号弹。尽管康生在制造"二月兵变"事件之初，并没有点贺龙的名字，但是谁都心里明白，康生制造这一事件是指向谁的。在林彪、康生看来，彭、罗、陆、杨都已经打倒了，用不着再花气力了，问题是借群众的力量，继续打倒他们内定的打击对象。既是军事政变，就得从军队中挖掉林彪的对头。贺龙同志正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矛头所向是一清二楚的。康生制造"二月兵变"，是说了林彪想说还未敢说的话；是干了林彪想干还未干的事；为得宠而害人，这是康生历来的"杰作"。

正是在康生制造"二月兵变"的气氛之下，林彪部署了一系列诬陷贺龙的阴谋活动。八月中旬，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搞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八月二十五日，林彪又制造了"八·二五事件"，诬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九月八日，林彪

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是"搞颠覆活动"的"大阴谋家"。林彪的老婆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

林彪一伙对贺龙同志的诬陷，一下子就和康生的"二月兵变"对上了口。尽管康生早已看到了北京卫戍区于七月二十九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但是，由于他看到林彪也开始公开诬蔑贺龙了，因而便趁风纵火，竟把原来的谣言又放大了许多倍。到处放谣风："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后来，康生又对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同志说："体委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七百条"。又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所谓贺龙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一九三四年八月，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处决了蒋介石派来充当"说客"的熊式卿一事。此事中共湘鄂西分局早已报告中共中央。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也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十多份。这件证明贺龙同志坚贞不屈的原始材料，康生竟然藏匿不报，以致铸成巨大冤案，将贺龙同志残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内乱，就是出现了象康生这种大奸得志，任意捏造了象"二月兵变"之类的离奇古怪的案件。当他作煽动演说时，绘声绘色，比福尔摩斯侦探案还引

人注目，搞得风雨满城，唯恐世人不知！当真相大白时，他们都销声匿迹，默不作声，象个惯犯，只知作案，不想了案。

第二十二章

为了夺取一切权力

“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康生就把积蓄了多年的那股邪劲，全使出来了。为了林彪、江青的“新天朝”，为了自己已经膨胀的野心，他积毕生之阴谋手段，在这场浩劫史上，书写自己的篇章。他硬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硬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叛徒、特务、国民党的领导，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总之，把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说成是个黑洞洞的旧世界。因此，他们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在这场大动乱中，康生确实为林彪、江青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且看康生是怎样为自己建立纪念碑的吧！

一、横扫。

康生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他说：

“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

“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

中央各部，为什么会有康生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即对毛泽

东同志及其著作的态度问题呢？接着，康生又作了具体的解剖，他说：

“中组部是有意搞的反革命巢穴，是刘邓多少年精心安排的”，“在安子文的掌握下，那里的干部有二十几年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

“中央党校根本不是我们的党校，而是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据点。”

“中联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对、拒绝毛主席思想”，“反对、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推行刘、邓、王（稼祥）的路线，即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思想。”

“中宣部是阎王殿”。

“中监委糟得很”，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

康生象是天外来的奇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在中央呆过，对中央各部的事，他超脱得比神仙还干净！

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象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

康生是不是仅仅否定中央机关呢？当然不是。继而又指向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他说：

文艺战线，“有一条文艺黑线统治着”。

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

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及其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

人们还记得，从一九五七年起，康生就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把文教战线说成黑线，似乎他又成了高超于这条战线的坐探！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了经济战线，说：

工矿企业，“修正主义的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薄一波搞了很多东西，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青年团，他死死抓住不放。不攻垮这两个组织，又怎样篡党？怎样笼络青年呢？因此，他攻击：

共产党，“过去最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因而使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脱离了当前的阶级斗争”，结果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让驯服工具论，长期占统治地位”。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煽动下起来进行打砸抢，才不死板，才不是驯服工具，也才是林彪、江青和康生的阶级斗争勇士！

他还攻击：青年团是“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该彻底改造”。

按照康生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共青团也不是共青团，这正是他提出重建党，重建团的理由。

他对党校又是怎样说的呢？不仅对中央党校，而且对全国各级党校都作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结论。他说：

“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各省市的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同中央党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篡党系统”。

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他说：

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砸烂旧市委打倒新市委”。“北京的夺权是头等大事，应宣布旧市委的罪状”，新市委“不宣布他们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们倒台了，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提高一些，调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评我们‘左’点，这没有什么关系”。“要列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要通过大会大破大立，你们可以大胆地搞。李雪峰的名字也可写上去，叫主席划掉也没关系。”

四川省，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是“刘、邓、贺、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窠。”

陕西省，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

西安市，是“敌人潜伏的一个黑窝子”。

…………

总之，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联，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

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的篡夺了这些机关”。

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是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第三任李卓

然，是张国焘反党集团的人；后杨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再看内蒙古，“敌人是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

当然，康生不只认为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和内蒙的干部都是坏的，就是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干部也无不如此。他曾从虚构的“刘、邓的反动政治路线”出发推论说：既然刘、邓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他们也就必然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样，各单位都会混有许许多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即使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也会受到刘、邓路线的影响。因此，他主张所有干部都应打倒，都应审查，都应批判，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就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关于这一点康生曾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时有过明白的自供。他说：“抓叛徒是怎么来的？是我受到十一中全会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启示，联想到刘少奇让人履行手续出狱问题，于是就让天津南开大学去调查。”为什么会发展成群众运动？那是由于“我曾写过条子给聂元梓和孙蓬一”，告诉他们“不去调查彭真、刘仁、郑天翔，反而让天津去调查”，“这样北大也出去了”。

将“文化大革命”搞成“整干运动”，是康生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为了发泄对干部的刻骨仇恨而同林彪、江青一伙共同策划的。但是康生在其中确实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一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生看到一份《简报》上提出“重点批判面是否宽了”的疑问，立即气势汹汹地批道：“连批干运动也不晓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其儿子张子石时说：“有的干部问：《十六条》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现在这个省也不好，那个省也不好，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合不合《十六条》？你们犯了错误啦！保字号常常拿这个来反对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不晓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这)倒不是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要触及灵魂吗？触及你的灵魂就不行吗？你就那么干净？”照此解释，“文化大革命”就不只是“整干运动”，而是“整人运动”了，因为不只每个干部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那么干净”的“灵魂”。怪不得，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连，任意批斗、抓捕群众呢！怪不得他明确“指示”，“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敌我矛盾，或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哩！

二、“越乱越好”。

康生既然通过横扫一切，将各级党政机关统统给搞瘫痪了，接着，其目标就很自然集中到权力上，于是他又煽动学生起来夺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即毛泽东同志由外地返回北京的前五天，康生就跑到北京广播学院说：“我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暗示他支持该校师生起来赶工作组。七月二十四日，他再次跑到北京广播学院煽动说：“你们掌握权力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

勇气？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七月二十七日晚，康生同江青、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亲自主持群众大会，批判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同志，鼓动北师大的师生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在这种鼓噪下，运动一开始就脱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到处乱“造反”。顿时，全国一片混乱。在混乱中，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北大的师生大会上公开亮明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

对于这种不要党的领导，到处“造反”的混乱局面，当时就有不少同志表示担忧，并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批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某部的一份《简报》，反映了这个情况，其中说：“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而现在有些人搞的是极端民主化”。又说：“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都上街，如果没有问题，将来怎么办？”还说：“现在派别多……这样下去，别说明年暑假，就是后年暑假也统一不起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预见也是深刻的，它已经清楚地指出极左行动的后果是难于收拾的。不能让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动摇无产阶级整个政权！这是当时干部的普遍心情。可是康生看了这些疑问和批评极为恼火，挥笔批道：“对大民主怕得要死，对反革命反扑熟视无睹！”“怕革命、怕阶级斗争”，“是不是取消大民主？”这充分说明，康生所说的“革命”、“阶级斗争”、“大民主”等等，完全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化，是以“把全国搞乱”为宗旨为满足的反革命野心家所要求的“造反”。

在康生的这种鼓噪下，本来全国形势已经够乱的了，然

而他并不满足。他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不是乱过了头，而是乱得还很不够"；极力鼓吹"越乱越好"。

三、戴高帽，挂黑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之风起源于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在康生、曹轶欧扶持下的聂元梓一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把北京大学的各级干部揪上了所谓"斗鬼台"、"斩妖台"，拳打脚踢，戴高帽，剪鬼头，甚至要流氓、污辱妇女，从而酿成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当时，康生自感问题严重，也曾积极支持北大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可是事过不久，他又反目。七月二十五日，他先在北大提请师生考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竭力诱导和煽动师生翻"六·一八事件"的案。接着，他又于七月二十八日去北大明确表态说："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坏人"。七月二十九日，康生接见人民大学部分师生时，又竭力为"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这虽然不符合政策，但也"不要去责备那一部分同学，应该原谅他们"。八月四日，在北师大师生大会上直接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武斗事件"的正确处理，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给林枫、郭明秋等同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当天，康生就在人大会堂接见其头头，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有关系，轻得很"；

第二天又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八月二十七日,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康生的这一系列“指示”,立即传遍全国,顿时形成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的妖风。

九月八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山东来京学生代表时,就曾为他煽起的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的妖风进行过一次辩解,说:“有些地方流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挂黑牌,这完全是误会。我当时打电话说,‘游街、戴高帽,当然不算武斗,但又不算文斗’。可是接电话的人向全校传达时,只传达了我的前一句(‘不算武斗’),丢了我的后一句(‘不算文斗’)”。这是愚蠢的辩解。这辩解非但没有推脱掉他的罪责,相反,倒无意中供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之风确是由他煽起的。不过,说老实话,康生这里所煽起的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之风,同他后来所搞的“武装左派”,制造武斗事件相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确实“轻得很”。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叙述。

四、把军队搞乱。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而,他们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军队。这就是他的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根本原因。

阴谋有术,窃国有方的康生,在关键问题上,显示了特有的能量。由于他对林彪、江青的意图摸得准确,因而对打砸抢分子的指挥就特别灵验。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康生在中央党校接见“造反派”头头时说:你们要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修

正主义的军队?”一月六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另一“造反派”头头时又说：无产阶级军队，“也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军队，“也可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康生谈这些话的第四天，即一月十日，王力、关锋等人，就在一个材料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乱军口号，送江青审批。江青又转送林彪“批示”，林彪当即批了“完全同意”几个字。于是，这股乱军之火便烧到了军队。三月二十日，林彪又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蛊惑人心地提出：“带着枪杆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比之没有带枪杆子的还危险。”经他这样一说，已经点燃的乱军之火，燃烧得更旺了。

由于有林彪作后台，康生更加有恃无恐起来。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讨论“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坚持要在宣传提纲上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新闻稿时，由康生口授，关锋执笔，又坚持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和相应的社论，这样，就使这一反军乱军口号第一次公布于全社会。从此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许多部队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鉴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成了严重局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出面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又竭力推卸自己在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方面的罪责。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他在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时说：那是“我们的报

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接着又诡辩说：“我们是批评了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的错误”，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批评看作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面三刀，横竖有理，应黑应红，随时而变。康生就是这样一个翻脸不认帐的人。但是事实是赖不掉的。

五、把生产搞乱。

“文化大革命”之初，尽管形势很乱，但是这种乱还仅仅限于党政机关和文教战线。可是，康生之流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一心想把烈火引向全国，引向各条战线，特别是引向牵动所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战线。

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使国家减少损失，特指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于十一月底召开一个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即中央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会议），研究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会者分析了工交战线的三个特点：第一，工交系统是执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没有那种所谓“黑线”统治的问题；第二，工交系统历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第三，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一环扣一环，需要稳定的连续性，不象学校、文艺团体那样，可以随时停止工作。从这三个特点出发，大家得出结论：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

应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十五条》算是一个保护生产，减少损失的及时措施。然而，这同那伙以搞乱全国为目的的倒行逆施者，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他们看了大为恼火，立

即责令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于十二月二、三、四日连续开了三天，名义是“汇报”，实际上是对工交会议及其制定的《十五条》进行批判。这三天是这样安排的：头一天，他们听取汇报；最后一天，由林彪出马作总结；中间一天，主要是康生对工交会议进行“批判”。康生批判时，林彪连连赞许，颇为欣赏，并多次插话，文武共谋，狼狈为奸，就这样完全推翻了工交会议决定。康生的“批判”发言，劈头就说：“我同××（共产党）左派谈了三次，共十多个钟头。他是中央委员，搞工业的，谈话后教育很大。从××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呢？”还未等康生回答，林彪立即插话说：“康生同志，你把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到资本主义的？从思想、农业、党，……政策等怎样变的，我们怎样才不变，怎样堵住这个漏洞，我们不甚了了，搞得不好就会变。……请康生同志研究研究。对这些问题，只有笼统概念，没有具体事实，印象不深刻，没有说服力。”林彪向其“理论顾问”请教了，康生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立功的机会，他如同打了吗啡针一样，顿时精神倍增，滔滔不绝地讲起××怎样变修的所谓“经验教训”来。他的结论是：“××变修首先是从基础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复辟，工厂企业关系很大，因为这是经济基础嘛！”（林彪插话说：“对，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接着，康生把话头一转就讲起我国的情况来。他说：“我们的工厂也不那么干净”，虽然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所有制变新了，但是，“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基本未改，仍然实行按劳付酬”，这些都是旧的。因此，“我们的工厂，恐怕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工厂的修正主义根子，不一定比学校

少”，这样，就“不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中去”。所以，“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重要，因为工厂是基础”。（江青插话说：“应说工农业是基础”。林彪说：对，无论工业农业都是基础。）康生继续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学校次要，而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农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工交的同志对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一下，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林彪插话：“前车之鉴，要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康生还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最后强调说：“为了反修防修，在工交系统必须立即全面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康生这篇经济基础变修论，是以理论权威的架式提出的，又得到了林彪、江青的批准，真象十万吨黄色炸药的爆炸，大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唬住了很多人。更严重的是它成了当时工交系统打砸抢分子的理论武器。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武器，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推广到整个生产战线，从而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六、全国性大夺权。

一场灾难性的烈火烧向了全国各个领域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起，从上海开始，又掀起了一个夺权恶浪。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的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

大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王效禹派康生之子张子石来京摸中央文革对夺权的态度。康生由王力、关锋等陪同，于二十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康对张子石说："王效禹是山东夺权的好条件"，你回去可转告王效禹，"要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的夺权问题。"王效禹得了康生的指示，迅速于"一·二二"和"一·二七"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山东长期盛传王效禹夺权是"走的康生的后门"，便是由此而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联部有一个不受康生支持的群众组织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王力等人硬说是"柯"字，是指某著名专家，目的是想把某著名专家打成黑帮，以破坏我党和友好人士的关系。以此为借口，把该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指示他在中联部的心腹强行夺权。三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为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翻了案，封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支持他们夺了四川省的权。

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林、江天下康家党，中国究竟向何方？这是广大人民和广大干部焦虑的问题。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以毁党毁国之"奇功"，换来了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他先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接着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成为党的副主席。

第二十三章

劲松和逆流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于深重的危难之中。一切忠诚的人民、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之担忧，并采取不同形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抵制和反对。特别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用革命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踏，领导人民事业的共产党被篡夺，他们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于是象暴风雨中迎接战斗的海燕，巍然挺拔的劲松那样出现在第一线。他们就是为中国革命建立过功勋，使敌人丧胆，为人民敬仰的一批老共产党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这次斗争的特点是，开门见山，短兵相接，一边是义正严词，一边是阴谋诡计；一边为捍卫党的原则而义愤，一边为破坏党的事业而称快。拨开乌云，忠奸分明。

康生是参加这次斗争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林彪、“四人帮”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为了在那遗臭万年的耻辱碑上，再刻一笔功劳，使出了他的全部秦桧式的本领，上窜下跳，出谋于密室，鼓噪于基层。他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怀仁堂会议

上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从而制造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冤案。

历史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讨论如何抓生产的问题。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激烈斗争。

这次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七位国务院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另外还有余秋里、谷牧两同志；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在座次上就是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了话。他说：“你们（指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严厉的质问，刺痛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阴阳怪气，交头接耳，唧唧喳喳起来。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康、陈、江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

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还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完全戳穿了康、陈、江一伙的篡党夺权的阴谋。

三天之后，即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整，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举行。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同志在怀仁堂门口碰见了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各省市委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在当地被无理扣压着。陈丕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张春桥听了谭震林同志的质问，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当即怒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们领导的啊！”这就是会前的一段交锋。

会议开始之后，谭震林同志接着会前的交锋，又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仍然打着“群众”的招牌进行刁难和推脱。谭震林同志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什么群

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也统统挨整，你们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还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越说越气愤，突然夹起皮包站起来去拿衣服，边走边穿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谭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又转回来，面对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啦！”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了吗？”停了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讲到这里，余秋里同志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下去，我就不干了！”早已投靠林彪、康生、江青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当即驳斥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同志想到许多老干部遭受残酷斗争和凌辱的情况，又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那个令人鄙视的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谭震林同志当即驳斥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接着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① 开始，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对方那个核心人物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即撒谎说：“我没有看！”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根据康生、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由康生亲自审定的。

聂荣臻同志针对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诬蔑为“联动”，十分气愤地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

① 指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该文中心是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这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的真情实状。在这个会议上，为人民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对群妖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剔肤见骨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伸张了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一伙的审判和控诉！林、康、江一伙诬说是"二月逆流"，不，这是二月的"浩然正气"。逆流的确有，可不只二月，而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就翻卷中国的大地了。林彪、江青一伙开始篡党夺权，就掀起了大逆流。

康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方的主谋。他耳闻目睹了共产主义老战士铿锵锋利的语言和英姿，特别是陈毅同志根据文革中绝大多数干部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这篇有理有据的讲话，象挖了康生的祖坟一样，引起他的强烈的宿仇。于是，他就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唆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于十六日晚在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记录"，并连夜商议用他们业已习惯了的欺骗夸大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蓄意扩大事态，竭力促动毛泽东同志的恼怒，以达到他们挑拨的目的。

是非拨弄的结果，康生一伙领取了"上方宝剑"，成了盛气凌人的批判者。从二月十七日起，一直到三月十八日止，康生等人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对所谓"二月逆流"进行"反击"，天天围攻批斗共产主义老战士。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为"阶级斗争"、"反党"、"敌我矛盾"、"罪大恶极"等等，一片吠声，不堪入耳！其间，又是

数康生叫的最凶。

康生在会上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说："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声嘶力竭地说："……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党吗？"他边说边吼，口里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啦，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嘛！"

陈毅同志作为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这两个机关去开会。康生就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余秋里、谷牧同志曾积极支持过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的工作，几个副总理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

林彪、江青一伙，本来就是要打倒一批开国元勋，用所谓"清君侧"的办法，把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清除掉，使他们的罪恶目的迅速得逞。他们既蒙蔽毛泽东同志，又利用他的错误蒙骗广大青年，借用青年的盲目性，使极小范围的内部问题社会化。一九六七年春天，社会上掀起的那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就是康生及其同伙幕后策动的结果。

阴谋家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可他们的罪恶活动总裹着诱人而漂亮的外衣，打着辉煌的旗号。他们为了掀起反“二月逆流”的恶浪，对于从哪里入手，由什么人去串连等问题，都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密定：反“二月逆流”得“先从谭震林开刀”，而“从谭震林开刀又可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谭震林同志曾于一九六六年底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针对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的叫嚷，当面痛斥过她，会后又正式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其“提高警惕”。再加上这次怀仁堂会议上，对康、江等人又作了剔肤见骨地揭露，他们决定“先从谭震林开刀”，当然是自然之事了。从谭震林同志开刀，之所以“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这是由于谭震林同志当时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对于大寨展览馆负有责任。至于大寨展览馆究竟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是要事实服从需要的，只要需要，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来的。策略一定，康生亲自出马，特地跑到大寨展览馆转了一圈。果然，问题找出来了，他摇头摆脑地说：“展览馆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问题”找出来了，于是通过一条热线：关锋——林杰——谭厚兰及其所属的一帮，下达指令，可以冲击大寨展览馆！大寨展览馆，虽属谭震林同志主管，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曾经亲自审查过两次，最后又是经康生审查批准才公展的。现在，康生煽动冲击农展馆，这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同志，而且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可这恰恰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样，三月十八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受蒙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进驻了农展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事件，

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① 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同时，他们又通过其他热线去煽动青年学生，于是首都街头就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位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康生导演的怀仁堂批斗会搬到了北京街头。这就是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也是康生、江青向“小将们学习”的真实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党内民主生活和优良传统被践踏了，党的组织监督破坏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一伙野心家更加为所欲为了。多少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对本来不理解的东西，更加迷惑不解了！亿万人民担心的危机加深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篡权阴谋。

康生之所以要在这一重要案件中，发挥他的特殊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悉毛泽东同志当时正在作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为此，他正在寻衅制造事端，以便打乱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部署。事情是这样的：还在这次怀仁堂会议前夕，谭震林同志就曾就农口夺权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其中建议说：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报告很重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

① 指谭震林同志于 1967 年 1 月就农口运动情况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三十日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实质是部署几个月内结束“文化大革命”。三月七日，毛泽东同志批示了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也是为了促使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是结束，还是拖延？就成了当时争议的焦点。按林、江集团的意图，当然不能结束，天下安定了，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达不到了。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一批示，于是决定伺机寻衅。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就在他们的预谋中出现了。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没有“二月逆流”，也会有其他什么“逆流”，不管叫什么，其目标和性质都是一样的。

康生一伙不仅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而且在此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所谓“二月逆流”的帽子，如同手中的法宝，一直攥在手中，经常不断地挥舞。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林彪出面召集了一个北京卫戍区团级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诬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当场宣布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从而制造了一起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江青首先把鲁迅手稿盗在手中，然后责令傅崇碧同志去调查手稿被盗之事。傅不知这是阴谋，真的领着人去调查，很快将此事查清。三月七日这一天，经陈伯达秘书的同意，携带文件、证据，由两人陪同，分乘两辆小汽车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向江青作了汇报。可是，两周之后，“两辆小汽车”变成了“几辆汽车”；“赤手空拳”变成了“全副武装”；“到钓鱼台汇报”变成了“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并且诬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林彪主持召开的紧急会上，江青一再领头

高呼“坚决打垮‘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康生则一再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这还不算，第二天，康生还专门派人去逼傅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人们不禁要问：林、江、康一伙，为什么以如此卑鄙的骗局，置傅于死地呢？这是因为他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掌握着首都军事大权，深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多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经常不断地向毛泽东同志直接汇报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这就极大的障碍着林、江、康一伙的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制造“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的真实原因，又是他们说“二月逆流新反扑”的由头所在。

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又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同傅崇碧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有野心，想排挤黄永胜等。从而又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全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林彪一伙制造这一冤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林彪怀疑杨成武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过林彪的坏话。还有，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告诉杨不要送文件给叶帅。杨经请示周恩来同志继续照送。九月下旬，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回到北京，曾到一些老帅家里传达过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谈话内容。另外，杨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老帅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这当然使林彪一伙大为恼火，因而早就想伺机搞掉杨。其直接导火线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随意关押余立金的秘书。杨接到有关此事的揭发之后，立即责成吴法宪去查

处。吴不但不去查处，相反向林彪告状说，杨余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谎言就这样制造出来。此事，又成为康生利用来大反所谓“二月逆流”的口实。在“三·二四”大会上，康生大讲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情况，诬蔑杨、余、傅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本来没有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可是康、江、陈等人搞了一个中心发言提纲发到全会，从而在全会上又掀起了批“二月逆流”的歪风。他们定的调子是：“二月逆流”“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有计划地把老同志分别编入六个小组，分割包围，以便围攻批判。康生又是这次批斗中的“激进”者。他于十月二十九日在第四小组（即华东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还说：“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沿着这种逆流，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一步步地迅速地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绝对办不到的。”此时，距离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生，已近两年了，那些被批判的老同志早已靠边站不管事了，为什么这时又大批

特批起所谓“二月逆流”来了呢？这显然是为了破坏老同志的威信，以便让他们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好在九大召开时将其排挤出政治局，然后再把他们一伙塞进来。这次对老同志的围攻，也确实做了这方面的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总之，林、康、江一伙，每当想打倒谁，总忘不了先念念“反击二月逆流”的经。所以，所谓“二月逆流”便成了林、康、江一伙整掉老干部，推行极左路线，大搞篡权活动的最灵验的法宝。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指着叶剑英同志对别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至此，才算制止了“二月逆流”的传播和蔓延。不过，康生至死，也未对他在制造“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中所起的恶劣作用，认过错，作过批判。他却仍然借人梯爬上了宝座！

第二十四章

个人神化的煽动者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它历来就反对伟人、天才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康生对于这一基本理论，不是不清楚的；对于我们党遵循这一理论所作的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毛泽东同志长期形成的崇高威望，也利用群众的朴素而不科学的感情，大搞个人崇拜，甚至掀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丑闻！其实，康生是以此作为“登龙术”而得宠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要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把领袖不适当地捧上了天，奉为离开了人间的神仙，这不能不是十年内乱中给人们留下的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毒害，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

一、把人变成神。

康生愈是把个人捧得神乎其神，就愈是显得他的手法的拙劣。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批判《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时说："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事实上，刘少奇同志在这本书中反复宣传：我们应当珍视革命导师的业绩和他们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但不是让人们去顶礼膜拜；我们应当把这些革命导师当作"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但不能将其偶像化；并批评了那些把革命导师"看成天生的神秘人物"，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错误思想。这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可是康生却硬是从这里找出了什么"暗示攻击毛主席"的意思。很明显，在康生看来，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成天生的神秘的人物"，应该把毛泽东同志当作"偶像"来"崇拜"。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大肆批判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说：这个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地攻击和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岂非咄咄怪事？邓小平同志说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要求全党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点，怎么到了一九六七年，就变成了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了呢？怎

么会成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了呢？原来康生不是也表示过拥护“八大”的重要文献而且还作过解释吗？是健忘还是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显然，康生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现在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同志应该搞“个人神化”、搞“个人崇拜”、搞“个人突出”。谁反对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谁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可见，在神化领袖上，康生比之林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过之处就在于他公开露骨地宣传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天生的神秘人物”，明目张胆地主张对毛泽东同志搞“偶像崇拜”、“个人崇拜”、“个人神化”、“个人突出”、“歌功颂德”等等。

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已经是异乎寻常了。他说：“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独学会忠于毛主席”，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的学问”，极力主张对毛主席要搞“三忠于”、“四无限”① 这样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康生则进而把这些当作重新建党的标准。他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在《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的党。康生所要重建的党，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相容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战斗集体。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工

---

① “三忠于”，是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作人员，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这就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而不是反过来，要全党全体人民忠于个人，服务于个人。

随着神化个人的宣传，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助长下，出现了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语录操”等等封建宗教仪式之类的丑恶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之后，康生还竭力为之辩护，说什么这“虽是形式的东西”，但目的还是为了“表达忠心”，“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二、把科学变成神学。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所坚持的原则，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任务。可是康生为了另外的目的，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进行任何科学研究，信口谈这“发展”那“发展”，并借谈“发展”为名把毛泽东思想由科学变成神学。

康生作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理论顾问”，在借谈“发展”神化毛泽东思想上，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连续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挖空心思，编造了许多华丽浮夸的词章，极尽吹捧之能事，硬说毛泽东同志的理

论已经"全面发展"、"全面超过"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为了狂热地褒，他就放肆地贬！在党的这样重要的会议上，这样大谈"发展"和"超过"，无论是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康生个人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党的历史上来说，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祝寿"、"禁止歌功颂德"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已经扫除了令人作呕的庸俗气氛。康生却一反惯例，紧紧追随林彪的调头。他同林彪不同的地方，就是带上了理论色彩，把本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却变成了令人莫解的玄之又玄的神学。

康生究竟是怎样谈"发展"和"超过"的呢？他说："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它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康生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独具慧眼的超人，似乎只有他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发展"、"超过"，而千百万人民都是愚民或群氓，根本没有看到或者不承认这个"发展"，所以，他在讲了三个组成部分都"超过"之后，紧接着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道："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究竟怎样发展，又怎样超过？他却含糊其辞。人们从他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又把大谈"发展"的讲台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搬到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

康生作了以“发展”为中心的专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康生深怕别人不知道他谈“发展”的历史，特别强调说：“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九五九年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今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讲过毛泽东同志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都超过了。”他又说：“仅仅说这三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说完全。主席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作了前人没有作过的伟大贡献。”康生在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超马克思主义”！他是用捧的办法歪曲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失去本来面貌，失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成为腾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玄之又玄的东西！

这还不算。康生又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借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机会，将上面讲的所谓“发展”和“超过”概括为“三个里程碑”，写进《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并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公布于世。应当说，这是在神化毛泽东思想上的又一重大升级。因此，康生特别得意。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在一个专门谈学习问题的讲话中说：“《伟大的历史文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主义非常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因为它）讲了三个里程碑、三个阶段问题，这对今后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事情，……这对世界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个重要事件。”这就意味着把康生加工过的神化了的毛泽东

思想，不仅推行于全国，而且推行于全世界。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的毛泽东思想，涂上了康生的思想，成了污染毛泽东思想的伪科学！把丑恶当做光荣来宣传，把神学当做科学来推广，这就是“理论顾问”为林彪、江青建立的特殊功勋！

三、灵魂变成躯壳。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能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然就根本不成为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承认这一点，他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来毁坏毛泽东思想，把生动的科学变成了咒语！

康生则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使毛泽东思想变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说：“我常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这个（康生举起《毛主席语录》），我就想，真是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还说：“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是“国家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从去年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那个电影”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就是说，人民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了，这才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敢想敢干敢闯，更重要的是手上还有这本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又向一位外宾说：“千百万人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千百万人民群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力量是伟大的。这

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的保证。”经康生这样一吹，《毛主席语录》完全变成了扭转乾坤的法宝。好象只要人们手中拿起《语录》，就可以成为《封神演义》里那些天兵天将手中攻无不破，御无不成的万能武器。这种荒诞无稽的妄说，居然畅行于全国，而且传播于国外，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污辱，又是什么呢？

四、一手捧经，一手执剑。

康生认为，别人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解释，都是“歪曲、篡改”，只有他传的才是“真经”。他是怎样推行他所加工制作的所谓“真经”的呢？办法不外两种：一是以牧师身份，对那些怀有朴素感情的人进行喋喋不休的说教；二是以刽子手的身份，对于那些不听说教者，戴帽打棍，肆意镇压。由于他们的说教甚为荒诞，不能服人，因而在进行说教的同时，往往置人以死地，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就曾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扣过四顶帽子：（1）“他们反对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中国人民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彭真到处宣传主席的错误是一火车”；（2）“他们反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顶峰”；（3）“他们顽强的反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4）“他们反对林总讲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说是庸俗化、简单化，说和义和拳念咒是一样的。”康生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并非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歪

曲。然而反对这种神化和歪曲，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来说，这并非是反对和诋毁，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维护。可是，在“现代迷信”盛行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主张搞神化的人，成为“高举”、“紧跟”的人，并得以高升；相反，反对搞神化的人，却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并遭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命运。

“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林彪、江青、康生手中整人最重要的大棒。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八百三十九名干部中，差不多都曾遭受此棒之害。至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遭受此棒之害，那是谁也无法搞清的。遭受此棒之害的，不仅数量甚大，而且其“根据”也甚为荒唐。比如，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张日报曾在第一版登了毛主席的像，翻过来第二版登的是一个持枪民兵，在太阳光下一看，民兵的枪尖正好指着毛主席的眼睛，结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围攻该报社，说什么枪尖对着眼睛有“刺杀之嫌”；一个教师告诉学生领子袖子最爱脏，洗衣服要着重洗洗领子袖子，结果被关押多年，因为他所说的领子袖子最爱脏，有“侮辱领袖之嫌”；一个五岁小孩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不得不抱着孩子接受“革命”批斗。另外，印刷工人无意中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报纸丢进废纸篓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正由于林彪、康生一伙如此喋喋不休地说教和肆无忌惮地抡大棒，致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现代迷

信”狂热。

林彪、康生一伙为什么制造“现代迷信”狂热呢？当然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邀功取宠，摆功求赏，篡党篡国。阿谀逢迎者得宠，刚直敢谏者受害，这是封建社会仕途经验的总结。康生与林彪对此是揣摩精深的。林彪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得天下”。康生与林彪有着同样的阴暗心理。因而，他俩勾结起来竭尽全力把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神学化，把领袖的言论咒语化，想方设法抢“高举”、“紧跟”的制高点，以便使自己攫取高位。可见，他制造“迷信”，是为了让人“迷信”自己；他宣扬“顶峰”，是为了使自己爬上“顶峰”。

康生一伙在社会主义中国所煽起的“现代迷信”狂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败坏了领袖的形象，割断了党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恶果之二，就是糟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恶果之三，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专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康生怎样说就怎样干。恶果之四，就是为滋生和发展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温床。林、康一伙，正是利用这个温床，才使自己得以孳生和发育，才为自己架设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阶梯，才为自己为所欲为地害党害国害人，制造十年内乱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实践告诉我们，败坏党的威信，破坏革命事业，最恶毒的也是最有效的办

法，莫过于搞"现代迷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党我国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和林彪、康生一伙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现代迷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第二十五章

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理论权威”的康生，确实发挥了他的威力和作用。第一，他手中有权，权力达到了顺者昌逆者亡的地步；第二，他有理论，而且挂的是马列主义招牌，不信者，就宣布为“反革命”！因此，康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特殊角色。康生对林彪、江青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最大混乱，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最深的危害，而对反革命的篡党夺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在康生制造的理论混乱中，莫过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了。

一九六六年底，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会议根据工交战线的特点，决定在这个领域里，“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地进行，而不应一哄而起，更不应停产闹革命。应当说，这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的情况下，还算是一个能够减少损失的较好的办法。可是，急于要把“文化大革命”烈火迅速由党政机关、文教战线引向整个工交农业战线的林、江一伙，却对此大为恼火，立即以听取汇报为名，组织人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中，

康生以“理论家”姿态首先发动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提出“唯生产力论”是工交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的根子”。一九六七年初，为了配合林、江一伙的“一月夺权”，康生又说“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是新老修正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四月初，康生又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对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全面批判。此间，他对其秘书说：“就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修正主义者挂起钩来。”康生正是以这个调子于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唯生产力论”作了系统的“批判”。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批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又被塞进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从而使其取得合法地位，成了林、江一伙破坏生产，大揪“走资派”的一根大棒。

究竟什么是康生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呢？据康生自己说，他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批判修正主义基本理论的。为了弄清康生的欺骗，我们不能不从他的依据说起。

经过查证，我们得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概念。只有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提到，“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和“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①，甚至讽刺地提到，“‘科学的’‘生产力论’”②，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批判庸俗生产力论，它同康生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毫不相干。我们绝对不可将斯大林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批判，误认为是对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8页。

“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因为按照康生所批判的内容来看，“唯生产力论”所表达的只能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意思。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此，斯大林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持否定态度。康生有时特别强调说，他所批判的“生产力论”是“唯生产力论”，好象说，“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生产力论”前边加一个“唯”字就发生了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谁都知道，中文中的“唯”字作为哲学用语，是指本原的、决定的意思，如唯物论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意思一样。“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其基本含义无非是确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从而对上层建筑是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把“唯”字解释为“唯一”之意，也不会使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因此，康生对“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是别的，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批判。

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样伪装，也变不成真的。可是，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把明明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东西，硬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且大张旗鼓，动员一切宣传工具，一直鼓噪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究竟宣布了“唯生产力论”那些“罪状”呢？

第一，说“唯生产力论”主张“抓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六年年底，当康生对“唯生产力论”首次发动批判时，他曾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唯生产力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显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务院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那时，我国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和平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并且拿出全部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抓生产、搞建设上来。这样做，不仅符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且也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可是康生却把这攻击为“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康生所说的“政治”和“路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和路线，而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那种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建设，残酷斗争“走资派”，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停滞和瘫痪的所谓“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在康生看来，你“不问”、“不看”他们这套“政治”和“路线”，你就是“单纯抓生产”，而“单纯抓生产”，就是“搞唯生产力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康生又向他的心腹们说：“去年春天彭真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把革命与生产平列，甚至讲生产第一位”，而将革命与生产平列，把生产放在首位，就是“唯生

产力论”。可见，康生所说的“唯生产力论”，就是指那种按照无产阶级政治和路线发展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就是那种主张将生产放在首位的“生产第一”的观点。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煽起反对、破坏建设，搞“停产闹革命”的恶浪。

为什么主张把生产放在首位，努力发展生产，搞建设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呢？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呢？康生只是戴帽子、打棍子，根本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① 恩格斯也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② 可是，这个“连小孩都知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却被康生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这哪里是批判“修正主义”呀！实际上，他是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幌子下，明目张胆地向历史唯物论进攻！

第二，说“唯生产力论”，看不见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

这是康生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传达中共“九大”精神时，为“唯生产力论”所加的另一条“罪状”。他说：“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6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1 页。

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力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

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是谁曾经有过这种主张呢？谁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呢？在他批判的对象中没有。既然如此，为何作这样的指责呢？说穿了，无非是想打着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幌子，从根本上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这一点，康生自己也有明白的表露。他说：“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了。他们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①。本来，承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是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而康生却拚命加以攻击，显然他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历史唯心主义翻案！为唯意志论开路！

第三，说“唯生产力论”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

这是康生加给“唯生产力论”的更加严重的“罪状”。请看他的言论吧！

---

① 1967年3月1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他在接见他儿子张子石时说："(唯生产力论) 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共同点和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达，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还是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在解放后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说："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仅从这两段话就可清楚地看出，康生的意思是说，"唯生产力论"是建国之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就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和北京所讲的那些可以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与发展的讲话。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刘少奇同志的上述讲话，是否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

谁都知道，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取何种态度？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的报告中，分析了解放后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指出了我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① 这是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的重要政策。这一点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刘少奇同志正是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种精神，而受党中央的委托去天津讲话的。到了天津，他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一种违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致使"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也有的准备逃跑，对共产党有怨言"。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后来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针对这种情绪而作的。假若不是有意歪曲，谁都会看明白，这些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事实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讲话，稳定了京津的资本家，安定了社会秩序，为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论从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来看，还是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不相干的。

康生硬把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当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最主要的是抓住了讲话中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大做文章。谁都清楚，这话是针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9页。

当时某些干部急于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左"的情绪而讲的，这句话无非是说明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这既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也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尖锐批评过那种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的错误观点。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批评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这些话都清楚地说明，全国解放之后，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有个必要的存在和发展，坚决反对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康生对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避而不谈，硬是抓住刘少奇同志所讲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的话，上纲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是别有用心，荒谬至极。其实，他不只是在批判刘少奇同志，而是在批判当时党的政策，批判毛泽东同志。正是通过这个批判，倒使我们清楚地看

到了康生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在建国之后"立刻消灭剥削"，"立刻消灭资产阶级"，"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用不着必要的物质基础，用不着大大发展生产力。——而这正是刘少奇同志当时所批判的那种违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幸而，康生在当时不在其位，否则，他一定会卖力推行这套"左"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会遭受康生之害的。

明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康生却偏偏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他常常搬出列宁来作后盾，又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列宁。他说：

"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我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

斗，然后再看分晓'。"

这里，康生力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列宁批判过什么"唯生产力论"，似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就是一篇专批"唯生产力论"的著作。其实，这是对列宁的诽谤、诬蔑和歪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晚，列宁由芬兰回到俄国，并在列宁格勒车站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著名讲演，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苏汉诺夫听了这个讲演，并在后来写的《革命札记》中攻击列宁的这个讲演，"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被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而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九二二年底，正在养病的列宁翻阅了苏汉诺夫这本《革命札记》，并针对他在《札记》中的责难，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样一篇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究竟是批判苏汉诺夫什么观点呢？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吗？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吗？也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观点。那批判什么呢？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看得清楚，他是批判苏汉诺夫"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的办法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正因如此，列宁才批判说，苏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

到了极点”，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又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直接指示”。也正因为这一点，列宁才批驳说：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但俄国革命形势使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取得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大发展生产力呢？可见，列宁这个批判，正是要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贯主张一样，成不了康生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根据的。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列宁主张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论点，康生为什么一句不引呢？能让他一手遮天，漫天撒谎吗？不，我们有必要略摘几段，以戳穿康生的隐瞒。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一切革命都曾经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制度、劳动纪律、劳动生产率、统计和监督、空前巩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保证。”① 列宁认为，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② 列宁又说：要完成消灭阶级以及消灭三大差别这样的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③ 列宁在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还坚持他的主张：“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这样，

---

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27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9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1 页。

才能从落后的、贫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的马上。① 难道这些话能由康生一笔勾销吗？

列宁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是谁都无法抹煞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就是确认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原始的关系，而思想的社会关系只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他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② 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③ 十月革命之后，已如上述，列宁又从各方面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主张建立起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事实说明，列宁从来就没有忽视过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列宁是不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呢？当然是强调的。但是，列宁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着眼于如何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而康生所说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则是不顾生产力

---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711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8—89 页。

性质，任意地“变革生产关系”。

在我国建国以前，我们党内哪一位领导同志同苏汉诺夫的主张一样呢？谁曾说由于我们生产力落后而反对打倒蒋介石呢？在建国以后，又有哪位领导同志搬出苏汉诺夫的主张而阻碍我们前进呢？除了康生的捏造和诬陷以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这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了，公然地把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旗拉起来了，而且公然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攻击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这不是往中国共产党的脸上抹黑是什么呢？这不是天大嘲讽又是什么呢？

第二十六章

“党的建设”奇谈

康生对于党的建设理论，自认为是高超的权威。高超在哪里？从他经常流露出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第一，他了解国际共运的理论和历史；第二，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当过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对我们党的建设实际，他似乎比谁都清楚；第三，他对党的建设理论经常挂在嘴上，谈论多。似乎从理论到实际，他都是“专家”。他说过：“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① 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差不多，一般地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个党应该怎么做”。② 他的意思很清楚，马、恩、列、斯都没有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现在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康生究竟是怎样解决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党的建设

① 这是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提到那六条建党原则。康生说成了五条原则。

② 1970年4月18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呢？

一、林彪"当然接班"的理论是他的建党理论的基石。他反复说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康生向外国一个党的领导人说："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长期以来，他不仅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领会得最深，运用得最活，具有马列主义修养的杰出的政治家。……他是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修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又向一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战士说："十一中全会上把林彪同志作为第一助手确定下来，这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林彪同志是长期跟随毛主席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

为了大树特树林彪的"绝对权威"，以便造成"理应接班"的舆论，康生指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加紧炮制"突出林副主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迅速编辑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同样规格的《林彪选集》和《林彪语录》。造反派头头按照康生的要求，很快编出了《大纲》、《选集》和《语录》。就《大纲》来说，全文总共不过七万五千字，而林彪的名字出现四十七次，江青出现十四次，陈伯达出现九次，康生出现八次。

不仅如此，康生还极力主张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和姚文元起草《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时就假借群众之口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说："许

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接着，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鼓吹说：“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底，即“九大”前夕，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了将林彪“接班人”问题写进“九大”党章，进行了更加频繁的活动。江青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讨论党章草案的会议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张春桥跑到上海造舆论说，只有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了”，人们“就放心了”。康生则默不作声地径直准备起在“九大”会议上专门介绍将林彪“接班人”写进党章具有伟大意义的讲话来了。

正是由于康生一伙如此大肆宣扬和顽固坚持，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才通过将林彪当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康生把这当作自己的“胜利”，竭力宣扬这件事的“伟大意义”。他说：“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彻底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九大”之后，在中央直属机关万人大会上，在同兄弟党的会谈中，他又反反复复地鼓吹“九大”党章这一规定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意义。总之，康生这些奇谈，完全是“圣人出，黄河清”的神话，是个人决定历史的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今天读起来，

真是对历史的辛辣讽刺。

二、“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是他“重建党”的根据。

康生很懂得党章对于一个政党的重要；也懂得制定一个新党章的目的和作用。因此，他竭尽全力抓新的党章的制定。结果真的在党的“九大”上制定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党章，这不能不说是康生的“杰作”。

“九大”党章究竟是什么货色？下面不妨根据康生到处鼓吹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些分析。

第一个特点：“重新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特点”，本身就说不通。因为“重新明确规定”的意思就是以前的党章曾经“明确规定”过。既然以前曾经“明确规定”过，那就不应该成为重申原来那个规定的新党章的特点。

康生为了说明这个特点，特别攻击“八大”党章。他说：“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一伙，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各种借口，公然在他们制定的党章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删掉。”这完全是恶意歪曲。的确，“八大”党章没有象“七大”党章所说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那样的词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八次大会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他的这个解释还是接近实际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康

生没有提及，这就是：在“八大”以前的几年中，毛泽东同志一再要求不要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字句了，党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为此发了通知，并提出今后宣传中，“毛泽东思想”可用“毛泽东著作”代替。所以“八大”党章没再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情况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八大”党章中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词句，说成是刘少奇同志为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有意“删掉”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应当说，这条规定确实是“九大”新党章的特点。这种规定，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党章中找不到的。这真是康生的空前“创举”。康生这样总结，也是绝无仅有的“贡献”！

第三个特点：“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确实也是“九大”新党章的一个特点。不过，其特点就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归结为所谓“崭新阶段”，从而严重歪曲了毛泽东思想。

第四个特点：“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这根本不是“九大”党章的特点，而是所有党章的共同点。因为任何一个党章，当它被制定时，都会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明确提出“党的战斗任务”，要不，它还算什么党章！

第五个特点：“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

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

为了说明“九大”党章的这个“特点”，康生放肆攻击恩格斯和列宁所制定的党纲。他说：“苏共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很长，一九一九年的党纲简直成了政治经济学了，本来党纲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形式长，内容复杂，什么都有，所以大家记不住。这可能受了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繁琐得很，连房子问题也谈到了。”①

康生在这里只就党章的长短问题大做文章，长了就不好，短了就好，这是哪一家的逻辑？根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实际需要，党章可长则长，可短则短，这完全是形式问题。我们“七大”和“八大”的党章都不短，有什么不好？“九大”党章倒是“简明扼要”，可是它错误百出，是共产党人的批判对象。再说，“简明扼要”也绝不是“九大”党章的独有“特点”。比如，一九〇五年列宁领导下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内容就“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再如，一九二一年，我党制定的第一个党章，也是“简明扼要”的。这个党章的中文原件早已失传了，现在只有俄、英两种文本。若将其译成中文，俄译稿有八百三十七个字，英译稿才有七百三十一个字。两者都比“九大”党章短得多，怎么能说短是“九大”党章的特点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康生所说的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实际上是一大特点，这就是吹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为

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

"接班人",以便把无产阶级政党篡改为忠于林彪的帮派组织。正因如此,"九大"之后,康生到处叫嚷"要根据新党章整顿、恢复、重建党"。

三、鼓吹"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康生十分强调"思想上整党"。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都认为一个人不好,从组织上一开除就万事大吉。其实,错误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老早就开除出党了,但是机会主义还有。李立三垮台以后,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还有……所以,只有组织上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胜利。"① 康生究竟怎样进行"思想上整党"呢?就是不断地在党内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无休止地进行党内斗争。他说:不断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②

康生不仅把"路线斗争"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高度,而且还以中央党校为试点竭尽全力抓"路线斗争",以实现他的所谓"党的建设"。康生自己说,他插手中央党校十年中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怎样进行这十次"路线斗争"的吧!

第一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的上半年",斗争的问题是,"到底需要不需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两

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讲话。

② 1970年4月18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大重要著作”。“当时我向杨献珍、侯维煜提议把党校的讲课计划停止，专门学习毛主席这两大著作，遭到杨献珍、侯维煜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个斗争，使我进一步觉悟到党校对毛主席著作不重视，不把它看成是经典著作。”

这是对杨献珍、侯维煜同志的栽赃陷害。凡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杨、侯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那两个报告是极为重视的。先是组织大家听取报告录音，接着又决定停课两周学习根据录音整理的铅印稿。两周之后，杨、侯同志又特别强调说，学习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待正式文稿发表后再结合专业深入学。这怎能说杨、侯同志认为“不需要学习”呢？所谓杨、侯“不把毛主席著作看成经典著作”，也完全不是事实。的确，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央党校起草的《支部工作纲要》中有“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提法，但这是从延安时期就沿用下来的提法，而且从这个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摆在学生的地位，这怎么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不重视呢。同年九月，在中央党校第二次党代会上，正是杨献珍同志首先对这个传统的提法提出异议，建议停止使用。这怎么能说杨、侯两同志不把毛主席著作当作经典著作呢！既然不是反对学习毛主席的两个重要报告，也不是否定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那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就在于康生主张完全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只学毛主席的报告；杨、侯同志主张毛主席报告要学，教学计划也要执行。这难道也是“路线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对中央党校教学活动的这次干涉是通过他老婆曹轶欧进行的。他自己明白说过：“因为那时我不

管党校……曹轶欧那时在短训班，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们应该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怎么能不按党中央规定的组织手续，而通过自己的老婆去瞎指挥呢？这不是封建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呢？难道让中央党校校长去听从康生夫人的传话，立即改变全校学员的学习活动，才是正常的吗？这是要求对毛主席著作的重视，还是要求对康生老婆转达的康生指示的重视？假若杨、侯二同志真的拒绝、抵制的话，那么，他们拒绝、抵制的是毛主席的指示，还是拒绝、抵制的是康生、曹轶欧的瞎指挥？

第二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斗争的问题是中央党校要不要（搞）整风反右的革命运动"，"那个时候杨献珍、侯维煜……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理由是党校干部都是各地方来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当时我反对了，这是整风反右，是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嘛！难道党校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经过这一斗争才没有放假"。

这也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上，中央党校党委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态度是积极的，早在康生干涉之前就决定党校所办的各种班一律取消假期，留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问题只是出在中宣部主办的、中央党校代管的、即将结业的短训班上。中央党校考虑，运动一起，党校根本无力照顾短训班。为此，特打报告请示中宣部派人来直接领导。中宣部答复：中宣部也派不出人去领导，可考虑让短训班按期结业，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中央党校讨论中宣部的答复时，短训班主任曹轶欧第一个发言，表示同意照中宣部的意见办。其他党委委员也

表赞同。只有党委书记侯维煜同志表示反对。他说，短训班还是留下搞运动好，关于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由党校内部设法解决。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不同意侯的意见，最后，侯只好郑重声明："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保留意见"。并特别嘱咐记录同志把他的意见记录下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可是康生却歪曲说杨、侯"有意把短训班弄走了"，并且造谣说："杨、侯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只是经过他的斗争，"才没有放假"等等。这纯粹是为了标榜自己对整风反右的激进态度而编造的谎言。

康生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的态度是出奇的激进，这倒是事实。但是，这种激进并不在于他主张取消假期搞运动上，而在于任意把革命同志打成"右派"上。当时，中央党校曾组织学员讨论对社会上鸣放的认识。事后，曾将讨论情况整理成八类二十四个问题上报中央，其目的是让中央了解情况。对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怎样认识？中央党校认为，它分四种情况：一是正确批评。对此，应该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工作；二是情况不明。对此，应说明情况，解除误解；三是认识模糊。对此，应该通过学习逐步提高思想；四是错误言论。对此，应该批评帮助。总之，四种情况皆不属于右派言论。可是康生却一口咬定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是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划为右派。结果，在他的鼓动和坚持下，错划了许多右派。这就是康生装病多年之后所干的第一桩事，这也是他在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中的真正"贡献"！

第三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斗争问题是关于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

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杨献珍"把'十六字'(方针)当圣经，在全国到处讲，谁要不同意就是离经叛道"，而"我批判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康生对这次"路线斗争"的描述，是颇能令人玩味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央党校就办校方针、任务等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总结了党校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第一次将党校的方针具体表述为十六个字："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一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写的《关于全国初级党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说：十六字方针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全国初级党校。(此时，十六字略作改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可见，"十六字"方针是中共中央肯定的，并直接向全国党校推广的。把它说成是"杨献珍的方针"，而且是"对抗毛主席的方针"！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必须指出，在"十六字方针"问题上，康生是耍尽了两面派手法的。人们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作报告的时候说："十六字方针"是"带根本性"的方针，是中央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的"，它是"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他特别强调说，这个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

中宣部召开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说："这个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并且向人们指出："十六字方针"，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方针"，除此之外，"不能有另外的解释"。这些话真是把"十六字"方针捧到了九天之上，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准怀疑，都不许作别的解释。他不是一次讲，是多次讲，也不是向一个领域或一个单位讲，而是向全国讲。可是这些话说了还不到一年，康生就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来了个"另外的解释"，认为"十六字"方针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根据康生自己的需要，他的调子变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生在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对"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恶毒攻击，从九天之上，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这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学习理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还是联系反革命实际；提高认识，是提高党的思想认识，还是提高反党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性?"还说："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成为反党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令说："今后不许再用!"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谁敢相信，这是出自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一人之口！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一般人的为人道德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是康生的惯

用手法。康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报告中曾经公开声明说："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有用"。既当吹鼓手，又当刽子手！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在两面派看来，一点也不怪！

第六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六二年，斗争的问题是翻案还是反翻案。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大搞翻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杨献珍"，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

所谓大搞翻案，实际是指中央党校否定杨献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办校有所谓方向性错误两件事。在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党校讨论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就有不少同志提出：杨献珍等同志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不要为其平反；中央党校是不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不要对"十六字"方针重新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由当时的中央监委常务副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主持党委会讨论处理。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向中央写出甄别报告，明确提出，杨献珍同志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此案可以了结。关于第二个问题，由党委发动全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讨论，成立了若干小组讨论、起草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是非，端正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在这个条例中，开宗明义，肯定"十六字"方针是正确的。另外，还发动群众总结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教学工作经验，揭露党校问题。许多同志点名道姓地系统地批评了康生、曹轶欧的错误做法，清理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出的所谓"最高最后标准"、"顶峰"、"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少而精"、"立竿见影"等错误口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同志

们的揭发，本着“有言必录，保护批评者”的原则，编出四十三期《简报》，并写了个《中央党校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总结（草案）》。以上材料，均发给了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讨论，并报送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康生得知以上情况，硬说是“翻案”，攻击起草小组是“反党小集团”，叫嚷要大反“翻案风”。因此，康生挑起的这次所谓“路线斗争”，实际是打着“反翻案”的幌子，维护其插手党校以来的胡作非为。

这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亲自挑起的四次“路线斗争”的真相。除此之外，他在中央党校还挑起了六次“路线斗争”，这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对“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的批判；五九年下半年，对杨献珍同志所谓“反三面红旗”的批判；六四年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春，配合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反彭真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夏，在中央党校掀起的“反林枫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底，在中央党校又掀起了“同刘邓路线的斗争”。这六次“斗争”，有的已在前面专章或专节评述，有的前面虽未评述，但其情况与实质，人所共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康生插手中央党校不过十年时间，十年之中，他就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每次都以胜利而告终，这很好地说明了，他真不愧为是“路线斗争”的“勇士”、“行家”和“常胜将军”。但是，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清，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实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是对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是以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搅乱思想为目的的“挖心战”，是他实现篡

党夺权、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重要手段。

四、“吐故纳新”，以帮代党。

康生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他说：“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搞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① 因此，他极力主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办法，实行开门整党，大搞“吐(故)、挂(起来)、纳(新)”。②

“吐故纳新”，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用于整党建党就很值得研究了。故和新的性质、界限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什么样的故该吐，什么样的新该纳？完全随着康生的主观随意性和帮派性而变化。

康生究竟要吐些什么“故”呢？

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是“需要耐心教育”的，但是“还要看他自己能不能活起来”，如果“活不起来”，那就要“开除出党”，或者“劝其退党”。由此看来，康要吐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二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三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关于这三种人，我们绝不可从字义上来理解，而要从事实上来看。我们从前面几章的评述中，就可清楚地知道：他所说的“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主要是指他们通过捏造假证而加以诬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所

① 1967年11月13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② 1969年11月17日，在听取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说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实际是那些旗帜鲜明反对他们一伙胡作非为，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革命同志；他所说的"死气沉沉，不起作用"者，实际是指那些以消极方式抵制他们一伙的同志。这些就是康生要吐的对象。

康生对"纳新"也是十分重视的。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说：这次"'九大'新选出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来自基层的八十一名，这是文化大革命巨大成绩在中央委员会的表现。"当然，它"不仅表现在吐故方面"，即把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清出来"，而且"还表现在纳新上"。他说对这个成绩切"不可忽视"，"不可低估"，因为"它对当前整党和今后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纳新"如此重要，所以，他接着又说："将来召开四届人大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点新气象"，要准备纳点"新人"。



（一九七〇年）
康生在一个会议上讲话

康生究竟要纳点什么样的"新人"？就是纳那种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敢于英勇牺牲"，"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人。康生特别举例说："比如蒯大富，群众对他有意见，可以说服群众同意"，"不管蒯大富有什么错误，总比李济深好吧！过去李济深还是人大常委

呢！你说蒯大富开枪打死人，李济深开枪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也不是说蒯大富那么好，但他起码还是反对刘少奇的"。再说，"纳不纳蒯大富，还有个国际影响问题"，因为"中国红卫兵对国际青年运动影响极大"。①这就是说，张铁生、陈阿大、翁森鹤之类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同他们一伙有着血缘关系，裙带关系的一帮子，以及那些打砸抢分子，那怕是杀人犯，只要他们能跟着康生转，勇敢地反对所谓的"走资派"，就是"纳新"的对象。把这些人拉入党内，成为康生"重建党"的基础，还说是共产党的建设，这不是海外奇谈吗！

康生要建设的这种帮派，若要贴上江青或康记商标，那是货真价实的，若要挂上"共产党"的招牌，那就成了今古奇观！

① 1970年4月22日，在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二十七章

图书文物大盗

康生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左手、右手都能写出具有特点的字体，也为人书写过不少条幅和匾额。在绘画上他为同齐白石对立，起名叫“鲁赤水”，有过作品，也发过议论。他还是一个雕刻图章的金石家。他对图书文物有着特殊的爱好。这里，我们不想议论他的书法和绘画以及他的其他兴趣的好坏。我们仅就他由于爱好图书文物发展到不择手段地加以攫取，而且成为著名的图书文物大盗，作些介绍。让我们看看这位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抄抢”，而自己却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发劫难财的！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人，不仅是一伙反革命集团，而且是国家文物珍宝的盗窃集团。据统计，康生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占劫伙犯窃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居于首位；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占劫伙犯窃取文物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仅次于林彪，居第二位。康生所窃取的这些图书文物均有单据为证。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二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

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文革"中，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一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康生劫取图书文物的情景如何？下面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藏书的特点，主要藏些戏曲小说方面的图书，而且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其中许多是宋元版的戏曲善本，版画插图很多，异常丰富多采。因此，康生对傅惜华的藏书特别感兴趣。"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公开煽动打砸抢。幼稚者起来造反，抢劫者窝藏祸心！那股抄家之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康生得知藏书家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文管处国子监藏书库，顾不得让人代劳，就赶紧驱车亲自前往。到了书库，这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不顾温度低寒、空气污浊、尘土飞扬，也不怕里面是如何杂乱和肮脏，一屁股坐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木箱上，亲自破捆挑书。尽管当时冻得喷嚏打个不停，鼻涕流个不止，但他还是那样专心致志的挑书。真象一个发现了财宝

的贪得无厌的地主老财。下面就是他在这次挑书时的谈话记录：

康生：这么多书都是傅惜华的吗？

答：是，我们把其中的明刻版或较好的抄本选出来八百多种，这一大批还没有细看，估计还有不少好的。

康生：这些也可以看看（选了两捆中的四种）。我还是先看你这书单上的书吧。其中有一种书，我在四九年看见过，是东安市场刘鸣可的，那时他要的价钱太高，在那儿摆了很久，后来又还给他了。四九年以后，我又追这部书，托了很多人找这部书也没找见。现在从这个书单里见到了。

答：……可能这部书就是您四九年看到的那部书，傅惜华买去了。

康生：很可能就是那部书。他这批东西有的很好，我过去未见到过，如明刻赏心亭本《欢喜冤家》十册，明刻消闲居刊本的《拍案惊奇》十六册，明刻的《浓清快史》六册，都是很少见的。我划"○"的要找到，划"一"的一定要找到；画"○"的重要，划"一"的更重要。……

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流入康生之手的时候，所谓"破四旧"的"革命"也就完成了。在你手里是"四旧"，到我手里就为"四新"，你占有不如我占有，这就是康生的强盗逻辑！

康生的占有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借条占有。这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窃取文物的重要手段。那时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占有国家文物，因而总例行必要的手续，写个借条。康生经常以"借"的名义从北京

图书馆拿走大量图书，可是只见借不见还，最后，至死未还。图书如此，文物也是如此。一九五六年，故宫博物院在太和殿展出了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而且还将此砚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为康所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过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三件（包括他从故宫“借”走的这件在内）。这几方唐代陶龟砚，是说明我国砚史发展的重要文物，是无价之宝。一九五八年，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三方名砚。这三方名砚，是康生从文管处窃取的四十五方砚台中最好的。由于康生“久借不还”，不好入帐，国家文物局只好派人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所有了。

第二，无偿占有。这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窃取图书文物的主要手段。下面略举几例：

（一）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就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二）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当康生去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藏书是否已经抄出时，突然在那里发现一本《石头记》，他说：“这部《石头记》是八十回的改写稿子，我拿回去看看！”这样，《石头记》也被白白拿走了。

（三）一九七〇年五月二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人一起拥到文管处库房。他们象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

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和文物。他们各自抢占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有失首长身份，于是又假表谦让，当场互相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同月，北京市文物局请康生鉴别永定门外战国墓出土的一方象牙合印章的刻字，康生说："取走看看"，从此之后，一直没有归还。

（四）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康生陪同江青到文管处去进行劫掠。其间，江青两次提到康生送她的端砚和墨如何好，要求康生帮她选定藏书用章的篆体字。这次，又白拿走一批文物。

（五）考古学家陈梦家收藏的中国文字学的重要著录，被查抄后，送到北京市文管处。康生得知后，将大部分书籍取走不还。

（六）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继珍藏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写给他的亲笔信，"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康生强行取走，至今下落不明。

（七）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用一千三百五十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曹轶欧取走了。

凡此种种，正是康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应当"革"文化之命的一个注释。

第三，廉价占有。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窃取图书文物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

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又如，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也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取走。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一方折价五分钱到五角钱掠去。

一次，文管处给康生所要的图书文物作价略高了一些（实际上比国内最低估价低得多），康生很不满意。他通过其秘书指责文管处对中央领导“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说什么“你们还让康生同志吃饭不？”在这种威胁下，只好随其自便，愿付钱由他，不愿付钱也由他，象征性付点以示购买也还由他！在康生看来，只要他看得上的，就应向他进贡，就象当年他家的佃户理应向他家进贡一样。所谓付款，无非是想掩人耳目，说明他是买来的而不是白拿的。

据统计，康生用象征性付款的手段，所攫取的图书，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八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元，而康生仅付二千三百六十四元，占估价总数的百分之三；所攫取的文物，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七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元，而康生仅付二百五十二元，占估价总数的千分之三。这就是康氏的等价交换！无怪乎康生对文管处的同志说：“我不怕欠帐！”原来，他知道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他所窃取的图书和文物，若在国际市场出售，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成百万富翁！”由此看来，康生不仅是一名盗窃犯；而且是一名投机倒把犯。

第四，掠夺占有。

“文化大革命”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康生分文未给攫为己有。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地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精选珍贵材料配制龟形砚身。一九七〇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紧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龟形砚台。于是，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一百四十四个工，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耗资八百余元，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这些占有方式，对康生来说，就是将国家的和私人的图书文物，统统纳入他的私库。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归私”，而且是“归康生之私”，然而康生却亲自雕刻方印名曰：“归公”和“大公无私”。著名藏书家赵元方的书上，本来已有“赵元方藏”的印章，康生却又盖上了“归公”、“大公无私”、“康生”三枚印章。邓拓同志的许多书籍文物，本来有“邓”字标记，康生却将其撕去，同样打上“归公”、“大公无私”、“康生”三枚印章。可见，康生的所谓“归公”和“大公无私”，就是将别人的东西或国家的东西掠夺为康生所有，只要归康生所有了，就叫“归公”，就叫“大公无私”。

康生在他掠夺的一部二十一史的扉页上对“归公”二字作了一个说明。他说：“此为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全书四百五十七册，完整无缺。曾流入日本田藩文库，后又归于国内，可

谓物归原主矣。为使善本古籍不致流入外国，或被销毁散失，乃于工余之时，加以搜集拼凑装修，借以休息，并准备将来统交党中央图书馆保存，故印一‘归公’章，以示无私也。”康生这段自白，真象婊子立牌坊！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本是我国珍本，现从国外返回，无疑仍归国家所有，这里怎么能显示康生的“无私”?!明明是抢劫犯，却谈自己“无私”，康生所说：“准备将来交党中央图书馆保存”就是说，他是物主，是二十一史的所有者，所谓“物归原主”就是归还于他，而党中央图书馆仅是受康生之托于将来代为“保存”而已！事实上，在康生断气之前，二十一史一直在他这个“物主”的手中。

通过康生贪得无厌的侵吞国家、集体和别人的图书文物的事实，使我们真正领会了康生长期以来叫得最响的所谓“革命”一词的真正含义。原来他所说的“革命”，就是变国家、集体、别人所有为康生私有。

第二十八章

诬陷与奇冤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艰难险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长期被选任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和国家的主席，已经载入我们的史册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我党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对刘少奇同志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以致折磨致死，铸成了我党历史上的特大冤案。在这一奇冤中，康生起了奇特的作用。

人们不禁要问，康生对刘少奇的态度不是一直很尊重吗？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是的，在康生那里，对人的态度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无须追溯得太远。康生自一九五六年东山再起，他除了眼睛盯着毛泽东同志以外，当然也盯着刘少奇同志，一有机会便奉承一番。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他在全国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赞扬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总结了两次革命的经验，在今后建设问题上，进一步发挥了主席十

大矛盾的思想，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又赞扬刘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一年，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不久，康生又自荐主编《刘少奇选集》，并且立即着手编辑。后来被康生批了个一塌糊涂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康生提议，并由他指定专人修改而再版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康生主持的《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刚刚结束，就赶紧向少奇同志说："您的《选集》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杀气腾腾地独揽了整个会议的发言权，发言中除了大骂彭、罗、陆、杨之外，还指着鼻子大骂朱德同志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一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的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尽管如此，这时，康生对刘少奇同志还是恭恭敬敬的。就在这个会议上，康生还当面检查了一九三一年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攻击，说："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由此看来，康生对刘少奇同志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有这么一番表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时他认为刘少奇同志“接班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当时

只想到彭真(的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有问题”。可是，待“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一拉开，康生得知毛泽东同志不同意派工作组的态度之后，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态度就一下改变了。七月二十五日，当毛泽东同志由外地回到北京第一次召开大区书记会议时，康生就把中央批发的北大工作组关于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放在自己皮包里。后来他说：“我当时把文件带在身上，想送给毛主席看看，但是勇气不够，想了半天，又放回皮包里了，怕说成是告状。隔天，我将这个错误文件的危害，告诉原批发者，想推动他自己向主席报告，但毫无结果。”这段自白，说明康生在这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还没有完全摸底，所以有些举棋不定，欲攻又止。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康生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在刘少奇同志面前了。

康生是怎样诬陷刘少奇同志的呢？

一，虚构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康生说，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有着不同的解释，时而增加内容，时而延长时间，刘少奇的队伍，康生也一再为之扩编。他最初的解释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初决定派出工作组的那五十天中的问题。怎么派工作组就是反动路线呢？如果这样说能成立的话，那么在此以前的政治运动，比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派、四清都曾派出过工作组；在此之后的“工宣队”、“军宣队”，以及以“支左”名义派出的“军代表”，不也是工作组吗？其实，派工作组是我

党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派工作组本身不好说是什么路线错误。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一切，也不顾自己曾经积极支持过派出工作组的事实，硬把派工作组的责任完全推给刘少奇同志，说什么决定派工作组本身就是刘少奇制定和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则又解释说："不仅仅是由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司令部发生了问题，而且是由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条顽固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从此之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扩展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认为这条路线一直"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具体内容是什么？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一直批了七、八个月啦，可谁也没有系统地具体地分析过。直到四月初，林彪亲自点将，要康生在十三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详细讲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时，康生应林彪之政治需要，组织了自己的班子为他起草，戚本禹、叶群也亲自出马相助，方才为刘少奇编造了那条"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

在白区工作中，刘少奇"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因而"不是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抗日战争中，"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

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刘少奇“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

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

一九六四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除此之外，康生还在别的讲话中说：刘少奇在文教卫生、工交农业、军事外交各个方面也都有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样，刘少奇的一条一贯的全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康生炮制出笼了。

看来，康生的独特眼光，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最“高明”的了。

从三十年代起，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每个时期都有一套同党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反动路线，有时间有内容，康生提得尖锐，提得具体，似乎刘少奇在党内从来就是破坏捣乱的。如果康生的讲话是事实的话，那末人们自然会问：第一，康生一方面高度颂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是如何英明如何伟大，另一方面又胡说，这个党出现了一个象刘少奇这样的反党人物，而且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内居于重要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同志的左右手，这不是公然宣传这个党蠢之又蠢吗？第二，康生既然那么明确具体地发现了刘少奇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他又在各个时期都颂扬刘少奇，都在推崇刘少奇为正确路线代表呢？他过去的说法和现在的说法完全相反，何者为准？要么过去是假话，要么现在是假话，或者过去和现在都是假话，是个货真价实的两面派！第三，康生把刘少奇的历史说成是反党史，是党内埋藏几十年的定时炸弹，他以情报专家自居，告诉人们几十年前他就有觉察，但他从来没有向党说明过，说出来的都是反话，现在一下子就公诸于世，几十年后他才吐出内心话，这不是更加令人惊异地感到他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吗？

二，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康生认为：既然刘少奇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就一定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了证实这个推论，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即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特地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张条子，让他们查一查混进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南开大学"红卫兵"根据康生的这一指示，迅速组织了七、八十

人的“抓叛徒战斗队”，并大量复制康生的指示，发给每个战斗队成员，作为随意出入各单位，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过去党和国家规定的一切有关保密的规章制度，都告吹了。战斗队一成立，就按照康生的指点，查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这就是康生、江青一再大喊大叫的“小将立了大功”的“胜利成果”！

八个月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为了操纵学生组织，继续扶植自己封的“造反派”头头，康生又给聂元梓写了一张条子：“天津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组织了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的结果，看到了旧北京市委内部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的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根据康生的这张条子，聂元梓等人立即组织了所谓“专门从事叛徒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二战斗队”，又名“揪叛徒兵团”。其活动极为诡秘，人员名单、工作计划、调查报告，都直接请示康生。实际上，这是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别动队！“第二战斗队”成立后，立即调查了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三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后设法营救出狱的被国民党关押的近三百名“政治犯”。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在接见中组部工作人员时，又要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等组织“揪叛徒”的“经验”。于是，中组部和全国各地，也都照此办理起来，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揪叛徒”的一支庞大队伍。这支队伍在康生的授意下，当然“成绩辉煌”，到六月七日止，全国揪出“历史上被捕、被俘后自首变节或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就达五千二百余名。康生的“被捕叛变论”先推行于他的直属“战斗

队”，又推行于全国。凡被捕就叛变，这大半是康生的体验。所以，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表声明：他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叛变过！他既然揪出了这么多“叛徒”，就足以证明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是确实存在的。由假设到求证，这就是康生的公式！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就是康生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重要“证据”。其实，这完全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这一点，康生完全清楚。他曾于一九四三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一九四四年，他向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他就向中央写报告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更卑鄙的是康生还指使一些人向有关人员威胁逼供，制造假证据。专案人员不准这些同志谈“毛主席知道此事”，威胁说：“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还逼张闻天同志承认这些同志出狱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威胁说：“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也是由康生一手制造并被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证据”。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包括从苏归国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

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一九四六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经中共中央与之交涉进行营救，除公开叛党的十五人外，其余一百二十几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七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康生也在这个欢迎的队伍中，而且其欢迎之热烈尤为突出。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康生"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黧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喊道：'你终于回来了'。"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当康生掀起"揪叛徒"风浪之后，这批同志除已故和下落不明者外，共九十名，都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并于同年十一月几乎全部立案审查。康生明知此案的一切情形，不但不说明真相，相反却无中生有地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八年之久，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大批亲友受株连。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此案才得以平反。

三，四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

康生认为，只批判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能满足林彪、江青的要求，于是战斗便向"纵深"发展！什么才是头号敌人？什么帽子才是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积康生之经验，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于是就把这四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了！怎样扣法呢？只要想得出，就能扣得上，这是康生的拿手

戏。康生采用诱供、逼供办法，制造了这个前所未闻的奇冤。

为了给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康生曾三次派人去强迫安子文同志出来作证。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受派人对安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受派人答："是"。安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这样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春天。此时，安子文同志已被关进监狱。受派人找到安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第一功已有人立了，现在你能立第二功，对你也有极大好处。"又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回答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还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有什么法子?!"结果又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三次是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前夕。来人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做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回答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再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向押在狱中的人逼"证明"，你写了就"立功"，你不写，你就是叛徒！当时听了复杂，现在看来简单，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康生以"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反动派的勾当！

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

务”、“反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他们都被取保释放了。历史事实就是这样。然而，江、康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此，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加以“隔离审查”。在康生的直接导演下，专案组成员轮番批斗，强逼硬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问题，不达目的，批斗不止。这样一连搞了七天，×××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假话。但是过后很快反供了。先后写出推翻假供的申诉二十份，一再说明这个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可是，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同刘少奇同志一起搞过地下工作。为了取得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江、康、谢等人下令将丁拘留起来令其交代。丁觉群就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如实写了：“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当然这种交代，是不会使他们满意的。因此，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落在丁觉群的身上。丁在经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说了违心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反供声明，说：“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又写信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本来设专案，应当是从调查入手，取得真正可靠的材料，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可是康生、江青、谢富治领导的专案不是这样。他们是结论在前，专案要按照结论去找去编符合结论的材料。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预见得正确。他们预想刘少奇是叛徒，就一定是叛徒。他们为了定刘少奇是特务，竟然决定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他们认为只要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可是，不管怎样逼供、诱供，还是搞不出证据来。专案组只好做贼心虚地说："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对此，江青看了仍不满意，特令康生另行改写。尽管康生手中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王光美的结论证实了，刘少奇的结论也就轻而易举地不证也"实"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即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炮制完成的前夕，康生又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丰富的想象，特有的才能，抓叛徒，叛徒出，挖特务，特务在！刘少奇就这样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和"工贼"。

随着他们对刘少奇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不断增多和加重，进而采取了最为疯狂最为残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们擅自决定在中南海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并指令专案组在批斗会的同时，冒充"造反派"，混到群众中去抄刘少奇同志的家。在批斗会上，他们不许刘少

奇同志讲一句话，强迫他低头弯腰。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他们还揪着刘少奇同志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像。一个国家主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鼻青眼肿。他脚上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人推来搡去，脖子上挂着画有绞索和“红卫兵”的笔尖及拳头的漫画。经过这种严重的摧残，刘少奇同志的腰部伸不直了，右腿瘸了，只能双手撑扶着走廊蹭地移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还不算，他们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把“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押送开封监狱。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刘少奇同志折磨致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简要经过。

第二十九章

精于害人之道

康生长于钻营之术，精于害人之道，这并不是夸张之词，略摆一些事实，就会使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迫害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或党性强的共产党员，总之，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精英所在。他对这些人咬牙切齿，具有刻骨的仇恨。倘若说他有蛇蝎之心、豺狼之性，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这样一个败类，方使全党倍受折腾，千万干部处在灾难之中。

康生自二十年代中期钻入共产党内时起，为了得宠于最高领导人，谋取重要职位，以满足其野心，害人之事不但从来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了把自己蓄积了几十年的害人经验，全部用以效忠林彪和江青，竟然更加疯狂地残害起干部和群众来。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不止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比起李林甫、来俊臣、周兴、秦桧、魏忠贤之类的人物来，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关于康生在“文革”前的不同时期的害人情况，前面皆有专章评述。至于“文革”之中的害人情况，前面在揭露康生的一系列篡权

活动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中，有对彭、罗、陆、杨四同志的诬陷，有对朱德、陈云同志的诬陷，有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有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还有对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几位国务院副总理的诬陷等等。这些虽然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害人的突出事例，但是还不能反映他这个迫害狂的全貌，因而还有必要设专章集中评述一下。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康生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毫不隐讳地公开地抛弃了这一根本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大权。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就有十几个，"审查"对象二百二十人。其余三十三个专案组，"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虽不由康生分管，但他全都参与谋划和控制。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据统计，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二百一十人，其余四百七十九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由此，我们不仅看到康生害人之多是惊人的，而且害人之重点也是清楚的。其害人之重点就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老干部是他实现篡权目的的最大障碍。

一九六八年，康生为了实现林彪、江青"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编造了几个黑名单，诬陷了大量

的重要领导干部。一是，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排列了一个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所谓有“政治问题”者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竟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江、康两人，就这样狼狈为奸，共同诬陷了大多数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二是，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又把中共八届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是，八月二十七日，康、曹又指使郭玉峰分别编造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中，又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的主要对象，也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不仅迫害大批干部，而且根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康生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指示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这实际是告诉他们要对干部子弟进行株连。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当然心领神会，根据这一“指示”很快造了一份包括一百五十多个青少年的“黑帮子女名册”。接

着，又择其一部分办了一个所谓“学习班”，甚至列为“中学生专案”，进行审查、批斗。康生为什么对干部子女也要进行迫害呢？他曾对此作过多次解释。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对其心腹说过：“现在社会上有股逆流”，“主要是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其中有我一个，还包括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而“这股逆流多是来自高干子弟”，看来，“高干子弟一天天变成反动的法西斯”，说明“这些人对我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本人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目的是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来作阶级报复”。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又说：“中央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派不会通过他们的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呢！”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他再次说：现在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外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指‘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会利用其子弟来反对我”。康生在这里直言不讳，他之所以要斩草除根，就是因为既整父一代，也整子一代，按照林家王朝的规矩，老子当权，儿得继承，父是黑帮，儿也完蛋。这就是他们改朝换代的实质。在康生看来，他和他的家庭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他，谁就必须打倒。他在延安整过的人及其子女都会恨他。因此，他极力主张通过子女追老子。关于这个问题，曹轶欧说得特别明白：“问题严重的要追追根，很多话不是小孩子能说得出来的”，“一定要追清，他是听谁说的，怎么说的”。真是夫唱妇

随，康生的戏，缺这个角色就显得单调了。

除此之外，康生对广大群众也不放松。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初，他到处挑动派性，支一派压一派。由于这些挑动，又不知有多少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他为了准备在中共“九大”时实现林彪、江青的全面夺权，除编造了上面所提到的那几个诬陷名单，阴谋把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予以打倒之外，还在“清队”、“揪坏人”的口号下，把打击迫害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群众。因此而受害的群众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估计，不过从内蒙古开展的所谓“揪内人党”一事可见一斑。内蒙古“揪内人党”一案是康生、江青、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革委会核心组汇报时指示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揪。开始揪得宽点，不要怕。”正是在康、江的这种支持下，内蒙古才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已深入到基层，严重恶果已明显暴露，但康生仍指示内蒙古继续挖下去，说什么“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结果使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运动搞得更凶了。据统计，仅因“内人党”一案而遭到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就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害人根本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而完全由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下命令。康生究竟怎样随心所欲地害人？下面不妨举几个典型事例。

一、“可能”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

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① 对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应当根据历史事实，而不应当根据可能。康生怀着另外的心肠，有自己另外的逻辑。吴晗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阶段，就因被康生诬陷为“为彭德怀翻案”而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了。但康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因而在“文革”前夕又诬陷说：“上海有过一个叛徒，叫吴小圃，这个吴小圃可能就是吴晗的笔名”。其目的很明显，康生是想以这种“可能”为依据把吴晗同志打成“叛徒”。当时，彭真、刘仁同志还在主持工作，他们用确凿的调查材料驳斥了康生的这一诬陷，指出：“吴晗同志从来没有被捕过，吴小圃与吴晗毫无关系”。可是康生硬是不顾事实，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仍然重复吴晗“可能”是“叛徒”的诬陷，并下令将其逮捕，日夜“突击审讯”。但是，经过一段逼供，还是找不到半点证据。于是，康生就说：“吴晗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如果说，先诬吴是“叛徒”是以“可能”为依据，那么在此诬吴为“特务”，则是连“可能”的依据也没有了。在他看来，他说吴晗是“特务”，吴晗就应当是“特务”，根本用不着拿什么证据。吴晗同志就是这样遭受诬陷而惨死在狱中的。

二、“由此及彼”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对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根据这个“由此及彼”的推论，贺龙同志就被诬陷为企图搞“二月兵变”的“大阴谋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

家、大野心家”了。这种极其荒谬的推理，居然闹得满城风雨。为此株连极其广泛，组织了专门班子作为“要案”审查，把贺龙同志残酷迫害致死。这就是康生为了满足林彪的心愿杜撰的奇特逻辑。

三、“想象”论。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正当“造反派”到处“揪叛徒”之时，康生的妻妹，也是他的长期姘头，原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突然死亡。经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央政法干校三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特别是经医院解剖检验，确定为服安眠药自杀。可康、曹二人硬说“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来的，强令调查组“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充分考虑他杀的可能性”。联合调查组针对康生的怀疑再次调查，一一予以否定。康生还是听不进，仍然坚持说是“谋害”，并且提出要把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北京医院抢救大夫顾惜春（女）等八名同志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审查。另外还有五十名同志被列为非重点审查对象。结果逼死一人，逼疯四人，逮捕七人。康生究竟根据什么说苏枚之死是“谋害”而不是“自杀”呢？当然只是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只有他的这种想象力，才会不顾事实，断定“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从另一死人胃里偷偷移置过来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康生随同林彪接见某军区司令员。其间，有人汇报说：“内蒙古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人的来信”。听了这些汇报，林彪立即说：“这是有计划的

腐蚀部队"，康生也信口插话说："这是乌兰夫搞的"。康生根据什么说是"乌兰夫搞的"呢？当然还是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也只有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才会想象出当时已经失去自由的乌兰夫同志还会"有计划的腐蚀军队"。

四、栽赃论。

一九六七年春，经康生批准，从中央党校抽调一些同志去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当时担任党校"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指挥的李广文同志也被调去负责宣传组办公室工作。到了当年秋天，主管中央文革宣传组的王力、关锋等人相继被揪了出来。康生为了把自己同王、关等人摘开，竟然采用赖帐的卑劣手法，诬说李广文去宣传组是背着他去的，事先他根本不知道。并且当面责骂李广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搞得了宣传工作？此话一出，立即哗然。不少人私下议论：中央党校指挥部的一个领导人不通过主管党校的康生能随便跑到"中央文革宣传组"去工作吗？既然知道李广文不适宜搞宣传工作又为什么要派他去呢？既然李广文是背着康生去"中央文革"的，那为什么在"中央文革"共同工作了大半年之后才将其撵走？……事情真是过于离奇了。出现这种离奇现象不是别的，完全是由于康生赖帐造成的。康生就是通过这种赖帐的卑劣行径来嫁祸于人的。李广文对此十分愤慨，于十月八日贴出大字报揭露了康生"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康生及其亲信就已经坐立不安了。在中央党校立刻哄嚷起来，大部分群众争看大字报，少数人则怒骂、撕扯、覆盖这张大字报。同时，李广文也被武士们揪斗了。跟着就是"中央文革"的命令，说李广文是"现

行反革命”，宣布当场逮捕。

杨献珍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康生当作打倒对象整过多次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然又把杨献珍同志当作“里通外国分子”，进一步进行陷害。杨献珍同志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分子”的呢？说来是出丑剧。原来是杨献珍同志曾于建国之初参加过一次曹轶欧宴请苏籍华人曾秀夫的活动。这是曹轶欧为了增添自己的光彩，强拉杨献珍同志去陪客的。宴会后，曹又亲自陪同曾秀夫去见康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却被康生用作诬陷杨献珍同志的证据。在他看来，同苏联人接触，宴请苏联人吃饭，就是铁定无疑的“里通外国分子”。至于自己的老婆，则是负有“特殊使命”的钓鱼！其实，曾秀夫是康生的朋友和客人，杨献珍根本不认识此人。一定要说这是“里通外国”的罪证，那么，介绍人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夫妇！谁能料到，十几年前的一次宴会的陪客，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相反，那次宴会的主人却成了揭发者！无怪杨献珍同志气愤地说：“我要是特务的话，那么康生就是我加入特务的介绍人！”康生就是经常利用这种栽赃的手法陷害同志的。

五、“相面”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他说：“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象个特务”。由于康生的这种特殊感觉，就“一见定案”了，这样就把王逸伦

同志关押了六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得到平反。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康生接见河南各派群众代表时，又信口开河地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经过康生这一"相面"，文敏生同志也被关进监狱，遭受了种种折磨。

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也是被康生单凭"相面"而加以迫害的一个典型。为了具体说明康生究竟怎样发挥他的"相面"艺术的，我们不妨把康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对赵健民同志所作的一次谈话抄录如下：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一九三六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特务组织），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

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以上就是康生害人的部分表演。康生害人，或凭"可能"，或凭"推论"，或凭"想象"，或凭栽赃，或凭"相面"，如此等等，可就是不凭客观事实。长期以来，人们把康生当做防奸专家，他也常常以此自居。其实，他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集历史奸恶之大成。在这一点上，康生创造了历史上的最新纪录。当然，说康生随心所欲地害人，并不是说他不加区分地害一切人。事实上，他在害什么人的问题上，界限向来是一清二楚的。他所害人的标准是：谁妨碍他夺权，他害谁；谁了解他的底细，他害谁；谁反对他或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他害谁。

康生害人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的残酷性上。

前面提到，曾任康生秘书的沙韬同志在解放初期遭受康生迫害的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沙韬同志怎样了呢？结果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康生在中调部的一个"报告"上，得知沙韬在宁夏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情

况之后，立即批示："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是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并且(借)刘、杨包庇之力，他竟作了副部长"，接着下令将其逮捕，立案审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专案组王涛江根据一年多的调查，写了个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康却为此大动肝火，批示说："把鱼（指沙的爱人）的地主、叛徒、特务的家庭，说成是比较简单的，把沙的恶霸有血债的家庭说成是革命的，始终是好人，把一个叛徒、特务说成是并无罪行，亦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王涛江是站在那个阶级来说话？王的立场，完全替地主恶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辩护，并拿这些反动材料来包庇反革命沙韬，无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小集团一见王涛江的材料就大加赏识，作了包庇沙的黑批语"。王涛江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无非是根据调查材料讲了些老实话。然而，在康生看来，谁讲老实话，谁的立场就有问题，谁就是替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说话；相反，谁不顾事实，一味迎合康生的意思去说去做，谁就是立场坚定。所以，所谓立场是否坚定，完全是以康生的爱憎为标准。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康生又在曹轶欧写的关于沙韬问题处理意见请示报告上批示道："请冼恒汉、胡继宗同志负责彻底将沙的问题弄清，并责成专案组各方同志调查研究和具体处理沙韬专案问题，务必实事求是，搞深搞透。中调部同志及有关人员，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康生在这里还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务必实事求是"，"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其实，他所说的"实事求是"和"积极忠实"，无非是不顾一切的满足康生的诬陷而已。事实确是如此。沙韬同志正是在康生的这种诬陷下，才长期被关在

狱中备受折磨。其实，沙韬同志不过是在解放初期给康生当了一年多的秘书，结果使沙从那时起到康生死时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康咬住不放，非把他置于死地才罢休。

一九四五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让美军情报处的美柯中尉等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这项正常工作诬陷为有预谋的“特务活动”，就此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刘仁专案组”，按康生的意图炮制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头子刘仁在全国解放后继续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报告。康生见此报告立刻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的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从此之后，刘仁等在狱中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刘仁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一九六九年惨死在狱中。株连所及，仅原中共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中，被捕者九人，逼死者二人，致残者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这就十分清楚，为什么在康生、谢富治死后，“四人帮”那么隆重地追悼，那么高度地评价了。

对林枫同志的迫害也充分说明康生的本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对他的亲信说，“林枫的问题主要不在党校”，而“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极力唆使他们给林枫贴大字报、戴高帽、挂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又

指使"造反派"头头,"用群众的名义,给中央写个东西,要求他停职反省","有些事不要讲是康老讲的"。"造反派"头头立即写了个要林枫"停职反省"的报告。康生拿到这个报告,马上打着群众要求的幌子,亲自向中央提议撤掉林枫同志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对其立案审查。然后又派人抄了林的家,还把林弄到"批斗"陆定一、张闻天等同志的万人大会上"示众"。结果,林枫同志被当场打昏,肋骨打断三根,前胸、后背、左肘骨等多处受重伤。事后,康生又直接指挥中央党校"专案组"就林枫的所谓"反林总的问题","重点突击",连续"审讯",大搞栽赃陷害。不久,将林枫同志投入监狱,百般摧残,最后迫害致死。

康生不仅对老干部如此,就是对触犯了他的年轻人,也绝不放松他的毒手。这里我们根本用不着列举更多的事实,仅举一例就可见一斑。

一九六七年一月,康生认为中央党校拥有三百多名干部和工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对他的"态度有问题",于是通过他的同伙陈伯达、关锋将"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接着,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中六名青年逮捕关押,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批斗面竟然宽达百分之三十六,并围绕"对康老的态度问题",搞人人检查过关。康生还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他的打手们具体传授了搞逼供信的所谓"经验"。他说:

"首先计划一下,斗争几个。我设想,找二十七人或二十八人,三个人或两个人研究一个人,把工作分配一下,三人小组或两人小组专门汇集、调查研究这个人的材料。……例如拿

宋扬之说，我们知道他同廖沫沙有关系，可以通过北京市到廖沫沙、邓拓、姬鹏飞及其子女那里去调查材料。……研究这个人什么问题，什么性格，有的人先劝一下，有的人先压一下，这要看具体对象。”“这六人哪一个最容易攻？先攻哪一个？先选弱点。似乎苏承德做点说服劝说工作有点希望，因为苏振华已经成了黑帮”。

又说：“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个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每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方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

还说：“审讯方法……也要摸。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不拿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否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另外，有时候先拿出材料，先肯定有，拿出一两件，希望你继续交代。取得一个胜利后，可以乘胜直追。”再者，审讯工作还要同大中小会议结合起来，“大会是暴露，精神上给他压力，但不能认为仅仅大会解决

问题”。

康生这番话，如果放到一部小说里，比如放到《红岩》里，那么，你会清楚他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曾大肆诬陷人家“利用小说反党”，可是他的言行却在虐杀优秀的共产党员，残害革命青年，在大旗掩盖下，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这正是康生的行径。至于由康生亲自挑起的群众性武斗，致死致伤的事例，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康生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对革命者的迫害，是可以和戴笠、毛人凤比赛的，他是应当得到蒋介石重赏的。

第三十章

灭口和毁证

江青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她个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所有触犯过她的人，了解她某些阴私又不能为她“保密”的人，以及她认为妨碍她实现阴谋篡权的人，一律列为仇人，作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在她看来，把仇人消灭了，自己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致引起人们的疑义了，女皇宝座也就稳拿了。她把自己的这套做法，又传给了她的同伙，于是“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他们的“复仇运动”。这就是她一再宣扬“恩仇记”的实质。

江青这一着，是不是她的创造呢？不，她是从康生那里学来的。在这桩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康生确实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教唆犯。他以自己的行动，向他的效法者作了样板。他所采取的手段，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无非中外古今一切奸人所惯用的绝招，一曰灭口，二曰毁证，这正是见不得天日的阴谋勾当。似乎去掉了这些使他恐怖的对象，常年的心病即可化为乌有了！

在康生的复仇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胁”的叛徒、特务。现就几个由康生直接处理的在押犯，看看康生

究竟有哪些心病。

王云程，曾经是共产党员，并且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初，在党内担任过如下的职务：上海工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继而充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任过国民党北平特别党部调查室主任，中统上海区区长，经常活动于上海、南京一带。此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其自首宣言中写道：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了。王云程这里所说的赵容，就是康生当时的化名。

解放后，王云程为我逮捕，长期关押，未判死刑，是为了留作活材料。

卢福坦，原是共产党员，并为“六大”中央委员，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捕叛变，并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长期活动于南京、上海一带。他在被捕叛变后，也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被捕叛变”、“出卖同志”问题。此人在解放后，被我专政机关逮捕，长期关押，留为活材料。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康生掌握了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就处心积虑，一再催促将王云程、卢福坦立即杀掉。康生反复说：我说过多次了，这两个人罪大恶极，让你们打个报告，把他们赶快处决了，可你们就是不办。结果，在康生的指令下，将王、卢二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分别秘密

处死了。

康生干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撤出延安之后，他违背中央决定，把王实味等人秘密处决了。为此曾经遭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批评，只要他一得手，就故态复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无所顾忌，大干特干了。谁都知道，他是“大抓叛徒”的总指挥，从“六十一个叛徒”案件起，他便直接指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大抓“叛徒”，闹得“叛徒”满天飞，“特务”多如麻，真假不辨，是非不清。康生无论大会、小会，提起叛徒，就咬牙切齿，似乎比谁都更加仇视。现在看来，对他的这种行为，应当分析，不可一概听信为真，亦不可全部斥之为假，因为其中有真有假。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在许多同志头上加以陷害。他又把真正的叛徒、特务，如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父姚蓬子之流，包庇下来加以掩护。他还把触犯过他而又使他害怕的叛徒、特务加以灭口。当他煽动大抓叛徒的时候，其凶如虎，实际上却无法掩饰住他的胆战心惊，其状如鼠。

灭口只是消灭了活材料，还有当时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又怎么办呢？

康生对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通过什么渠道加以控制再进而毁掉“危害”自己的部分，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借“反二月逆流”之名篡夺了党政军的一切大权之后，很快于十月八日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

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指示》一下，康、江、谢（富治）积极行动，大肆叫嚷："争夺档案很重要，要派人清理公安部的档案"。康生特别强调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搞"，"要派大量的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按照康的"指示"，谢富治等很快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直到一九七〇年二月才结束，前后历时一年半。他们清档时，随意在档案材料上挖洞、贴糊、抽页，把档案搞得混乱不堪。

上海是康、江、张（春桥）的发迹之地。因此，他们对上海特别"关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所谓《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他们立即充实扩大早在五、六月份就已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清档领导班子，并从全市各条战线抽集了解放军、工宣队、复员军人、大专院校学生和青年教师等六千余人（其中外语人员三千四百余人），组成了二百零四个小组，查封接管了一百零三个单位的敌伪档案和报刊资料，清查了全市八百四十六个单位保管的一百八十七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六十多万份（件）解放前的报刊资料。到一九七〇年清档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多。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一百五十九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二万六千多卷（份），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四卷（册）；被抽页的，有五百三十六页；被抠挖的，有五百三十二处；被贴盖的，有三十九页。

康生等人利用"清档"，如此疯狂地破坏档案，显然是用以消灭同自己丑史有关的物证。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查小组在

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历史的档案至今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这里不妨将此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春桥××：

在市公安局档案处的清档工作中，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案卷中的情况如下：

011—16—134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35 页）

011—16—135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9 页）

011—16—136 卷中，有康生同志的情况（46 页）

现将原卷三件一并呈报。

市革委会敌伪档案清查小组

1968 年 3 月 15 日

这个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的材料，共九十页，至今下落不明，很可能是毁掉了。报告中说："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仅从"又发现"三个字就可断定，在此之前就曾发现过这类材料，至于发现过多少次，已无法判断。清查小组所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主要是指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类。其他的，有丑史进入上海敌伪档案者极少。另外，该报告是上海清档小组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写的。据材料证明，该小组工作一直进行到一九七〇年才"基本结束"。这就是说，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两年中，仍有可能清出涉及康生的材料。不过，这都是推论，不可作立论的根据。但是"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九十页材料，却无疑是有关康生丑史的材料，不然，为什么要毁档灭证呢！

其实，康生之流愚蠢得很。他们只销毁了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却留下了销毁这九十页材料的"报告"。销毁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只能增加人们对康生严重历史问题的怀疑。但是，历史事实是销毁不了的！相反，销毁"报告"却成了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毁掉了敌伪档案，毁不掉活的档案，毁掉了国内的档案，却无法毁掉国外的书刊。历史之无情，就是顽强地同伪造者作对！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康生来不及灭口或无法毁掉的材料。

吴滨沭，原是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八月被捕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解放后为我专政机关逮捕关押。他在康生横行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写的交代材料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何孟雄、罗石冰、龙大章、李求实等，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里说过，他们被捕，是党内叛徒出卖的，因为他们每人的简历，他们一批人何年何日入党，工作简历，甚至自己都没有记得那么清楚，敌人却知道得那么一清二楚。没有党内人告密，敌人是不会知道那么详细的。他们到龙华司令部后，每人只提审过一次，非常简单的问一问，核对核对。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叛徒告密的问题。吴滨沭在这个材料中，没有点名，究竟指谁，尚难断定。不过，能够掌握何孟雄等同志历史情况者，绝非一般人。康生自一九三〇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一月又被提为中央组织部长。可疑之处，当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有的书刊在谈到康生其人时，也曾谈到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国内的反映基本相同。

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记辞

典》中写道："康生一九三〇年曾在上海被捕，据说，由于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丁惟汾的干预，他迅即获释，当时丁的侄儿（或外甥）也在上海被捕"。

美国纽约法拉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了金品和丹尼斯·勃雷德华斯合著的《谁是继承人——毛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书。其中第六章《斗篷与匕首》中写道："张少卿，化名张耘、赵容、康生。在上海，他曾领导过三次暴动，虽然被捕过，但其后又被释放，继续在上海组织地下党的活动达四年之久。在他向国民党告密之后，由于他在这个不走运的机构中是一个骨干，所以这一机构立即被周恩来撤销。但是，他隐瞒了他的叛变行为而混迹秘密情报机构长达四十年之久。"

英国伦敦一九七四年出版了理查德·狄青著的《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一书，其中写道："康生一九三〇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他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某种保护。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成为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协调人，他为了保住他的职位而与国民党内部人士保持某种联系。"

这几份国外书刊，虽然没有提供事情的具体情节和过程，也没有说明材料的来源，但是都一致肯定康生在"三〇年"或"三十年代初"被捕叛变过。与上述所引材料对照，确有相同之处，至于这些材料来自哪里？姑且不谈，一般说来，上海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藏身之地，同时，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搞战略情报的中心基地。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租界内设立了情报机构

和巡捕房，他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行动，或是同国民党特务机构勾结起来，专门从事刺探中国共产党机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得知一些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从这方面说，他们的材料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们所载材料同国内许多人的怀疑和揭发如此惊人的一致，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增加了康生被捕叛变问题的可疑性。

康生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经常无缘无故地不由自主地表白自己"没有被捕叛变"过。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此事已把他弄到神智颠倒，精神紧张，情绪异常的失态程度。这里略举数例：

第一，有一次，在延安中央党校开会。当时没有任何人向康生提出历史问题，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就没有被捕过"。使在场的人个个感到莫明其妙。

第二，一九五〇年五月，康生准备由济南动身前去杭州养"病"的前一天，同样在没人问及他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他突然对他秘书说："我过去在上海，把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我前门进去，后门就逃走了，就出不了事。可是，有人不理解我这个情况，还怀疑我在上海过去那样白色恐怖下，别人都被捕了，我怎么没有被捕过。"

第三，一九五〇年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一起专程赶往杭州去探望康生的病情，康生趁机反复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第四，一九六八年，当康生看到台湾出版的《匪情研究》上

谈到"康生在沪一度被捕，旋即获释"之后，立即在旁边作了一个表白性的批注："胡扯造谣。我从来没有被捕过。如果被捕，早就杀头了。"

第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康生神智已经昏迷了，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问题哩！他躺在床上，在"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同时，仍然对人断断续续地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没有；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九二四年，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没有……"

康生如此神经过敏，如此反复地无缘无故地表白自己，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一句俗语：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

关于康生的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摆了上述材料，究竟应当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还有待人们去探索，立此存照，以供探索者参考。

第三十一章

保女皇是为了保自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仓皇出逃，结果折戟沉沙，焚尸于温都尔汗。从此，林彪集团也就彻底垮台了。

康生和林彪之间，本是文武结合，相互利用的关系。康生之所以看中林彪，是由于林彪手中握着枪杆子，权势所在，又是接班人，康生当然贴心投靠；林彪之所以看中康生，是由于康生笼络了一批笔杆子。既要篡党夺权，就要靠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捧一拉，两者就自然合伙了。可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急不可耐地抢班夺权，暴露了野心家的面貌，遭到了严厉地批判。康生一见大势不妙，于是和江青一起，匆匆忙忙改画脸谱，演起由合到分，由得宠到"受害"的换马丑剧。"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到处散布林彪早就把矛头指向了他们。演戏毕竟不是事实，假话只能蒙骗一时。

无庸置疑，林彪集团的彻底垮台确实给康生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是不是说，康生从此之后，洗手不干，不再继续篡党夺权了呢？当然不是。就象一个赌棍，并不因为输得精光而不再下赌注一样，康生又继续押宝，以作垂死挣扎。怎样挣扎呢？是自己亲自出马吗？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年老体衰，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投下最后的赌

注，倾全力死保江青这个“女皇”了。

康生与江青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共同挣扎的因素，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江青借口康生有病，不是打电话向康生表示问候，便是亲自登门拜访、看望。每次去，总少不了带点什么盆花呀，狮子狗呀，影集呀，炒菜呀之类的慰问品做掩护，实际是借机密谈，积极策划保江青出面“组阁”。一方要当“女皇”，找忠于自己的保驾，一方要尽“顾问”之责，寻新靠山。各有所求，但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新王朝”！

然而，“保江组阁”的策略，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因为康生、江青一伙，长期以来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关系甚密。林彪反党集团的许多篡权活动，他们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参与者和舆论制造者。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败露，已使康、江一伙处境困难的话，那末，林彪反党集团于九月十三日的彻底覆灭，就使康、江一伙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定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住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稳住阵脚，以求一逞。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才认为时机已到，开始施展其“保江组阁”的本领来。

康生究竟施展了哪些本领呢？

第一，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

忠奸本来是不能并容的。反周是康生的宿愿。“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就旁敲侧击地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对毛主席

思想的人”，是“同汪精卫合作”的人，是犯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职业病”的人，并纠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周恶浪。结果是损兵折将甚多，收效甚微。这一点确实证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并没有屈服于淫威之下。这就不能不使他暗自咬牙盘算：周恩来虽是他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但是，反周不易收效，目的难以达到，闹不好有使自己垮台的危险，林彪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康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暗算，不敢公开表露。

自“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尽力排除干扰，力挽危局，采取一切措施，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思想上，狠抓批林整风运动，大力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组织上，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解放和使用了一些老干部；在教育上，提出排除障碍，拔除钉子，坚决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主张，并恢复了教学和招生中文化考核制度；在经济上，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形势有所好转。对于这一切，康生和“四人帮”统统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们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等于束手待毙，彻底完蛋。因此，当他们于一九七三年八月站稳脚跟之后，就立即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他们“组阁”的障碍！

第二，“影射史学”出笼，帮凶得心应手。

怎样“反周篡权”呢？明反吧，不敢；不反吧，不甘！怎么

办，还是康生鬼点子多。一说害人，真是满腹经纶，于是，“影射史学”应运而出，假托“批孔”，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

“批孔”，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可是江青、康生立刻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借题目，做文章。他们既不批林，因为批林会批到自己头上；又不批孔，因为批孔会把人引向故纸堆。因此，他们密谋的绝招是：借“批孔”之名，行“批周”之实的策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迅速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稿子①作些增补。×迅即照办。康生看到×的增补稿极表赞赏，立即批送江青，从而为江青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大搞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作了准备。正因如此，江青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她擅自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康生大加赞扬，说“康老立了一功”。什么功？显然是指康生倡“影射史学”之先，为她提供了炮弹。

既受“女皇”赞扬，康生认为此举得中。动员大会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对×××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安慰和鼓励，他说：“动员大会×××去了没有？身体怎样？请转告×××，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孔子杀少正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接着又布置新的任务说：“现在再叫×××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内容和写法是：（1）关于柳下跖其人，儒家反对他；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他怎么样？（2）对《庄子·

① 此稿是康生于1969年9月以“注释”《毛选》五卷为由，指示×××写的。

盗跖篇》做个简要的说明，并译为白话”。×××受宠若惊，自然心领神会，对康生交办的新任务，当即表示“乐于接受”。康生向×布置新任务的第五天，即二月三日，又指示其秘书向江青写了报功信，说：“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要我告党校，请×××教授加以注释，并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搞成后印发中央同志参阅”。

二月二十二日，康生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康生的御用写作班子）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报送江青审阅，《痛骂》一文批送姚文元掌握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痛骂》一文，既然是“痛骂”，那就蛮横、撒野，不讲任何道理，搬出了“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态度，把《庄子·盗跖篇》的寓言变成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世竟能当面痛骂孔丘的“反孔英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如果说康生的指桑骂槐，以古喻今的策略，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中还是隐晦的话，那么，在《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中则是赤裸裸的了。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成为江青、康生一伙的得心应手的攻打武器。他们自诩为“柳下跖”，把他们攻击的对象辱骂为“孔老二”，无非告诉人们，他们是祖传的“造反派”，而别人却是承袭的“保守派”。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写的一封信中就曾写道：“你们要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江青此话，既说明了“影射史学”的用心，也证实了康生指使人搞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

“样板”作用。

康生报送江青审阅的《庄子·盗跖篇》译文怎样了呢？江青嫌译文“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上考虑不够”，立即送交其御用写作班子——梁效修改。三月二十六日，梁效将译文修改完毕退江青。三月二十七日，江青又将修改稿批转康生。康生见到修改稿，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养病，立即得意地作批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接着，他又指令中央党校的“唐晓文”，立即编写《鲁迅批孔言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料，继续为江青效忠。这几个材料搞出后，康生特别指使其秘书给“唐晓文”打电话：“康老说他身体不好，材料寄江青同志，要写上是尊领导嘱咐送的”。他们就是如此紧锣密鼓，进行这场肮脏的罪恶勾当的。

第三，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

“唐晓文”，是根据康生指令于“文化大革命”之初成立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成为康生的一个“传声筒”。康生经常不断地向其交任务，指方向，自不待说，就是挂牌子、闯门面，也由康生具体指导。而“唐晓文”也“紧跟康生每一阶段的指示”，忠实体现康生的意图。康生要“批孔”，唐晓文便连篇抛出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因而，博得了康生的喝彩，赢得了江青的赞赏，成了一枝同梁效、罗思鼎齐名的笔杆子！

当然，唐晓文是按康生的指挥棒去迎合江青胃口的。江说要锋利，唐晓文就句句带刺；江说要有“现实感”，唐晓文就赶快给柳下跖穿上红卫兵的衣服。对于江青的赞扬，不仅要明吹，而且还要暗颂；对于江青的效忠，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一·二五大会”之后，唐晓文就曾连夜赶写《简报》，大吹江青是“抓大事的光辉典范”，发誓要“跑步前进”，表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以后，又连续给江青写信，以示忠心，说什么：“随着直接受您教导次数的增多，愈来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今后一定根据您的指示”，“在您的指导和关怀下”，“为运动的深入、普及、持久，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这些都是期待“女皇”登基之后，评功加封的凭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初，康生的病势日趋严重，他便把自己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干脆交给江青直接指挥。江青大喜，当即带该班子去天津进行示威活动。沿途，江青一再宣扬，梁效和唐晓文是“我的两个班子”。唐晓文受到江青的宠爱，就象侍臣一样，更加效忠于江青。在江青天津之行的整个过程中，同梁效一起，接连炮制《简报》，待将来一旦要出《“女皇”大事记》时，《简报》岂不是轰动世界的内幕巨著！至于“唐晓文”的顾问×××，对于江青则是更加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在谈到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的感想时，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也不能忘记这一点”。由天津回到北京之后，“唐晓文”的头头立即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说要汇报天

津之行的“盛况”。康生的秘书回话说：“我们都知道了，已经看到了《简报》，很好嘛！”“女皇”出巡，除了鸣锣开道者之外，又随从一大批“文人学士”，所谓《简报》，就是出自这些“侍臣”之手，其内容不过是招摇过市之时的具体行踪。比如到了小靳庄，接见了什么人，替谁改了名字，送谁一顶草帽，给谁一个发卡，有什么批示，发了什么指令之类的东西！这批“侍臣”写成报道，随感，欢呼场面，群众怎么激动，自己怎么幸福。这些报道者自认为不是光宗耀祖，也是三生有幸！把这类《简报》作为“首长通报”专发上层。这都是“新天朝”的史籍！康生对江青天津兴师动众的势头极为关注，对其精心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及其顾问×××的“争光”甚为满意。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虽然重病在身，对于“保江组阁”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在晚年，确实想在江氏王朝里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贩毒立功。“理论权威”康生总想以贩卖理论来唬人，总要以理论换得“新天朝”的席位，也总以理论为自己的墓志铭增添让后人拜谒的条文！康生操纵的写作班子，按照江青的心意连篇累牍地炮制吹捧女皇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了名的妇女，不管是祸国殃民的女妖，还是确有建树的女杰，只要为心狠手毒的江青所欣赏，这些写作班子便篡改捏造，塑造成“创造历史”的伟大形象，武则天固然要大书特书，什么吕后，甚至连慈禧太后也要列到让人崇拜的江氏石坊上。他们一方面捧颂，另一方面还在攻击，叫嚷什么要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人们自然清楚，这是为谁鸣锣开道。

二、秘密组织班底。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指示"上海市委尽快物色一批准备充当中央各部部长的青年干部。四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派到中央各部的备选名单。到了十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央委员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上海之外，在辽宁也作了组织准备。作为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大权的康生，当然对这一重大人事安排，不会漠然置之。

三、在政治局内发难。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轮。它战胜艰险，远航欧洲，胜利归来，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江青一伙却利用此事，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反对造风庆轮，其矛头所向直指党中央委托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十月十六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直接向邓小平同志发难。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邓小平同志："对风庆轮这场斗争，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调查"。"四人帮"就一拥而上，滥施攻击，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

四、向毛泽东同志告状。十月十六日的会议，没有达到"四人帮"预谋的目的，于是，他们连夜开会进行紧急策划，决定派王洪文于十七日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告状。王洪文到了长沙对毛泽东同志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搞串联。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

志”。同时，又大肆吹捧江青、张春桥等人。明显透露了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的企图。

但是，“四人帮”没有料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支持他们，反而批评了他们，明确支持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接着，又针对江青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提议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总理还是总理，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此为止，康生导演的“保江组阁”的丑剧，只好改换题目另做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将其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召到家中作了一次交底谈话。他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又说：“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我不甘心死呀！”很明显，康生在这个谈话中所说“党内斗争复杂”，是指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计划受到了挫折；所说“我们党危险了”，是指“四人帮”一伙处在了危险之中；所说“我不甘心死”，是指保江登台之愿没有实现，把“造反派”召到身边，嘱托他们继承康之遗志，保其舆论基地，以防翻案！

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日趋不利。邓小平同志受托主

持中央工作之后，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同时，还严厉批判了派性，提出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却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因为它在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局面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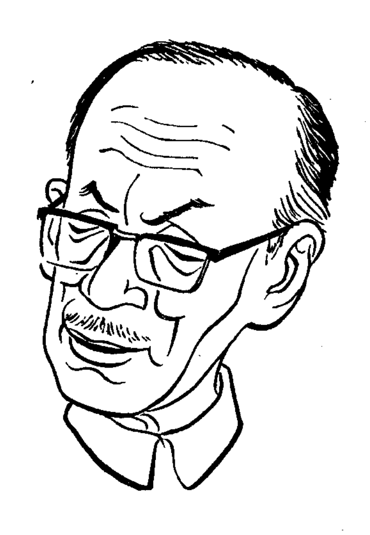
应当指出，“四人帮”所做的许多误国害民的恶作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因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一九七五年初，针对江青对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辱骂批评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批评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要他们“不要随便批文件，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照样搞呀?”并提出今后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康生非常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死保江青登上他们预备的宝座，那是虚幻的梦想。只有把自己积累的投机之术，再次使弄一番。为了把保险系数打得更大一些，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听了之后，使常人按我们党内的习惯，的确无法理解，也难以置信，可是这又是事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康

生之用心。事情是这样的，康生要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他一不向组织揭发，二不向中央提出。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又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却于五月下旬，把外交部的两位女青年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谁都知道，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为其隐瞒和辩护。这一点在延安整风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象江青这样的真正的叛徒，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保江过关。当时，与会同志对江的历史提出许多疑点，要她回答。可是康生不等江青回答，就大包大揽起来，不是说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说那个问题组织上清楚。这样，江青的历史问题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现在，康生要亲自出马，"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同他过去长期持包庇态度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谁都看得明白，他临死还立下这样一"功"，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以保持自己的所谓"晚节"而已！

康生的"揭发"，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当形势对他不利，特别是危及到他的头上时，他就来个特别的"揭发"；当形势发生波折，在他看来对"四人帮"有利时，他又对自己的"揭发"来个修正，另补上一个新的"揭发"。世上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赌棍！一般赌棍押宝时，不是押红就是押黑，总不能既押红又押黑。可是康生却是双押宝，他押在最

保险的方位上，不管怎样，他都是胜利者。就是死后，也要留下替他辩护的嘴！



（一九七三年八月）
康生在一个大会上

时间推移到了九、十月份，也就是到了康生离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他趁邓小平同志离京之际，突然鼓起勇气，带病到毛泽东同志处进谗言，说邓小平同志“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等等。康生的谗言当然起了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谗言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就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也由守势马上转入攻势；全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此时，康生大半感到满足了，可以甘心了！于是病死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结 束 语

康生死后，“四人帮”为失去他们的“教师爷”进行过欺骗宣传。他们把煽动家的辞藻和阴谋家的谎话当做康生的业绩，因而愚弄过不少的人。不过，康生自己的言行录，却一再戳穿了别人为他裱糊的装璜，以至完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类的金冠，理所当然地从他的头上滚落下来。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康生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在康生七十七年的一生中，特别是他在共产党内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知有多少血迹斑斑的脚印，多少共产党人的冤案，才构成了他那凝结着奸诈狠毒的罪恶史。

纵观康生的政治活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历史年代：从我们党的“七大”到“八大”，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年。这期间，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既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和破坏，在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他离开了中央的重要工作岗位，他只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起作用，因而，其危害范围大大缩小了，特别在建国以后，他活动的范围只是疗养所或医院，权力所及，

只能限制在这个小天地里。这就为我们党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排除了一个不小的障碍。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那就完全相反，当康生得势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受难，人民倒楣的时候，象一九五八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窃据了中央的重要岗位，而且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党灾难丛生，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康生的手伸到哪里，那里便是非颠倒，劫祸连起。

只要略加回顾，便可找出康生同我们党的兴衰的关系，便可了解，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成了我们党的一个特别的祸害。正因为我们党认识了康生的真实面貌，虽然他已死掉，但还是坚决把他清除出党，撤销了对他的悼词，还了他反革命野心家的本色。

康生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揭露，因为他有几张画皮，使人迷惑不解并借以吓人。

第一，中央领导人。康生发议论，作指示，都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势。因为在他口里，似乎句句都有来源，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中央的意见，给人们的印象，他就是中央的发言人。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种使人摸不清的身份，增加了许多揣测，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楚。所谓小道消息满天飞，其重要来源，出自康生。你说小道，过不了几天，却变成了大道！

第二，老资格。人们称他为"康老"，他也自以为很老，但他不是从年龄上著称的。他卖弄的是老资格，一谈起来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党内发生的事件，历史人物，摆些细节，谈

些故事，似乎他都亲身经历过，听者只好目瞪口呆。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康生一谈共产国际，就同自己的光荣史联在一起，眉飞色舞，从莫斯科到巴黎，从苏联、东欧，到法国、意大利，从党到党的领导人，他都议论一番，评价一番，有的大骂一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都谈论一通，谈今说旧，由外国人引到中国人，又由中国人扯到外国人，应他批判之需要，适他政治之要求。他又经常会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士，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要把他那套讲出去。似乎别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他唱独角戏了！

第四，理论权威。康生有过这样几个头衔：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他的这些职务，以及他部署的工作，抓的问题，给人们总的印象，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这样自居，也这样向人标榜。无论理论上的什么重要问题，他说了算，以他的话为准。特别是他说批谁就批谁，他说怎么批就怎么批，上什么纲，定什么性，都取决于他的“指示”！

第五，情报专家。从三十年代起，康生在我们党内就做情报工作，象社会部、情报部以及一些审干肃奸的机构，他都参与过和领导过。在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假叛徒、假特务。似乎在我们党内，所有老干部的历史他都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他都通过秘密的情报加以掌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他一插手，总要把一大批好同志，弄成“叛徒、特务”，他象患有顽固的职业病，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他“肃反”的眼睛一看，就变成他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那套

逼供信的手段。对我们党的很多干部来说，一提到康生，便产生一种无法安定的恐怖感。

他的这五张画皮披在身上，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对广大干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也被他欺骗。长期以来，对他的问题得不到系统的清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康生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罪恶，向全党展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凶恶的敌人。从康生的历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忘记“左”的危害，会亡党亡头。

康生是从“左”倾错误中发迹的。从三十年代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由“左”倾思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或大或小的危害，几乎都跟康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他是利用“左”的错误，干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处心积虑地糟蹋党和人民的战士和功臣。他是以“革命”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他是以折断党的脊梁为其主攻方向的。

不好说康生的“左”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承袭者。他把地主阶级的上谄下陷，倾轧欺诈的处世哲学，搬进了共产党内，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口里念着极左的词句，手里拿着的剑却直接刺向党的要害。

我们党多次受到“左”的袭击。“左”给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是，肃清它的影响，防止它的复发，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内的成员、党的历史以

及党的社会环境，对于“左”的滋生和发展易于助长，却不易于防止。所以，康生及其一伙常常利用这种条件。他们深知，只要点火，只要吹风，就会吹遍全国，就会搞得难于收拾。

“左”的影响和流毒，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远远没有肃清。“左”并不是宣布它的错误，就会得到制止，人们也就相应地警觉起来纠正它。它有深厚的土壤和传统的条件。康生之所以长期得心应手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就是利用了“左”倾顽固症才实现其野心的。

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左”给我们党和人民的危害，并不是也不应当是放任右的东西占领我们的阵地。当我们反“左”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有所抬头，企图把没有免疫力的人引向脱离党和社会主义的轨道，这当然会遭到强烈地反对的。

第二，要肃清“家长制”的残余和影响。

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后来又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土地上，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我国人民觉醒的界碑。我们党在为自己壮丽的事业奋斗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诗，整个旧社会被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打得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了。可是，旧社会的污毒并不能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更不能把它装入棺材埋在地下，封建制的残余，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盘旋。这种残余也浸入了共产党，家长制就是突出的反映。

康生就是利用了党内的家长制行奸作恶的。家长制、一言堂，当然不是我们党所应该有的。但是当着人们缺乏对封建主义侵袭的警觉、听不得不同意见、社会上又没有民主传统

的时候，它也就滋长蔓延起来。康生专门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以骗取信任，由报喜不报忧，到歪曲事实搞浮夸，以至打击陷害同志，爬上更高的职位，窃取更大的权力。这不能不说是家长制作风所带来的危害。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防止家长制作风的发生，就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万万不能放弃的政治生活的根本制度。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的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倾听多数同志的意见，才能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则，也才能防止一言堂、个人专断的发生；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使领导不受蒙蔽，才能防止大权旁落，也才能避免对投机钻营分子的无原则地使用和提拔。

第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和每个共产党员前进的重要的力量源泉。共产党要健康地发展，共产党员要锻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必须牢牢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这一条，党便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党，党员也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崇拜自发性。就是无产阶级，也不会自发地成为先锋队的组织，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锻炼。有了先进思想的灌输、启发，通过自身的觉醒，才能起到先锋队的作用。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天生的自来红，只有不断地改造，不断地提高，才能成为符合条件的共产党人。所谓“一贯正确”者，就是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种说法。康生从来

没有认真地作过自我批评，似乎他从来就是正确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不能作自我批评的人，就不会掌握党所要求的批评。康生就是把批评当成棍子，专门整人的。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康生这种人，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同志之间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多少年来，康生之流搞乱了党的作风，把本来是教育人帮助人的武器，却变成了他迫害人的大棒。

第五，政治运动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倒易于遗留下严重后果。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促进了群众的觉悟，对我们取得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就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时所采取的方式，应当有所不同，再沿用我们那时熟悉的一套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和同志之间的问题，就容易把搞阶级斗争的方式照搬过来，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社会秩序建设和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工作，恰恰是不相适应的。其实，毛泽东同志于建国前夕，就一再向全党提出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了。康生恰恰利用我们遇到的困难，而把他所熟悉的那套以欺骗夸张为手段，以整人为目的"政治运动"，大轰大嗡，从而搞乱是非，颠倒敌我，制造冤假错案的。因此，每次运动，总伤害一批好同志，也总应运而生一批投机者，留给党一批遗留问题，往往"一年运动，十年未了"，使不少同志浪费了青春年华，党和国家遭受很大损失。结果，常常使

原来的设想落空。政治运动不但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相反，却增加群众思想的混乱，使我们前进的阻挠更多了。经济建设是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有节奏地前进，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扎扎实实地认真地工作。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其恶劣作用都超过无济于事的废话，同共产主义事业是背道而驰的。

第六，维护党风、党纪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纪是铁的纪律。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维护和遵循的，不允许任何党员破坏。可是康生不是这样，他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党风、党纪对他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当他破坏党风、党纪的时候，都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总是拉大旗作虎皮，从而借着这种破坏行为为自己的升迁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只要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欣赏，就可达到目的。

一个执政的党，始终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使自己的党员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不管职位多高，都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摆架子，不高人一等，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同剥削阶级的官僚鲜明地对立起来，把维护党风、党纪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见了康生之流的恶劣行径，愤而制止，坚决斗争，不容其蔓延和滋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会作为法宝传之后代。

第七，必须十分警惕投机钻营者和权欲熏心的人进入我们党的领导岗位。

林彪、康生、“四人帮”已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令人

憎恶的样板。他们的出现，说明我们党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康生的发迹史，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康生每次投机，都把自己暴露得非常清楚，也确实有不少同志知道他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他都能一关关地混过来，无非是从他的地主家庭和旧上海滩上学来的那套投机钻营之术。本来这些东西在党内是没有市场的，不过投领导所好，便为其开了绿灯！“文化大革命”以他的实际行动，训练了一批他的后继者，可以说撒下了祸害种子！凡是投机钻营者，都有自己的野心，攫取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位和权相连，权和利又相连，那种权欲熏心的人，一定官迷心窍。一旦权在手，就为所欲为，象康生那样，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野心家、阴谋家，是害怕群众的，是害怕事实的。只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完全可以防止这些家伙得逞的。

第八，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顶住了一切压力，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领导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国以后的头七年，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党的“八大”，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可是，由于我们党没有沿着“八大”的方针，而后又被康生这些人所蒙骗，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大大落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长期没有扭转的方针，把

全党的注意力扭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使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有了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全党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康生所批判的所谓“唯生产力论”，是他蓄意编造的，是康生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据。一个执政的党，不抓生产，不抓经济建设，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第九，要牢记个人崇拜的教训。

个人崇拜的结果，使我们党吃了大亏，而被几个野心家象林彪、康生之类所利用，搞成了造神运动，以至成为亿万人民思想的禁锢。这个教训，我们不应忘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杰出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必须肯定，不管什么伟大的人物，当他代表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他就起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他和人民的意志以及历史发展趋向相反的时候，他也就对历史发展起阻挠的作用。个人崇拜把人民引向历史唯心主义，使人们不能摆脱旧的思想牢笼，永远成不了历史的主人。

第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是我们党的严重任务。

康生为什么长期以来成了什么“理论权威”呢？他除了几张吓人的画皮以外，的确是欺负落后。他谈起理论来，往往引经据典。只要按照他指点的线索，认真一查，就会发现，不是

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同他讲的相反。他所批判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结果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他所用的手法，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超越阶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判，来显示他的权威。他的这种思想和手段，是非常卑劣的。他是按照他的帮派思想，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帮分派，当成了旧上海滩上的青红帮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污辱！也是对我们党的污辱！康生对马列主义极尽糟蹋之能事。现在看来，我们党的一项严重任务，就是把康生歪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这些原理。

康生虽然死了几年了，可是他所散播的毒害，并没跟着消失。因此，肃清康生的流毒和影响，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有待于更多同志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

康 生 年 表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青岛市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的一个大地主之家。

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葆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葆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后被其把兄弟陈舜庭从家中保出,一起到青岛进德国同善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读书。其间,结识过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如宣统的老师陆润庠和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七岁

同胶县陈家庄(现归胶南县管辖)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后生一女一子。女儿张玉瑛,现为青岛烟厂的退休工人。儿子张玉珉,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共同生活,相依为命。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并规定一九一六年

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十九岁

夏，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

秋，家遭土匪抢劫，随其父母搬到诸城城里避难。不久，改名张裕先，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此时，同家住诸城东关的李云鹤(即江青)相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二十岁

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结业，改名为张叔平，到诸城城里联立小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二十一岁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在诸城当小学教员的康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二十六岁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康生离家去上海。不久，改名为张耘或张沄，进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二十七岁

年初，同刚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曹轶欧相识。不久，两人一起加入共产党。

二月，参加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五月三十日，根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上海会议决定，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大罢工，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作。

六月，同孟超、李宇超等一起回诸城探家。探家期间，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组织过"五卅运动后援会"。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二十九岁

一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上海总同盟大罢工。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罢工转入暴动。康生也就随着参加了暴动（即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十五日左右，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商务印书馆职工集体宿舍秘密召集的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材料说是江浙区党代会），听取了书记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

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

三月十八日左右，连续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召集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会。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作为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具体任务是，带领沪东区的工人武装，“同闸北区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打五区总警署，得到武装后，进击北车站。”

三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湖州会馆召集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武装，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

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在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上，康生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委员兼闸北区区委书记。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公开反共叛变革命，革命的武汉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率领受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秋，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

年底，同曹轶欧结婚。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三十岁

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

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

秋冬，化名赵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三十一岁

×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长。

年底，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江苏省委的改组。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　　三十二岁

二月，由于在改组中共江苏省委上得到了领导上的赏识，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六月至九月，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康生也就成为立三“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党为结束立三“左”倾错误的统治，在庐山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十月至十二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调和主义”的旗号，以一种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为此，王明到处拉帮结伙，搞非组织活动。这样，康生又同王明挂上了钩。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三十三岁

一月十三日，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实际批准了标志着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取消了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重新改变了政治局成员，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月下旬，伙同王明等打击、排除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随后，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二十余人被捕，牺牲在上海龙华。

六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

十月，兼任中共中央某机关第四科科长。

十二月上旬，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附刊二十六期上发表《学生罢课后干什么》一文，提出学生罢课后要“到工厂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十二月十七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七期上发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文中抱怨“党与工会没有去积极领导反帝的罢工”，说“只有扩大工人的罢工运动，才能使反帝运动走上更高阶段”，主张“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的方式”，“要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广泛的组织工人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要领导这些队伍……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文章最后指令：“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与一切“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的残余，空喊罢工”，作严厉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三十四岁

一月十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八期上发表

《怎样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和《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两文。前文说："将反帝运动深入到黄色工会的群众中，独立地组织反帝的罢工，是目前反对黄色工会最中心的任务。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便是放弃了对黄色工会的进攻"。后文讲："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采用"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上怠工，破坏群众斗争"的"新策略"，以实现他们"反国际反党的阴谋"。为此，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要"号召广大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奸细——右派！从组织中将右派肃清出去！为国际路线而斗争！把握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一月二十一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指令省委深刻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

一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九期上发表《取消派的"工人运动"》一文。文中说：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的提法，是"最不愿意听的"；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对于工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是"最为担

心的”。文中极力主张“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

一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二期上发表《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是否能够罢工?》一文，借口说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工人斗争有许多困难，拒绝在目前发展进攻，或者只同意搞总罢工而不同意搞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罢工，仍是机会主义者。

三月五日，以谢康笔名在《职运指南》上发表《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一文，说上海事件后，所有日本工厂和战区里的工厂统统关闭，从而造成几十万工人失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失业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职工运动的“最中心的工作”。并主张要努力将这一斗争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从而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

三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三期上发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一文，说上海事变后，职工运动中出现了对武装工人消极、放弃组织在业工人罢工、取消青工女工工作，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等许多“不可饶恕的”、“一刻也不能允许”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此，“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并强调说：“工人武装起来，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领导与群众斗争的估计》一文，猛烈抨击被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予以撤职的全总领

导，说："党与赤色工会对于全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予以无情的打击和坚决的斗争"。

四月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五期上发表《坚持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说当时存在着一种"等待与资本家坐在一起谈判复工"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种"空喊罢工"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要无情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坚决的领导沪西广大的群众坚持罢工"。还说："罢工运动的发展与坚持，不仅推动上海罢工浪潮更激烈的发展，推动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更大的高潮，而且是给苏维埃红军直接的帮助"。

四月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六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职工运动总结》一文，批评刘少奇同志以中央职工部名义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总结报告》，说这是对"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总结"，"完全暴露了仲篪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服，对于工人高涨斗争的诬蔑，降低了党与赤色工会的任务"，说明他一直坚持"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绝对相反的路线"。叫嚷对此路线，"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一刻也不能允许存在"。

五月二十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四十一期上发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说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揭露了总工会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其机会主义领导之后，上海工会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变的开始，然而江苏省党委、团委却以消极怠工、旁

观，实际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因此，“党与团必须深刻的，一点不掩盖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的发动反对放弃职工运动，放弃罢工的倾向的无情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深入到区委，特别是工厂支部。”

五月三十日，在《红旗周报》四十二期上发表《厂内工作问题》一文，说赤色工会没有坚定地去进行“厂内工作”，没有“有组织有准备的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的罢工”，因而它还不能称为“群众性组织”。只有“加紧厂内工作”，才能克服革命职工运动中同群众联系不够和干部缺乏这“两大困难”。

七月五日，在《斗争》十七期上发表《谢康关于“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对江苏省委来信的答复。来信批评谢康：一，将党省委和团省委混为一谈，没有指出江苏省委在工会工作中已开始有了相当的转变，而只说“省委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二，将职工运动中的转变，只是“看作上海工联的成绩，将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对立起来”，“这是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思想”。谢康在此声明中，只承认上述第一点错误，否认第二点错误。

八月五日，在《斗争》杂志二十一期上发表《怎样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一文。文中提出三种办法：一，以工厂为基础改造职工运动，艰苦地进行厂内工作，巩固和创造工厂支部和赤色小组；二，拥护工人的日常的，那怕是很小的要求，坚定的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三，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和工会领

导机关，建立对于工厂支部、赤色小组日常具体的领导方式，将一切决议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三十五岁

春，临时中央因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在上海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迁走后，上海成立上海局，康生留在上海局工作。

七月初，撰写《向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开火，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而斗争》一文(发表在九月七日出版的《斗争》五十四期上)，说江苏省团委在阶级决战的严重时刻，空喊示威、罢工、罢课，而没有实际行动和部署，说这实际上是在“左”的旗号下，掩护或代替实际斗争，“偷运李立三的私货”。

七月中旬，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从此改名为康生。到苏之初，他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在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等院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

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论国民党的中国境内中共之增长问题》一文。

十二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作了题为《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继续宣传“‘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国民党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叫嚷“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就是“参加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和罢

工，坚决的把赤色工会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以便使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成功。"此报告，同王明的报告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书，于一九三四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目前六次围剿的形势与红军的胜利》一文。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三十六岁

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集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趁党中央随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机，伙同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接管了东北的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三十七岁

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康生得知此会情况之后，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苏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而且加紧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

上半年，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月，向东北党下达"王、康指示"，散布悲观情绪，借口

“保存实力”，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使东北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破坏。

十一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三十八岁

年初，乘苏联发动“镇反肃托”运动之机，伙同王明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自任负责人，照苏联的样子，在我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搞所谓“镇反肃托”运动。康生借机诬陷、逮捕、流放、谋杀了不少中共党员。

三月×日，当着王明的面，向即将离苏返华的吉合同志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

六月二十日，借悼念瞿秋白同志遇害一周年之机，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词，公开宣扬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

七月一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酒会。会上，康生竟然举杯“敬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十月，由苏去巴黎做支援西班牙战争的工作。

年底，由巴黎派人回上海传达他的四项指示：一，今后要联蒋抗日不反蒋；二，要联合黄色工会不反黄；三，要尽量采取合法斗争；四，要取消赤色工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三十九岁

一月八日，同王明联名为《救国时报》题词，说："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一文。

十一月下旬，同王明一起，经新疆回到延安。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遂与江青在中央党校重逢。（注：江青是一九三七年八月隐瞒历史，混入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的。）

十二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坚决反对同陈合作。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此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大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四十岁

一月，在《解放》杂志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发表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公开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

同月，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前，康向与会者大声介绍说："这是王明同志，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

起人。”

五月，江青扮演京剧《打鱼杀家》中的肖桂英，康生亲自出面为其打小鼓。

八月左右，改任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此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四十一岁

三至八月，滥用职权，先后制造了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四十二岁

二月，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十七周年和庆祝《中国工人》出版而作《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一文。

二月五日，出席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七月五日，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克服困难，争取抗

战最后胜利》一文。

七月七日，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一文。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论政策》。其中有“陈独秀、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提法。多数同志主张把“路线”两字勾掉，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勾掉。然而康生却专门找到毛泽东同志说：“不写上路线两字是个原则问题”。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四十三岁

五月，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七、八月，党中央连续开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

九月，出席高干整风会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康生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毫无检查。

年底，经高岗允许，在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讲演，讲什么他在莫斯科时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的。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四十四岁

一月底，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

二月一日，出席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二月八日，出席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作“整顿文风”的报告(即《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二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三月七日下午，在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干部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文风的报告，并部署贯彻办法：一，“研究”；二，“讨论”；三，“检查”；四，“实现”。

四月十八日，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要大家深刻研究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掌握武器，然后，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复信给陈佩明同志，谈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举行。康生出席了二日、十六日、二十三日的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月十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伏拉第米洛夫。

五月十二日，拜访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情况。晚上，又陪同毛泽东同志约见伏。

五月二十三日，会见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情况。

六月初，为了加强早在四月二十日就已开始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下设中直、军

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委、边区五个分学委。康生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学委主任。这样，康生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领导者。

八月五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的报告，总结前段整风学习的成绩和缺点，指出“今后的学习，是依靠整风学习的基础，进入党风与文风学习的时期”，强调在这一时期的学习中“要部分的检查工作”。

八月三十日，给《笔谈会》编辑部写信，谈“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四十五岁

×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和军委联络部共同组成“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二月五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出席伏拉第米洛夫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而举行的酒会。

三月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同时决定成立在政治局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新的书记处。康生的书记处书记之职，也就随之被解除。

四月十日，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报告，说“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号召这些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在此前后，直接指挥一些单位搞“抢救”试点。

六月左右，指挥大逮捕。

七月十五日，正当国民党军队紧逼陕甘宁边区南线之际，康生在延安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紧急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他说：“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就是“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又说：“自四月十日号召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以来，“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希望还没有坦白交代的失足者，认清形势”，“快快觉悟”。还说：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有效地抢救失足者，以便“将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七月十五日后，各单位根据康生讲话精神，纷纷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反复劝说“失足者”坦白交待。会上讲的是“劝说”，实际搞的是“车轮战”、“隔离审查”、“逼供信”、“悬赏坦白”，“逮捕关押”，“假枪毙”等等。据人揭发，当时他一下就圈了一个二百多人拟捕名单。有人说：“抓得太多了”。他却说：“先抓起来再说！”由于康生的这些错误做法，死了不少人，出了不少假特务、假叛徒。从而为延安“整风审干”运动造成了严重创伤，也给甄别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四十六岁

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一年零两个月的反奸斗争，清出了许多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成绩”，而当前的“具体任务是：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贯彻九条方针，开展甄别工作”。

六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他说：列宁这本书的

“最中心问题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作斗争的问题”。又说：“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左倾幼稚病为小资产阶级的病根”。还说：读此书“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觉悟程度；（2）有一定的理论水平；（3）有一定的斗争经验；（4）有一定的历史知识；（5）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七月，康生因在整风审干中胡作非为，在全党引起义愤。

八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说康完全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歪曲了中央精神，对党的干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做得太过分了。又说：本来整风审干的一切计划都是清清楚楚的，公公正正的，可是，现在应该承认，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

九月，周恩来同志听了关于审干工作汇报后，当即批评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党说成是红旗党？情况我都是清楚的嘛！”提出“要坚决甄别。”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四十七岁

年初，毛泽东同志到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亲自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对那些冤、错、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并对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继续推行他那一套错误做法。当这位同志回来汇报说，去后不久，得到中央精神，于是按中央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康生听了汇报，竟说：“谁叫你那样搞的？”

三月，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

四月二十日，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康生为七大准备的关于《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草稿时，引起义愤。毛泽东同志不得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个个的找人谈话。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撤除康生为七大准备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于六月二日作了大会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和情报部的业务工作，而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因此，代表们纷纷写条，要求他对审干中的错误作出说明。然而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结果，引起公愤。会议结束时，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代表们还是从全局出发，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夏秋，鉴于康生在审干中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免去其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四十八岁

五月四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工作的报告。他说，现在由于抗日的胜利，开始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而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建筑在国际国内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的力量相持的对比之上的暂时休战，是"将来决战的准备时期"。因此，他提出，复员、生产、防奸、保卫等工作都应放到这种新形势下来考虑。

五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党校作问题解答报告，解答学员学习《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时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极力鼓吹：土改中，当广大群众起来之后，富农"不能不被侵犯，而

且很难不被侵犯”，如果发生侵犯，就应站在农民方面加以支持。

十二月十日，受中共中央之命，前去陇东了解边区实行土地公债的情况。同行者七人，路行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四十九岁

二月二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他陇东之行的情况。

二月八日，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说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向地主妥协的右倾。

二月十七日，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作土改问题报告。说：(1)土改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2)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3)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倾向。

三月，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康生也随军撤出，准备东渡黄河。途中，他竟违背我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亲自批准将保安处长期关押的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全部秘密处决。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给予了严厉批评。

四月，奉命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此间坐镇山西临县郝家坡，指挥全地区。土改中，他大搞“搬石头”、整干部、随意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地主分子。

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中旬，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土地法

大纲》。会议临近结束时（即九月九日），康生作了一个《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其中，在解释"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提出的原因时，极力鼓吹"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因而，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多大关系"。

十月二十九日，出席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奉命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到了渤海地区，康生借传达中央指示之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当时的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寄周同志等，也被当作"石头"搬掉了。与此同时，他却结识和提拔了王力（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关锋（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王效禹（清河地委书记）和刚刚在北平"刑满释放"的刘格平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康生手下的重要人物。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是越查越"左"。复查中，康生在"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办法，结果引起恐怖状况，严重脱离了群众。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五十岁

年初，到华东局（局机关当时设在山东）任第二书记。刚一到任就同第一书记饶漱石相勾结，把山东党组织诬蔑为"富农路线"的党，把山东党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也是华东局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黎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黎撤职调离山东。接着又把许

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加以排斥、打击；胶东、渤海区党委也被改组。

九月，为了便于支前，中央批准了饶、康提出的将原鲁中区、鲁南区、滨海小区、泰西小区并为鲁中南大区的建议，并任命康生为大区第一书记。康生接任后，立即安排曹轶欧在大区当组织部长。此间，康生接见了原在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当职员的儿子张子石。

一九四九年　五十一岁

二月，全军正准备渡江消灭蒋家王朝。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并通知康生留在山东，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接任后让其老婆当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到河北省平山县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六月，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其意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于是跑到青岛装病休养。

八月，出席山东省第一届人代会并作报告。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时，康生的选票比全票少了十票。对此，他大为恼火，曾非法布置秘密查对选票。

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康生不是代表，因而未出席会议。但会上还是选他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十月中旬，由青岛去北京查“病”。途经济南时，特向济南

市公安局负责人诬告其秘书偷偷拆看他的信。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康生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〇年　　五十二岁

五月初，突然向其秘书谈起自己的历史。说他在上海时，“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前门进去，从后门就逃走了。所以，一直没有出事”。并抱怨一些人不理解他这个情况，怀疑他在上海时为什么“没有被捕”。

五月上旬，带其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由青岛去杭州养“病”。此间，同其小姨子乱搞。后来被其老婆发现。苏枚羞愧难当，跳楼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可康生为掩盖自己的丑事，竟然胡说苏枚不是跳楼自杀，而是他秘书有意害人，推苏下楼，并将其辞退。

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专程去杭州看望康生。康生反复向陈、饶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绝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七月中旬，接中央指示，让他到北京医院治“病”。

七月二十二日，由杭赴京治“病”。途经上海时，又一次要求饶漱石向毛泽东同志说明，他决不会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饶当即打电报将康的要求告诉毛泽东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康生到达北京，住进北京医院。在此一住就是五年多，一直住到一九五五年底。

一九五六年　　五十八岁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二日，随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同志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的理事与代表。

三月十三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到波兰驻华使馆吊唁贝鲁特逝世。

三月十四日，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其他外宾。

三月十七日，离京去东柏林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

四月上旬，从德返国途中在苏停留。

四月二十四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接见出席全国轻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农业水利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全国交通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

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中，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四月三十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

五月，自称围绕十大关系问题读了些书。

七月十日，去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责令到会同志围绕整风问题为他准备个八大发言稿，并限定八月十日交稿。为此，还向到会同志介绍了四二年整风的开始时间与经过。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出席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为政治局委员)。

九月二十五日，在文化部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上作报告。他说：自一九四一年以来，由于乱扣"纯学术观点"、"脱离政治"、"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帽子，"严重地障碍了从事戏曲工作的干部重视技术、学习技术"。还说："否定技术决定一切，否定技术，也就否定了政治，也就等于否定了戏曲本身"。此次讲话中，他还极力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九月底，提出在适当时候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主张。

十月十日至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十一月中旬，奉中央之命，负责组织一些同志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一九五七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出席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

二月二十七日，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三月四日，向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

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其

间，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六个座谈会，最后，康生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中央和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1)在"一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内部还有矛盾"这一"新问题"。(2)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这是对哲学思想的"新发展"。(3)在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党内关系问题，这又是"在新条件下对不断革命论，对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发展"。(4)在"再论"中又提出两种性质的矛盾及其转化和十月革命道路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

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三月十八日，出席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并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

四月，通过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北方昆剧院建院大会。会上，康生送了贺信，题了词，并看了各场演出。他对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六月下旬，对整风反右运动，表现出出奇的激进，硬说中央党校学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和七月一日，连续三天召集政治教师进行座谈。

八月六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第五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八月十七日，出席北京市委和高教部召集的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会议，并作长篇报告，主要讲在反右斗争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高校的政治课要暂停，要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

八月二十二日，在音乐堂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问题解答报告，主要讲在大专学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报告中极力赞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十六字方针，说这一方针是“高级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下来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它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该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

九月十九日，写信给教育部，责令其加强对《人民教育》杂志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他说：“以整风运动形式学习马列主义既是正规的，又是系统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反复批判所谓把社会主义课程看作“非正规、非系统”的观点，批判所谓抱着“教学大纲”不放，而拒绝讲主席报告的错误倾向。报告中还说：十六字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十

六字方针就是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那个方针，对十六字方针，不能有另外的解释”。

一九五八年　　六十岁

一月上旬，先后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

一月中下旬，到四川视察。其间，九日出席云、贵、川三省党校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十一日在四川省高等院校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二日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月底，由川返京。途经武汉时会见李达同志。当李达同志谈到武大哲学系准备开设“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时，康说：“你叫这个名字，如果让主席听到恐怕不会赞成，不如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出席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人代会的高等院校负责人、教授开座谈会。

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

三月上旬，出席成都会议，又一次听取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月十九日，动身去东北参加杨靖宇同志的安葬仪式并视察东北各高等学校。

三月二十日，出席沈阳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三月×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上的大革命”，通过这个大革命，“要做到

又生产，又学习；又是学生，又是工人；又是学校，又是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这个概念改变了”，也可说，“某一种形式的学校消亡了”。

三月二十九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他在沈阳各高校看到了“双反运动”、“勤工俭学”、“教育大发展”等许多“新现象”。同时，他还解释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教育，一个目的，四个要点”。所谓“三个教育”，是指“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目的”，是指将受教育的人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个要点”就是指“勤俭建国”、“团结奋斗”、“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什么都好了”。

三月三十日，继续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心讲“教育要大跃进”。

四月三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教育方针、勤工俭学的收益分配、实行五同、建立理论队伍以及院校的协作、跃进和下放等问题。

四月四日，出席东北财经学院师生员工晚会。文艺演出之前，康生发表讲话，说他羡慕同学们年轻，羡慕同学们能在社会主义大学里，羡慕同学们能系统地公开地学习马列主义等。

四月六日，结束东北之行，回到北京。

四月十一日，向中宣部汇报东北视察情况。

四月十七日，就东北高校的“双反运动”和勤工俭学等情况向中央作书面报告。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出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讨论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康生作了大会发言。

五月二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五中全会。

六月三日，听取人大、北师大、石油学院三院校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

六月五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讲话中提出今后教学“应该以‘今’为纲”。谈到政治教育方针时，开始改变过去对十六字方针的赞扬态度，说十六个字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此次讲话，还谈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说：“我是人手论，马寅初是人口论。马寅初是只见口不见手。”

六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多次发表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部的工作，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并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

七月五日至七日，连续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红专跃进展览会”。

七月八、九日，在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批来京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辽、苏、冀三省高校和中等学校干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具体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

作大事来抓”。

七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勤工俭学进入新阶段》一文。

七月十七日，到北师大检查工作并讲话，说：“北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一百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七月十九日，到北农大检查工作并讲话：(1)指责北农大一进校象“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公园”，根本“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而不去“搞工厂”。(2)号召所有学校都要走综合化的道路。说“一个学校最低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业局。最好挂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3)指令北农大要大办学校，“一个班办一个学校，小学、农业中学、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扫盲班”等。(4)主张以产定级：“搞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二千斤的四级，三千斤的三级，四千斤的二级，五千斤的一级”。最后，当北农大汇报昌平农场奶牛产奶二千公斤，芦沟桥农场奶牛产奶四千公斤情况时，康生则说：“产奶太低了，能不能把牛召集起来，开个会跃进一下”。

七月二十七日，到人民大学视察“停课搞劳动建校”的情况。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三日，出席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其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日，五日，十三日在会上作了报告。

八月三日，跑到天津，出席天津市委召集的，有仁立毛呢厂，第一食品加工厂等十二厂二十多人参加的工人学哲学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学哲学并不神秘"，天津工人带头学哲学是"干了一件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

八月六日，出席教育问题座谈会。会上，康生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

八月十三日，在河北省高等学校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首先谈到他参观北京各大学举办的红专跃进展览的几个印象，接着谈学校办工厂的几种形式和收益分配，最后又讲社会基本矛盾。他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的一套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了"。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定钢铁生产要比上一年翻一番，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并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由于康生的一再坚持，"大办教育"也写进了决议。会议结束时，康生又约吉、晋、黑和太原等省市委的同志谈了工厂办教育的情况。

八月×日，收到杨献珍同志于八月四日写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

九月十日，扣发周恩来同志所写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是应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约请，将其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章的。康生看到文章清样，阴阳怪气地说："文件嘛，是好文件了，不过正式发表有些地方还需要斟酌"。陈伯达看到文章清样，也含糊其辞地说："要和

康生研究一下”。这样，周恩来同志的这篇重要文章，经过康、陈的“斟酌”和“研究”，就石沉大海了。

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以中央文教小组的名义，在中宣部孑民堂召集经委、文教、工会、青年团及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有关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工厂办教育的问题。最后一天，康生就此作了专门报告。

九月二十日，离京去晋视察。

九月二十一日，先后参观太原工学院和医学院。在太原工学院，他提出“一定要有决心建设共产主义的太原工学院，一定要做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大学生”。在太原医学院，他说：“如果一个医生给病人诊断，敢于说不懂、不能、不对这三句话，那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就是一位马列主义的医生”，就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医生”。“不做社会主义的医生，就不能诊治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他还说：所谓病人，“是人，不是病猫、病狗。病人是活人，病人是中国人。但是现在的病人还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你们如果只懂得生理学上的病人，不懂得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病人，就是半医生。”

九月二十二日，参观山西农学院。在此他说，书本知识，“有用也没有用”：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家不是过去那种大知识分子，而是“今天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而且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群众。”

九月二十三日，在山西太谷接见中央党校下放劳动锻炼的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你们来农村，从表面上看，好象没有研究本行，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说：“按劳取酬也是等价交换的意思，所以在这

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说它还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供给制则比工资制“进步的多”。因此，极力鼓吹“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

九月二十四日，听取山西平遥一中的汇报，指示他们与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

九月二十五日，在太原听取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文教部关于阳泉市各厂矿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汇报并看有关这方面的书面材料。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特地赶到阳泉，视察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情况。

十月上旬，离晋入豫视察。

十月十二日，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的汇报。汇报中他插话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起来”，“现在，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利用空隙进行学习”。还说：在办教育上，只要“敢于胡搞就行”。

十月十三日，在郑州召集几个工厂的负责人进行座谈。

十月×日，参观郑州国棉三厂。

十月十五日，出席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系统院校长会议，并发表讲话，强令“全国农业院校都要搬到农村去”。说：“旧大学变为新大学”，就“象猴子变人一样”，“很难”，猴子必须劳动才能变成人，农业院校只有搬家，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指示各农业院校要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拔白旗、插红旗，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逼师生下乡。

十月十六日，召集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

康生讲：(1)"学校要消亡"；(2)要办"综合大学"；(3)今后不再"评教授的级"，"要叫教授都叫教授"；(4)说"所有教学计划，都可取消"。

此外，在听到开封师院学生已经"停课劳动"的汇报时，康插话说："这个好，但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当有人提到搞科研需要资料时，康又插话说："资料多了有害处"，同科学院发生关系多了，也"一定有害处"，因为"它会把清规戒律缠绕到你们身上，几年摆脱不了"。

十月十八日，出席洛阳市的干部会。

十月二十日，参观洛阳市西工区十二个小学联合建成的"红领巾钢铁厂"，并约集该厂党支书、教员和少先队员进行座谈，听取汇报。他说："钢铁厂既炼钢又炼人，但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并要全国一亿小学生都来参加炼钢。

十月二十一日，参观洛阳师范学校，对该校提出的"以工地为学校，以炉旁为课堂"的口号极为赞扬，并指示该校，"利用这种形式，创造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师范学院"。

十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一文。

十月二十四日，视察孟津县鸠山翟泉红专大学，提出孟津"全县(办)一个联社"，使孟津县既是政权，又是学校，又是联社。

十月二十五日，视察长葛三中，说"今后普及大学主要靠农村的红专大学"。视察中，指令长葛县委研究，"把长葛三中作为试验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基点"。还说：看来"越是办教育的越不懂教育"。

十月×日，到登封县三官庙视察，赞扬三官庙农民学哲学学得好，责令报刊公开介绍其学哲学情况。还讲："学哲学没有什么神秘，学了哲学清清楚楚，不学哲学不清不楚，所以，哲学就是明白学"。

十月二十七日，同河南省委谈话。说"现在发展到了学校集中阶段，这可使小孩从小受到社会教育，而不受家庭影响"。还说：学校"集中"或"合并"，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个革命"，是"一件好事"，也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然趋势"。要河南省委"提供"这方面的"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

同日，离豫赴皖视察。

十月二十八日，到安徽农学院视察并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1)要强迫农林院校师生搬到农村去。(2)要对教授实行"三头主义"，即"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3)讲中国农业科学超过国际水平。但农业科学"并不在农科院"，而"在农民手里"，"要想发展农业，农业科学家非拜农民为师不可。"

十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医学院视察并讲话。

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胡搞就是科学研究"。

十月三十一日，出席安徽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三日，离皖赴沪视察。到达上海，立即听取上海教育局的汇报。当有人汇报劳动过多会削弱基础课时，康插话说："争论点就在于什么是基础课，他们所谓基础课，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当有人汇报说：教师下厂，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康又插话说："对好的要热情对待，不好的要冷

淡，要给他颜色看看。"

十一月四日，参观上海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并发表讲话。说：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基础上敢于胡搞"。

十一月五日，听取全国铁路教育工作会议汇报。

十一月六日，在全国铁路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十一月七日，听取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汇报。其间，多次插话，其主要内容：(1)要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2)办学的经济政策有两条："一条是一毛不拔，如宏大的图书馆，什么物理楼，化学楼，就是一毛不拔；另一条是挥金如土，即对尖端科学，是挥金如土。"在搞尖端科学上，"即使没有结果也不要紧"。(3)凡有下放劳动者，"一不叫下放，二不叫放假，三不叫义务劳动，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

十一月×日，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视察，号召该校学生要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在华东师大视察时，又号召师生"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

十一月×日，在上海铜仁合金厂视察，号召大家破旧的教育规章，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

十一月×日，在复旦大学视察时，号召大家"来一个突击，扫除逻辑的'盲'"。在上海机械专科学校视察时，又公开否定该校设置工业管理课程的必要，说："你叫他们多学马列主义，有了马列主义，能做群众工作，工业就能管理好。"

十一月十日，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进行劳动锻炼的干部，并发表系统的"胡话"：(1)"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斗争，人们

思想解放了，从而形成了奔向共产主义的形势”。（2）“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3）工厂大跃进靠“吃政治饭和教育饭”，“事实证明，教育不会妨碍生产，越是生产忙，越是教育忙，提高觉悟忙”。（4）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工资的基本形式”，实行计件工资，“不是增加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不是发展集体主义，而是增加了个人主义”。（5）工厂要大办红专学校，“因为它能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主席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三个条件，其中有两个是教育，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要靠教育来解决”。“如果十几年不能普及大学教育，那末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很不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6）现在有工农商学兵五种盲，工盲，农盲，比文盲厉害。“文盲，动一动书，顶多将书拿倒了，不会将书拿坏”，可是工盲，“动一动工具，会把工具搞坏”，“从社会主义社会来看，仅仅扫文盲是不行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都应该扫除这五种盲。”

十一月十一日，到同济大学视察，并发表讲话。宣传：“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尖端问题”。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出席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针对当时的浮夸风，提出了“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问题。

一月十二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五八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五九年教育工作方针。说五八年在教育上取得了五项重大成绩：（1）从政治上、原则上确定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即两结合）；（2）确定了党对教育的领导权；（3）实行了两条腿办教育的制度；（4）推行了全民办学的方针；（5）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关于五九年的工作方针，“主要是把五八年确定的方针具体地贯彻到各个方面，要抓巩固、调整、提高，在下放的基础上抓统一管理，集中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他说：“如说去年是大刀阔斧，那么今年要来个精雕细刻”。

一月二十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抱怨人们不敢提“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口号，叫嚷“我们应该象马克思一样，允许讲胡话。”

一月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压缩空气已有二个月，现在还要鼓足干劲”，但一再强调“搞建设，向自然开战，也要调查研究”。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日复会（注：该会因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暂停一段）。康生又到会讲话。他说，五九年的学校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劳动不要泄劲，还要鼓劲”，二是“有计划的抓理论问题”。这次讲话，改变了他前两年一再鼓吹的所谓整风运动、时事学习也是“系统的、正规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提法，承认五七、五八两年“系统的学习

马列主义不够”，提出“学校要考虑（恢复）四门（理论）课”，“要建立一批专业理论队伍”。说“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丢了这一条不行”。

三月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学术批判和讨论问题，提出“今后应有计划、有政策、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待这个问题”。

三月×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并着手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文教小组决定下设一个“理论小组”，其组长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兼任。

四月二日至五日，出席党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的提名。

四月十五日，出席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四月十七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四月二十一日，在学习会上作《关于善于观察形势问题》的报告。

五月八日，在学习会上谈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五月十一日，又一次作学习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以及理论的发展形势问题。报告开始，他见有人录音，立即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有三怕：怕录音、怕笔记、怕记口号概念”，因为“任何报告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的一种说法或发言，离开那时的情况，（就）不一定对。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

也没用”。

五月十六日，又作理论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六月初，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他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大发雷霆，指令“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

六月中旬，去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

六月二日至十六日，出席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康生对自己到处鼓吹“胡搞胡闹”、“讲胡话”的错误不但不作任何检查，反而从“理论”上批起讲老实话的彭德怀同志来。

八月二十四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召集的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九月，撤回他在五六年九月提出的关于“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提议，说：“再开就被动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处搜罗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

十月五日，向毕业归国的留苏学生作报告，介绍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说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的，不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

十月中下旬，搜罗到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抚顺党校的谈话，硬说这个讲话和谈话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要对杨的这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

十一月十五日，参加陈伯达召集的编写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戏跃进情况和六〇年打算，在上海召集了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座谈中，一再强调"先要挖掘老戏"。

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席中央文教书记会议，并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指党在五八年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理论上世界观上"进行了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往往拿伪装的唯物论来反对我们反映了客观的主观能动性"。

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全面系统地讲"发展"。主要内容有：(1)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2)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3)讲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向"载入七大党章，八大党章之所以没有写上，那是"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了"。(4)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5)说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象陈独秀、王明、彭德怀那样，是"公开的反对"；一是以"尊重马克思"、"不能超过马克思"、"一看就懂"等为借口，隐蔽地反对。(6)理论工作必须结合"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

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7)说许多老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过去是功臣，今天是祸首”。

十二月×日，出席中央召集的杭州会议。会上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组织广大的理论工作队伍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　　六十二岁

一月四日，听取中央党校关于组织批判杨献珍同志情况的汇报。其间插话说：“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最后标准是对的，但不要传出去。”

二月，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

四月二十三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发动群众编写教科书之事。

四月二十四日，在哲学教科书初稿讨论会上发表讲话：(1)“中央书记处决定半年写出书来，我们减为三个月，现在各地都已交出来了”，这“证明理论工作也可以多快好省，也可以走群众路线”。“用集体讨论代替集体审查”，“这是个尖端”。(2)书中缺点是少不了的，但“写出来就好”，“各省的积极性必须发扬和保护”。(3)“要求六〇年内起码三易三改，到十二月三十日拿出第三稿。”

四月二十七日，出席社会科学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在理论科学研究工作上出现“各省领导重视”，“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依靠群众编书”的“新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科学研究部门的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参加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讲话中，要大家破除对外国人的迷信，说现在工人农民写的诗超过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千万倍。还要大家对鲁迅“也不要

太迷信了"，说"《阿Q正传》很好，但是共产党员写《阿Q正传》还是要检讨的"。

六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月，中国京剧院将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岔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得知后大为恼火，指责说："'二马'（指中国京剧院的马少波、马彦祥二同志）是粗暴的代表。"

十一月上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员，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

十一月中旬，由莫斯科归来。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花田八错》。

一九六一年　　六十三岁

一月二日，视察福州第一中学。此时，康生已经放弃了劳动就是文化革命的提法，开始主张少劳动多读书。他说："学校是读书的，不读书是不行的"，"要把基础知识搞好，要在巩固的基础上提高"。当福建省教育厅汇报说，福建各中学的劳动一般是四十五小时，康生说："恐怕多了一些"，"过多的劳动，身体会受损失的。"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出席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一月中下旬，康生一行到云南省视察。其间，点演了许多旧戏。他见有人吃惊，立即指责说：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这些戏，真是怪！

二月，康生一行到四川视察了二十天。此间，天天点演旧川剧。

二月至三月，去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规律，不甚了了。此间，康生又为会议点演了许多旧戏。

三月二十二日，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即紫光阁讲话）。该讲话打着贯彻"双百"方针的幌子，极力鼓吹演旧戏。说，一定"把剧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

四月二日，在中央党校召集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六月十四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报告，检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理论工作、文艺发展等规律，"不甚了了"。说自己的主要偏向是"强调政治，轻视业务，空谈红，轻视专，空谈政治，轻视读书"，"片面强调劳动，忽视学习"。在教改上，说自己"有时甚至变成脱离科学的瞎指挥"，这样就使教育"超过现在的需要、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基础，使教育工作受到损失"。他还说："这几年大办高等学校，大办中学，大办小学，大办业余文化学校、大办文化，我都有份"。"我经常宣传高等学校的学生二年要达到一百万"，"这就使大学发展很大"，"造成很多困难"。"由于我宣扬了河南红领巾工厂，结果使劳动脱离了教育。"

九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十月十六日，调北昆剧院为即将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演出《李慧娘》。演出后，特约剧院领导、导演、编剧、作曲、主要演员到他住处（钓鱼台内）吃饭。吃饭

中，康一再赞扬《李慧娘》“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八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

十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苏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月，自荐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九六二年　　六十四岁

一月，到广州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月，有人告小说《刘志丹》的状。康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听小说的名字就知道是为高岗翻案的”。他立即下令将《刘志丹》印九百册供批判用。

三月，陪江青在上海看戏。此间，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已经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

五月四日，给北京人艺导演梅阡、孙敬雨写信，谈他对《桃花扇》剧本的修改意见。指示梅、孙二同志要“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

七月中旬，对《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欧阳予倩改写的话剧《桃花扇》的文章中所流露的否定情绪表示不满，说这个“情绪不好，应当批评。”

八月六日，去北戴河参加为准备八届十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此间，他捎口信给孟超同志说：“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多写点别的东西。”

八月底，他捎纸条给孟超同志说："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会议期间，康对习仲勋同志搞突然袭击。他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爱人李建彤同志，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同志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此次会议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此为转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九月底，强令《红旗飘飘》丛刊停止编辑。已经印好的三十万册第十七集也让销毁。文章的作者，刊物的编辑也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十月，组成以康生为首的《刘志丹》专案组。专案组一成立，立即对李建彤同志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逐一加以迫害。

十一月，在钓鱼台主持写反修文章。

一九六三年　　六十五岁

春，提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是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五月至六月，去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讨论。其间，康又一次提出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

矛盾的论点，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说："这是赫鲁晓夫的论点"。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向中央文教小组所属的"理论小组"讲《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产生的经过及其含义。不料，康的这一讲话传到辽宁。辽宁的同志将其整理打印出来。康见了打印稿后大发雷霆，说"理论界有个李万铭（骗子），说我有个讲话，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讲话"。并为此大整"理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甫同志。

七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中苏双边谈判。

九月三日，陪同艾地同志去中央党校，并作报告。

×月，为潘天寿先生的个人画展题词："艺苑班头，画坛师首。"

一九六四年　　六十六岁

在钓鱼台继续主持写反修文章。

年初，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予倩改编的本子拍摄的电影《桃花扇》之后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的，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康还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后来，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五月二十日左右，收到《光明日报》呈送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清样。康生看后，武断地认为艾、林两同志是杨献珍同志的"代言人"，立即找"反修哲学写作小组"重要成员关锋研究对策。经研究决定：（一）让"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一篇反击艾、林的文章；

(二)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的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

与此同时，暗示中央党校要揪"合二而一"论的所谓后台。

五月二十八日，为施展"钓大鱼"的阴谋诡计，康生指示《光明日报》第二天公开发表艾、林两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党校请示康可否对《光明日报》发表艾、林的文章表态？康回答说："经过讨论，自然会有结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并指令中央党校查一查杨献珍的讲稿讲没讲"合二而一"。

同日，康生收到《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康生看后对作者说：文中提出的一个公式，"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人家抓住辫子反而麻烦"。

六月初，在康生的催促下，中央党校找到了杨献珍同志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新疆班讲课的讲稿，其中讲到"合二而一"问题。

六月四日，指示《光明日报》赶快发表《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

六月五日，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席间，他将当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和五月二十九日发表的艾、林的文章一并交江青，让她转送毛泽东同志。

六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将文章一并退给康生。从此之后，康生就到处宣扬说："主席讲啦，'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

六月九日至七月九日，加紧施展“引蛇出洞”的策略。在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上煞费苦心，竭力搞成学术讨论的样子，以骗人上钩。

与此同时，康生又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编辑部，把赞成“合二而一”的人一一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然后由该组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

六月二十四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说该报于四月八日发表的××的文章“有毛病”，但不要因此“把目标转移”了。关于“合二而一”的来源，“还是说从（中央）党校来的，从杨献珍来的。”

六月二十七日，召集《光明日报》负责人谈话，说：关于“合二而一”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还可再放四篇错误意见出来”，“每次两篇”。并诬说“杨献珍从五七年以来的八年多在五个关键问题上表现都不好”。

七月一日，在人大会堂观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席间，对著名演员说：“我看了你的《尤三姐》电影，觉得这在国产的戏曲艺术片中是最好的一部。”

七月上旬，以“中央理论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的理论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文章。

七月十二日，同《光明日报》负责人谈公开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步骤：第一步，批杨在五九年的三个报告；第二步，揭杨同彭德怀湖南之行的关系；第三步，揭杨同魏文伯的侄子的谈话；第四步，揭杨于六二年在西北局的调查。

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集理论界十几位同志在钓鱼台

八楼连续开会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稿子。

七月十七日，由康生亲自导演炮制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七月二十四日，在钓鱼台召集理论界一些同志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批判“合二而一”问题。

七月三十日，《光明日报》请示康：“一篇稿子中说最早提出‘合二而一’的是德波林，要不要删？”康回答说：不用删，有的文章中“就有‘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提法”，保留德波林是“合二而一”最早提出者的说法，“正好说明杨献珍是德波林的应声虫嘛！”

八月初，同陈伯达一起，按照“‘合二而一论’是阶级调和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拟定了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纲。

八月上旬，康生、陈伯达召集会议，讨论修改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

八月二十三日，指示《光明日报》，“可以找中央党校写文章揭发杨献珍讲稿中的问题”。

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赶紧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还指示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要全面研究一下，要系统研究一下。”

八月三十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总结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这次讲话，他一反几年来反对戏剧改革、大肆鼓吹

抢救旧戏的腔调与举动，指责戏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来，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责令各地对此情况一定要作出“彻底检查。”

八月三十一日，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

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三个多月来对“合二而一”围攻的情况。

此次报告中，又对中央党校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攻击。说该方针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它“在中央党校实际上成为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达了“今后不许再用”的禁令。

十一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

十一月底，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十二月×日，收到赵朴初同志写的反修诗——《某公三哭》，并大发议论说：“宗教界人士还能反修？”于是，将其当作反面材料呈报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三届人大会议。

一九六五年　六十七岁

一月四日，出席三届人大闭幕式。会上，康生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月×日，陪同刘少奇同志听取教育部关于教育革命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康趁机对刘少奇同志说：“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就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

印了。”

五月，向毛泽东同志告吴晗同志的状。胡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有关。”

六月二十三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且历时是相当长的”。

九月至十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据康自己说，其间，毛泽东同志同他明确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年底，将大庆油田出土的三十万年前的一块玳瑁化石攫为己有。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选料配制砚身。

一九六六年　　六十八岁

一月二日，出席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

一月三日，同一兄弟党主席谈话。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重要意义”，至于“有些农民占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个问题”。

一月十三日，就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的《情况简报》试刊上所载《从海阳农村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如何为农民服务》一文作批说：该文作者“是站在群众之上，要做群众的导师，做人民的老爷”，这些人“必须下到农村去劳动三年”。结果，《情况简报》仅出一期试刊就被一棍子打了回去。

二月三日，参加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问题。会上没有争论。康生对彭真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也没提出任何异议。会议

结束时，彭真同志指定许立群、姚溱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向中央汇报用的《汇报提纲》。

二月五日，参加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听取彭真同志的汇报。会上，康生也没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二月八日，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汇报中，康生仍然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一日，彭真同志以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汇报提纲》转发全国的批语，康画了圈。还是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二日，去上海。

二月二十五日，回北京。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大区书记参加)，听取毛泽东同志专就学术讨论问题所作的报告。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召去谈话。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康生关于《二月汇报提纲》制定经过的歪曲汇报后说："'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三月三十一日，向彭真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谈话内容。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当面批判彭真同志在文化革命中犯的所谓"一系列罪行"。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术、教育和工业体制问题的指示。

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

五月四日至十六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

康生突然变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为激烈批判态度，说该《提纲》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该会决定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并任命康生为“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五月十三日，通过关锋指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

五月十四日，派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大搞“调查”。行前，康面授机宜，要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

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其间，十八日听取林彪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二十四、二十五两个下午，康生作长篇报告，大讲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全面超过”马列主义。

五月二十五日，康、曹支持并帮助炮制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公开贴出。当即引起北大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击。当晚，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并严肃批评了聂元梓。

五月二十六日，得知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态度后，连忙指使人把大字报底稿要到手，并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将大字报底稿转送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同志。

六月一日，康生借口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立即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广播。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打电话给电台提出质问。电台立即将质问编成《情况反映》报康。康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珮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

六月二日，指示《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登载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

六月三日，出席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集的各部负责人会议。会上决定向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对此，康生表示积极支持。

同一天，会见了胡志明主席。会见中，诬说彭真背着他搞了个“对抗毛主席文化路线，抵制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承认“《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关”是他的发明权。

六月四日，同王力一起到中联部作“文化革命动员报告”，说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三和一少”。

六月六日，到北大看大字报，并对北大师生的“革命热情”表示“赞扬”。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北大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康生积极参与和支持北大工作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全体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彭真“在晋察冀是一个彻头彻尾拥护王明路线的人，但以后却变成一个坚决反王明路线的人”。说王稼祥是“定时炸弹”，“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诬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并做贼心虚地说：“我检查了自己是不是定时炸弹，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我要是炸弹，就去炸美帝、炸陆定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七月十四日，同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

并同师生谈话，说他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

七月十七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会上，康生极力反对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所提出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研究撤销工作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三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起草一个撤销工作组的文件。是日会毕，康又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四日，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在此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煽动性地问：“你们掌权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

七月二十五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通过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文件。会毕，康生又跑到北大向全体师生提出三个问题：（1）“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2）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3）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谁去搞？竭力引诱和煽动北大师生去翻“六一八事件”的案，去反对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明确宣布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五十天来犯了两个最大错误：（1）不让北大师生了解自己是北大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走群众路线；（2）没有帮助北大建立起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切由工作

组包办代替。因而，“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此次报告明确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组长之职。积极支持聂元梓等人起来篡夺北大领导权。

是日晚，率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去北师大参加师生大会。会上，他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他宣布撤掉孙友渔同志北师大工作组组长之职，并针对一些人要追林杰的后台问题叫嚷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陈伯达和我。”

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大，并在此接见了十八所高校的来访者。接见中，又把反工作组的调门进一步升级，他说：“二个月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应一律撤销”。

七月二十九日，同人大部分师生谈话，再次大谈“二月兵变”确有其事。还对当时流行的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八月一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八月四日，在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吹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点起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攻击北大工作组六月二十日写的《简报》和《报告》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一个反革命的文件”。说北大工作组“代表资产

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而不是“右倾思想错误”。此次会议还提出“一斗二批三改”，即“斗黑帮”、“批权威”、“搞教改”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叫嚷要“彻底改造党团组织”。

八月六日，同江青一起参加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鬼见愁》的辩论会并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成绩，说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革干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攻击共青团“象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彻底改造，并要红卫兵成为改造共青团的“重要骨干”。

八月十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大讲毛泽东同志如何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八月十二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并被会议递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八月十五日，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

八月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师生并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牢牢记住”：“革命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自己解放自己”。

八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席间，他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

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一些人给林枫等同志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斗。当晚，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

头头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还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有彻底搞深搞透"，"他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彪的问题"。

八月二十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说他"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希望中央党校"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并说"戴高帽、挂牌子不算武斗"。

八月二十八日，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席间谈了他对中央党校的两点看法：（1）"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2）"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揭开林枫的盖子"，对党校来说"仅仅是初步的"。

八月三十日上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下午，第二次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讲话。说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因而，这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还说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是日下午，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次大会。

九月四日，收到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的信。信上说："党校的问题同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康生对此极表赞同与支持。

九月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山大等来京同学，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和经验"，继续煽动反工作组。

九月十日，接见谭厚兰，让其去山东砸曲阜。说：到那里"凡是应该砸的都可以砸"。

九月十五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会，并为大会主持人。

九月二十一日，出席中央党校文革会。会上，康生讲述了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的经过，说他是最早发现“合二而一”“有问题”的人。

十月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四次大会。

十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的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会间，与北航“红旗”代表座谈，赞扬他们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写得好”。

十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刘、邓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

十月中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在康生的暗示下，领先对刘、邓的所谓“反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康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样才算“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

十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五次大会。

十月十九日，同中央党校一些人谈什么是政治表现。他说，所谓政治表现“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在当前来说“就是坚决不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组长汇报会。其间，康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同志当即说：“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十月二十七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参加阿劳五大。

十月二十八日，拜会阿劳中央。拜会时，康表白他这个人

一向有点"激进"！

十一月二日，在阿劳五大上致词。

十一月九日，同阿劳中央会谈。

十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阿尔巴尼亚参观访问。此间，他首次提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的观点。

十一月十五日，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并发表长篇讲话。极力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不是象列宁那样仅仅从经济上看，而且还"从思想范畴上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从政治范畴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并主持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八次大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

十二月二日，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此前言"已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过，准备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出席林彪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会上，康生作了中心"批判"发言。他说：工矿企业中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比学校少"，因为在这里所有制虽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但在流通、分配等方面"基本未改"，"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

阶级工厂”。因此，“工厂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更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如果基础变修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十二月十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召集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进行座谈。座谈中，康生多次插话说：李洪山到处贴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陈伯达等大标语、大字报，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小头目”，对他必须“严厉镇压”，“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就是最大的民主”。还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是由于康生的这个讲话，北京林学院发起了有四万人参加的“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接着又将李逮捕入狱。

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兄弟党总书记谈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说列宁所讲的“今后的东方，革命无疑地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一句话，“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之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的一份《学习简报》上逐段加批。

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接见红卫兵并讲话。康生说：明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一年”，但要最后胜利还要看“明年的大决战”。

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两条路线的实质或关键”，“不只是指六六年六月初七月底的五十天的路线错误，也不是只指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而是指贯穿

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提出“生产力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论点。

一九六七年　　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子明等人两次致信康生，对李洪山的结论和处置提出质疑。康生在信上批道：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的”。

一月×日，鉴于陶铸同志被揪斗，中央责成康生兼管中组部的工作。

一月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王力等人一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接见时，康生竭力鼓动“造反团”把材料整理出来，说“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军队的同志应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还说：工厂实行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

一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的头头，大讲所谓“批判刘邓问题”。

此外，这次接见中，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工厂，“完全可以蜕化为资本主义工厂”问题，发明了人民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新提法。

一月十日上午，在人大会堂接见北航“红旗”等单位，说《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新反扑》一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新阶段。他表示“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要组织大联络站一起战斗”，“一起回击经济主义妖风”。下午，又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诬说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

一月十三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青训班的一些人，主要讲：（1）中央党校从四八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同的是五七年前“同逆流作斗争的是陈伯达”，五七年后同逆流作斗争的则是他康生。（2）说他主管中央党校以来，曾领导党校进行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直到揭了刘邓之后，才把“党校的盖子真正揭开”，并抱怨说：“我把党校的盖子揭开了”，可有人却“把矛头指向我”，这就“完全错了”。（3）说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煜、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是“对抗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方针”，是“抽象、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一月十五日，通过陈伯达将中央党校的拥有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并指使“造反派”抢先“夺权”。事后不久，又经康批准，将青训班学员苏承德、宋扬之等六人逮捕入狱。

一月十七日，看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所作的《关于高级党校如何开展整风》的报告。突然从中发现了“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思想”四句话，象是发现了什么重型炮弹，立刻在旁边批注道：“这就是杨、侯‘十六字方针’的初版，杨、侯拒绝以毛泽东思想为党校的指导方针，说他们的‘十六字方针’是少奇同志定的，以此对抗主席的

方针”。（注）

一月十九日，在王力、关锋陪同下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受王效禹派遣专程来京摸夺权之底的儿子张子石。让张子石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同一兄弟党会谈。他说：过去是依据列宁的阶级定义，“从生产资料和经济范畴来划分阶级的”，而现在看，“不仅从经济范畴，而且要从政治、思想范畴来决定阶级”。

一月二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表白他没有保过郭影秋和蒋南翔。说：“恰恰是我的一个讲话，第二天把郭影秋揪回人大。蒋南翔，恰恰是我派××去揭开的”。当“造反派”头头汇报说，他们已把“红战团砸了”，康生说：“也可以嘛，那也不算什么，他们也搞你们嘛！群众革命嘛！”

一月二十二日，同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座谈，指责他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他康生。

一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一起接见一兄弟党代表团。接见中，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或三个阶段，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要他们在反对刘、

注：这段批注，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①“十六字方针”是高级党校于1953年5月提出，同年6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1957年5月作的，1962年付印的。57年的讲话怎么可能成为53年正式文件的“初版”呢！②“十六字方针”是根据延安整风精神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制定的，而且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贯彻这一方针，根本不可能成为“对抗主席的方针”。③杨、侯两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十六字方针’是刘少奇同志定的”。

邓时，"注意利用矛盾，利用那些老人，哪怕他们投机也好。"

一月底，中央成立毛选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副主任。

二月八日，中联部"工勤总部"的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和王力等人硬说"林"字是"×"字，是指美国专家×××同志，其目的是想把×××打成"黑帮"，来"破坏我党同兄弟党的关系"，因此，就把"工勤总部"打成"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强行夺权。

二月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传授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夺权经验"，说"只有三结合才能夺权"，而"三结合"又必须让左派"占主导"。这次谈话中还指令他们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并具体部署了斗"红战团"的策略。

二月十三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会议主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严厉痛斥了康生一伙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工厂农村，搞乱军队的罪行。康、陈一伙百般狡辩，多次蛮横地打断叶、陈、徐等同志的发言。

二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会议室继续举行。会上，谭震林同志驳斥了张春桥阻拦陈丕显同志来京的种种狡辩；陈毅同志揭露了康生在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的罪行；李先念同志又揭露了康生指使人炮制《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所带来的危害。

同日夜，康生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指示张春桥、

姚文元、王力三人，到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作歪曲汇报。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八日，怀仁堂会议室连日紧张举行会议。康、陈一伙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其中数康生叫得最凶。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林彪宣布：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三月六日至十四日，康、江、陈一伙积极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以同他们在怀仁堂的围攻批斗会相配合。

三月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肆意歪曲和批判，对该书所说“思想意识修养”，“既不通又不科学”；所说“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孔孟之道”；所说“没有偶像崇拜”，就是“暗示攻击毛主席”；所说“无事不可对人言”，就是“党的机密也可告诉蒋介石”；所说“自爱心、自尊心”，就是“活命哲学”。总之，该书“只谈个人修养，不谈夺取政权”，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三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介绍他促动、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过程，解释他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含义。

同日，同另一外宾谈话，说我党干部“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叛徒，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说他们“对打倒封建主义、帝

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赞成的，但是对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赞成了”。当外宾谈到“四个伟大”在英文中顶多用两个伟大时，康生立刻说：“如果把这个意见告诉那些青年同志，他们会斗你的，因为你取消了两个伟大”。

三月十六日，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同志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

三月二十日，同外宾谈话。诬蔑罗瑞卿同志是“暗藏的反革命”，是“叛徒”，是“赫鲁晓夫”。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政府里”、“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些人，对这样一些人“要象对细菌一样，用一种霉素来治，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整掉”。

三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说中央党校过去都掌握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他们“反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对“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的学校”，“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取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四月初，先后收到中组部群众组织搞的《部分主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部分中央和中央局管理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新疆自治区部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内蒙自治区有严重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等材料，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印百把份”，“供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干部，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参考”。

四月五日左右，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一个专门论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稿。

四日八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进行中，突然收到中联部“造反总部”打来的电话记录，内称中联部“工勤总部”正在挑起武斗。康生看后，就武断地认为是伍修权支持的，立刻让王力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草拟一个“重点打击伍修权”的所谓“四八指示”。原件经康生签名，由文革办事组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从此开始了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和迫害。

同日晚，康生、王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处接见中联部的几个人，专门布置了对伍的迫害。康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的人”，他的问题“可以上街刷大标语”。并亲自拟了“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里通外国分子伍修权”等几条标语。最后还给中联部写了一个书面指示：“伍修权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希望中联部同伍修权划清界限”。

四月×日，指示中联部收集整理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

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讲话。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又说在这两条路线中，究竟执行哪一条，“这是划分左、中、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讲话中还攻击刘少奇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长期以来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月十四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席间，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张纸条，指令她迅速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同志的所谓"问题"。

同一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代表，接见中，凭相面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四月中旬，康的小姨子苏枚（原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由于害怕社会上刮起的"揪叛徒"之风，突然自杀身亡。康却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致死，强令追查凶手。结果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逮捕入狱，受株连者五十多人。在刑讯逼供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四月二十四日，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

四月二十七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组织代表，再次诬陷王逸伦："我不认识王逸伦，但在一次中央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这个人不象共产党"。

四月底，向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作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报告。讲毕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对人说：今日报告"其实只讲了四个字：'高举、顶峰'"。

五月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五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组部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中组部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对刘、邓反动路线"揭露批判得不够"，"对安子文黑帮，对赵汉、乔明甫、李楚离等人揭露斗争得还不够"，"中组部分化的还不明显，革命力量发展还

不大”。因此，中组部还“不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而是学习青年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狠批刘邓反动路线”，“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组织抓叛徒联合调查团的办法”，利用自己掌握材料多这一优越条件，迅速行动起来“揪叛徒”。他特别强调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三结合’夺权阶段”，“非常紧迫地需要你们掌握的这些材料”。最后，他宣布：决定组成一个业务组进驻中组部协助工作，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文书档案、干部档案加以启封”，为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材料”，并研究一些问题。

五月十一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陪毛泽东同志乘小汽车在北京城里转圈，以调查大标语、大字报的情况。事毕，康到北师大附中接见全体师生，并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同一天，又指示林枫专案组，“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说“重点是林枫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一起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学习《五·一六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和林彪的讲话等。此外还谈到“揪叛徒”的起源，承认自己是“揪叛徒”的发起者。

五月二十九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会间休息时，与王力谈起“三和一少”的问题。王力说：“岂只是‘三和一少’，实际是‘三降一扑’”。康生接着说：“我看是‘三降一灭’，就是对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对修正主义搞投降主义，对各国反动派搞投降主义，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扑灭东南亚

的武装斗争”。

六月一日，在中调部一群众组织的报告上得知沙韬同志的近况，立即作批：“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字，(这)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

六月二日，收到北京卫戍区关于王逸伦在狱中表现的报告，其中说，王近日“犯病次数繁多，病情也重”，特要求以“面谈”代替“写材料”。康生批道：“王逸伦狡猾得很，请告卫戍区千万不要被欺骗”，“不要同意”他以“面谈”代替“写材料”的“阴谋诡计”。

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实行了。还说：这个问

题，“我们中央还没有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①。

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王稼祥“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是埋在中联部的“定时炸弹”。

七月四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等群众组织，肯定他们是“造反派组织”，相反，说“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

七月十八日，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造谣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造谣说：“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一再煽动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的大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在讨论武汉“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等人坚持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写到宣传提纲里去。

七月二十四日晚，同吴法宪一起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五同志的会议。会上，康生指使一些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

---

① “三和一少”，本是1962年7月我党内个别同志产生的一个错误思想，毛主席在1963年5月曾先后同兄弟党的同志说过，这种错误“七月犯，八月改”。因而是一个短暂的局部性的思想错误。可是康却把“三和一少”篡改为“三降一灭”，把一个短暂的思想错误扩大为1950年以来的整个对外路线错误。

支持武汉革命派》的新闻稿时，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在新闻稿中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致使各地发生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

七月×日，在康生的同意下，戚本禹指使北航韩爱晶对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进行人身迫害，致使彭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七月×日，伙同江青、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人身迫害，指使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九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进行逼供，制造假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七月三十日，接见河南群众代表并讲话。当有人谈到文敏生同志时，康生竟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仅此一句，文敏生同志就被关进监狱多年。

八月四日，听取“彭真专案组”的汇报，并作“指示”：（1）专案工作要“突出政治”，而“突出政治”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搞社会部工作时的“重要经验”和“好传统”。（2）彭真问题要“突出历史问题”，“不要把彭的案子孤立起来，要同刘仁密切联系起来，彭真与刘仁是一个案子。下步的重点应查彭真的日特问题、美特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3）从专案看，刘、邓、彭、罗、陆、杨等老干部不是“老革命”，而是“一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八月五日，同江青一起，策划在中南海院内大规模地批

斗刘少奇同志，并派了两个身分特殊的"中央特派员"，亲临督战。

八月十一日深夜，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并讲话。鉴于林、江、康、陈一伙长期以来所煽动的"打内战"、"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等歪风，至此已造成了严重恶果，康生在这次讲话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动员大家收敛一下。但是他又声明：他所反对的是"自由外串"，不是有组织的外串；是保守派夺解放军的枪，不是"武装左派"。

八月十三日，接见宁夏群众代表，把宁夏"总指挥部"这个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把另一群众组织"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并正式提出"武装造反派"的口号。

八月十四日，指使中联部编印所谓"三降一灭"的材料。

八月十五日，在"刘仁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把外地与此案有关人员，"调到北京审查"。

八月十六日，指示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八月二十二日，接见一兄弟党负责人，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判断一个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或不是马列主义的分水岭"。并让人家清理"刘邓路线的危害"。

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批判"合二而一"时，决定公开点杨献珍的名字，不是"黑指示"，而完全是在他康生"主持"下进行的，叫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黑手"。这次谈话，还大肆攻击各级党校，说"全国各级党校

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山西党校，它完全站在反刘格平、革委会方面，成为保守派的中心"。谈到当时形势时，他又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极力鼓吹"越乱越好"，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

八月二十八日，悍然下令调动青铜峡（宁夏）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十三人。然而康生却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九月一日，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会上，江青主讲，康生敲边鼓。江青号召"北京带头搞本单位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带头保卫革命委员会"，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其间康生多次插话说：江青的讲话"阐明了毛主席的战略大方向问题，不要当作随便讲的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完全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讲的"。

九月五日晚，同江青、姚文元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并讲话。他要大家"提高警惕"，警惕"一小撮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动摇"人民解放军"和"新生革命委员会"。但是，在谈到社会上"抓军内一小撮"的歪风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又竭力推卸责任，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抓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

九月十六日，违背中央的禁令，布置中联部编印毛泽东同志十八年来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九月十七日，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一起，分别接见"天派"、"地派"代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告诉小将，现

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九月二十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会上，他要大家“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市革命委员会”。并责怪一些人“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甚至要打倒谢富治”。

九月二十一日，在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批：“为了配合对王光美和刘仁的审讯，建议将任彬逮捕”。

九月二十二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和“走资派”的“黑手”。他推论说：“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派’不会通过他们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三日，亲自批准将杨献珍逮捕入狱。

九月二十四日，出席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驻京单位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欢庆本系统大联合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在京集训和开会的军队干部并讲话。说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学习不够，思想警惕不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上经验上准备不足，不免犯这样那样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是希望大家通过参加这次集训，“把各种消极的错误想法加以消除”。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同张春桥、吴法宪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并讲话。说：为了解决江苏问题，“首先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

九月底，鉴于王、关被揪出，康生突然下令中联部停止编

印《毛主席同外宾的谈话记录》的工作。

十月八日，李广文贴大字报揭露康生的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陈伯达等人立即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李逮捕。

十月十八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李广文同社会上的反动活动起码有间接联系”。还说“现在北京两大派，北大、清华、人大三红、北航、外语学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在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利用其子弟来反我。”

十月二十二日，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赞扬他们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告诫他们要“防止走资派作垂死挣扎，破坏大好形势”。并针对各地贴大字报反康生的情况故作镇静地说：“在安徽各处有贴我的大字报，要打倒我，我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等个别同志的错误，来反对我，而王力、关锋等恰恰是我们把他们揭露出来的。”

十月二十五日，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干部。接见中，攻击中组部“长期以来，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总是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攻击中监委什么人都要，“实际上成了党内的政协”。说中组部、中监委在审查干部时，“总是打苍蝇保老虎。”

十一月一日，同陈伯达、江青一起第六次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要大家回去迅速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并“系统地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他还说：“中央文革现在代替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许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十一月×日，康生等人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一

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三十一名干部和家属“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九十二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十一月十三日，同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领导小组成员谈修改党章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同外宾谈话，继续兜售“三个里程碑”的谬论，并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逃兵”，陶铸、彭真同志“被捕叛变”，诬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安子文等同志“毁掉敌伪档案”。

十一月十九日，接见一群众组织并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

十二月九日，接见中央党校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谈他学习毛泽东同志于两天前（即十二月七日）所作的关于批评“大树特树”批示的“体会”。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又说，他“为了深刻理解这个指示，有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翻阅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边翻边想，越加感到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他学习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

十二月十二日，以“攻击江青，调查康生”的罪名，下令将李一夫逮捕押送天津公安局。并特地告诉天津公安局局长说：“李一夫是坏人，要加紧审讯”。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说“专案工作，从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今已有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揪出了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隐患”。还说：“中央文革有个设想，在春节

前两个月内，把主要案件审查完，拿出报告来”。“特别是为了迎接‘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审查）要抓紧。”

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要“劝退”或“开除”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起作用的毫无革命干劲”的党员；“要发动群众来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路线”。

一九六八年　　七十岁

一月×日，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是专门在全国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据点”。并提出要把“中组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一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在组织上抓坏人”，“要在‘九大’之前把党校过去的一些坏头头弄清楚”。并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表示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作出结论”。

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

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工作，使敌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

一月二十一日，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个“叛徒”，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并当场宣布将赵逮捕。此后，在康、谢的煽动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致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六日，向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直接布置任务说：中央党校“要搞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其中，“要突出主席路线这根红线”，“突出林副主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

一月二十九日，同外宾谈话。攻击彭德怀同志一九五七年出国访问“是一个阴谋”，是“想看看人家是怎样把议会放在党和政府之上的”。

二月二日，在中央一办的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等反革命分子，他们使用一批所谓‘逆用特情’，是否根据罗瑞卿、彭真的决定？他们经常给敌人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二月四日，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汇报揪“内人党”的情况。听后，康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揪。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江青对内蒙揪“内人党”的活动也极表赞赏。这样，内蒙在康、江的支持下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

二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天津市革委会、群众和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说：天津出现话剧《新时代的狂人》一事说明“天津文艺界里，有周扬黑线”，并通过这条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他们想“瓦解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搞复辟活动”。

三月二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刘仁专案重点是彻底弄清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逆用特情’主要由公安局军管会及公安部搞。刘专案应研究工作中心，如焚毁电台及同贺龙案的关系等等。”

三月×日，在中央党校“李广文专案组”报送的《简报》上作批：“要追问李广文同反革命分子王任重的关系、联系”。

三月十八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大讲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一点，康生诬陷了许多同志，说刘少奇是四次被捕自首的“大叛徒”，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邓小平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入党，是个特务分子”，“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谭震林是叛徒”等等。此次接见，康还为他在六三年给潘天寿画展所写的“画坛师首，艺苑班头”的题词辩解说，“那是为了压陈半丁，因为此人在北京太骄傲。”

三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学习班全体学员并讲话。这次讲话除了重复三天前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之外，还强调“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说北京“有一小撮人替二

月逆流翻案”，叫嚷要对此“坚决打击”，“决不容许”。

三月初至二十二日，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一起，合伙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宣布将傅崇碧同志撤职审查，限令即刻离京。康生还一再叫嚷：“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

三月二十三日，派人去逼傅崇碧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三同志，勒令傅交代“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

三月二十四日，出席林彪主持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的大会。会上，康生大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所谓五个阶段的大胜利：第一阶段，“揪出了彭、罗、陆、杨”；第二阶段，“揭露了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第三阶段，揭露了“陶铸的反革命面目”和“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反动逆流’”；第四阶段，“揭露了王、关、戚”；“现在又揭露了杨、余、傅”。他还特别强调说：所有“这些胜利的取得，应当说江青起了极大的作用，建立了突出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个胜利中间，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最后又说：杨、余、傅的“错误”，从总的方面讲就是“要为刘邓翻案”、“为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为宣布“打倒杨、余、傅”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会上，康生恶毒攻击杨、余、傅是“阴谋家”、“两面派”，是“党内的极大隐患”，是“王、关、戚的后台”，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叫嚷坚决“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切阴谋活动”。

四月×日，第二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够证明

刘少奇同志是个大叛徒的材料。

四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在“五一”前成立中央党校“革委会”。同时让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

四月十三日，同曹轶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郭玉峰等一起接见派驻中联部的军管小组。指示他们搞所谓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编印毛泽东同志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四月十四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详细介绍中联部情况。说“这个部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外国人。他们资格老，好多是外国党的创始人，对中国党不那么信服。这个部是王稼祥的烂摊子，特务、叛徒也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编送的中央党校第二十期《大字报选辑》上作长篇批示，让中央党校继续抓杨献珍、侯维煜的“里通外国问题”。说：这个问题“不是孤立事件”，“必须同刘少奇为苏修做特务联系起来看”。

五月四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此次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去苏联是经过国民党介绍的”，“在东北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并指示“把伍修权关起来”。

五月六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在中央党校“联系抓坏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五月×日，伙同谢富治制造“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冯基平等，“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不久，将一千六百名干警加上“特

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冯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狱。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陈等人一起，盗用中央名义，发布所谓《五一二命令》，把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说体委是"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的黑据点"。

五月十六日，接见贺龙专案组全体成员，攻击贺"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我们打过仗，一直是斗争的"。说：通过贺的专案，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鼓吹文化大革命对欧洲影响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说"联络部也好，中组部也好，过去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坏人"。

五月三十日，继续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说"中联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王的路线"。在这点上，是"同中组部、中央党校是大致相同的"。谈到四川时，康又攻击四川是"刘、邓、贺（龙）、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马明方专案组"的全体成员。接见中，诬蔑马明方等同志"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的党，投敌叛变"，说明马明方"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并批评"专案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专案组"要"政治挂

帅"，要有"坚强的阶级斗争观念"。还说在搞专案过程中"有点逼供信也是难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联部军管小组《关于编印"毛主席谈话记录"和"三降一灭材料"的报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党校书亭同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有：

（1）抱怨中央党校对邓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党校今后一面搞邓的材料，一面写批邓的文章。

（2）胡说中央党校历届校长没一个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第三任校长李卓然是"张国焘反党集团的人"；后来的杨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3）竭力为"忠字舞"，"语录操"进行辩解，说这些虽是"形式的东西"，但"同陆定一说学毛著是贴标签、庸俗化完全是两回事"。陆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4）大谈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所谓"三次大论战"。说第一次是五二年杨献珍"奉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杨献珍抛出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直接反对毛主席，配合苏修米丁、尤金所谓理论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5）指示中央党校“编一下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编印《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问题。说：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计”。并嘱咐军管小组说：“编出后，暂时不要印，先把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录交给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样给我审阅一下。”

七月二日，收到中联部编印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第一集。

七月十八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中联部《谈话记录》编辑小组说：“摘编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不要印了，已经搞出的全部销毁，而且要部领导和军代表派人监烧。”

七月二十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先是表扬他们行动快，已经编出了一本主席的谈话，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一件大事，还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事搞不好，要犯错误，不要轻易付印。”“现在最好用另一种办法搞，就是先整刘、邓、王反主席的东西，这样搞既稳妥，又适合当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将自己亲手分类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单“呈送”江青。在这个名单中，被划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二十九人，靠边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八大选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竟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谢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搞，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联部的部分同志进行谈话，肆意攻击诬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伍修权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谢富治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据此批文，谢富治等人陆续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到七〇年二月结束，历时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马明方专案组"人员谈话，说该专案有以下几个问题可定："（1）叛徒问题，可定；（2）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3）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4）特嫌问题，可定；（5）高岗反党集团问题，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候补委员，有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诬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又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皆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两个报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有六十人遭诬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国政协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诬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党校根据康指示编印的《林彪选集》和《林彪语录》样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

（1）鼓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或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

（2）极力保护蒯大富、聂元梓。说："蒯大富不论犯多大

错误都不能否定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也不能否定聂元梓，因为聂元梓总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如果把他们否定了，刘少奇不就对了。"

（3）宣传党校要斗批散。说："党校的精简机构要大搞，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斗批散，总而言之党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说专案组关于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的推断，"我完全可以证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曹海波错误言论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死党，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骨干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从吾在党校的钉子。这个坏蛋，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批判，……党校应派人到武汉将这个坏蛋揪回来，要他交待问题。"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整党。康说：整党是"更新"，不是"复旧"。指责"很多地方把整党叫做'恢复党'，结果搞成了简单地复旧"，埋怨许多地方整党"限于旧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没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势下的新创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宾谈话中，不顾各国具体情况，一概地反对各国共产党参加本国的议会选举。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专案组一起研究上天安门的名单。他说："这次研究那个能上天安门，那个不能上，这次基本定

完"。有些人，只要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突然讲起自己的历史，说他虽然"大都在敌占区工作"，但由于"群众掩护"，始终"没有被敌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他对修改党章的意见。说将来的党章关于党员一章中"不要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写"党员必须做到什么"；关于组织机构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层"合并起来写"，"要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监委会可以不要"。

九月二十八日，收阅中联部上报的《关于王稼祥的材料》，阅后批示："很好"。

十月五日，同阿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中，攻击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作的导言，"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是"恩格斯当时的一个幻想"，胡说这种思想残余，至今"还没有彻底肃清"，然而"不肃清这种东西，就不能走上马列主义的革命道路"。此次谈话，还诬陷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并透露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十月十三日，康、曹指示中央党校要为"九大"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材料时，一定要"集中突出"，"要抓里通外国和反毛泽东思想问题"，以便将来在"九大"会议上"把问题一个个，一步步拿出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

会上，抛出了他们合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这一《报告》，从而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与此同时，康生却肉麻地吹捧林彪，说林在全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宣扬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力主张把林写入党章。

十一月四日，通过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下达指示说：“刘邓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而且清除了刘邓，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还说：“将来开‘九大’时，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要一个一个的都端出来。看到‘九大’时，你们中央党校还有那些人能定案，能定的就定下来。”

十一月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要点：

（1）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2）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年的历史中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被毛主席解决了。

（3）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怎样解决？毛主席肯定只能用不断革命来解决。毛主席所讲的不断革命同马克思所讲的不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要不断革命，毛主席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要继续革命。

十一月十日，给中央专案组打电话说：“彭真、刘仁问题，

能定几个定几个。要抓紧，准备迎接‘九大’”。

十一月十一日，再次向中央专案组电话指示说：“(一)刘仁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入军调部(或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公安局变成间谍中心。日特问题，可先写一个简报，下下毛毛雨，然后再定。叛徒问题，可挂一下。(二)五个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委，于十二月中旬搞出个眉目来，彭真(问题)半个月内(二十五日前)搞出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会谈。会谈中极力吹捧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说确定林为接班人“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并对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义正词严的发言进行了所谓“反驳”。会谈中还肆意说该党“故”的不少，“新”的不多，因而“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问题”。

同一天，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军代表说：“‘二月逆流’问题要大讲，要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来声讨，来揭发和批判。”

十二月十日，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传达康的指示说：“林副主席的语录，以后再印”。

十二月底，出席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召集的各专案组汇报会。当汇报到审讯王云程（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后来被捕叛变。解放后一直在押。）情况时，康生说：“这家伙罪大恶极，要杀掉，你们回去马上写个报告送我们批一下。”

一九六九年　　七十一岁

一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处决王云程的问题。

一月上旬，由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不能用，改由康生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主笔，重新起草。

一月十一日，将六八年九月编辑印出的《林彪选集》样本退给中央党校，并让其全部封存。

二月四日，同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关于挖"内人党"情况汇报。这时，内蒙挖"内人党"问题已造成严重恶果。但康听了汇报之后却鼓动内蒙继续挖下去，说："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你们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从此之后，内蒙挖"内人党"就搞得更凶了。

二月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大谈分工问题。他说："不管搞哪行，越是分工细，越是专业化"，就"越修"。因为分工细了，专了，思想就越易"片面"、"不辩证"，"看不到整体、全局"，"就会使机构庞大，人员增加，思想复杂。"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军代表报送的《侯维煜专案进展情况简报》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恶：（1）反对学习主席著作，拒绝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2）继彭真、邓小平、杨尚昆之后为中直党委书记，掌握中直机关干部；（3）里通外国。"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见中联部、高级党校、中组部的领导小组的成员，谈这三个机关的共同特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叛徒”，而且，这些“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

三月下旬，组织人为他起草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草毕，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审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其间，曾于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党章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了大会发言。会上，康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讲无产阶级政党的所谓“五条”标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三条”标准。此次讲话还说，在经济建设上两条路线的分歧就在于：一是主张“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张“经济、技术占第一位”。又说：谁执行后条路线谁就会变成“坏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只有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所以，“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

斗争"，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处。此次指示说：抄来的东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个文件中亲笔批示："王世英、南汉宸、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集团"。

九月×日，指令中央党校赵纪彬写《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又窜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拿走八十回的《石头记》改写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宾谈话，吹捧林彪是"我们全党阐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说他"不但是马列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学生"，确定他为接班人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证毛主席对世界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欧洲一个代表团谈话，吹捧林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确定他为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

十月四日，就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旧高级党校反革命罪行报告》发表意见，说："《报告》文字还好，但两条路线斗争写的不清。党校这么多问题，怎么搞出来的呢？是斗出来的，是从陈伯达、康生、曹轶欧、造反派到军代表一条线贯下来的。'十大斗争'写的不是很清

楚，斗争写的不明确。这个问题不是对那个人谦虚问题。这个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虑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对全党有作用，将来二中全会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再次谈到王云程的处置问题。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云程、卢福坦终于在本月底被秘密处决。

十月十八日，又窜到北京文管处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韩素音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区别，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列宁如何同“唯生产力论”进行所谓“有力斗争”等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其间，多次鼓吹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用到整党上来，实行开门整党”，搞“吐（故）、挂（暂挂）、纳（新）”。

同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在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整党建党一定要“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达到“增强党性”，“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说所谓“增强党性”，就是增强“林副主席所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加强“领袖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联部领导成员，告诉他们，“在下边要独立地用阶级的观念，战备的观点，去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没有敌情观点，就没有战备观点。”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外宾谈话，说“我国历代工会领导人都犯过错误”，其错误就在于，“在秘密环境中搞经济主义，脱

离政治；在公开环境中是强调工会独立，脱离党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硬要该党以我党“九大”党章为“根据”修改党章。此次谈话中，还攻击我党中监委“糟得很”，“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宣扬“九大”党章取消党员预备期和取消监委会的做法好。

一九七〇年　七十二岁

年初，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快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砚台。

二月十四日，在其掠夺的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扉页上，解释他为什么盖用“归公”印章。

四月十七、十八日，在全国整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按“九大”新党章，把我们党建成一个“三忠于、四无限”，能“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党。

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整建党座谈会上，就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问题谈“纳新”的重要性。说“纳新”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表现，“九大”时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今后召开四届人大时还要注意这个问题。

四月底，同陈伯达一起窜到北京市文管处大窃图书文物。

五月二日，由康生打头阵，随后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一齐拥到北京文管处。他们翻箱倒柜，各揽一摊，把当时库存珍贵文物几乎劫掠一空。

五月四日，接见中央林枫专案组和中央党校专案组全体

成员，指示他们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办案。

五月二十八日，召集中联部、中央党校部分人员发表讲话，说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吹捧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针，是学习经典著作的“最根本的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国兄弟党代表团谈如何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单线联系是修正主义的办法，实际是取消党的办法。”

七月二十四日，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介绍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的好处，劝其也要学中国的做法，搞干部下放劳动。

七月二十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一、二、三办正副组长，要他们重视修改宪法，注意在办案中“突出政治”。

八月下旬，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同林彪、陈伯达一起秘密炮制称“天才”的语录。

八月底，为了摆脱困境，以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康、曹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请外地学哲学积极分子来京宣讲。

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组织宣传组，康生被任命为该组组长。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地方党代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歪曲毛泽东同志发出的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说

"这实际上是反对刘少奇的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组织上的资本主义道路。"

十一月二日，指示中央党校，在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时，要"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贯彻林副主席的三十字方针和七字经。"

十一月十三日，在钓鱼台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大谈解放以来高级党校的所谓反对"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论"等三次大的"理论斗争"，说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贯彻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进一步批判这些问题"，特别是"集中批判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论点"。

十月中旬，病倒。

一九七一年　　七十三岁

继续生病。

二月，抱病为江青修改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稿。

四月底，江青多次建议康生在"五一"那天上天安门城楼，说："久不出面，这样做有好处"。康生对此甚为感激。但终因身体欠佳，未能如愿。

七月六日，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把《林彪选集》部分销毁。

九月十三日，得知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草原之后，曹轶欧立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通报此事，并说："康生恨死林彪了"。

一九七二年　　七十四岁

继续生病。

一九七三年　　七十五岁

继续生病。

×月，收到赵纪彬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增补稿，康极为赞赏。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会议结束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日，出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会上，除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四年　　七十六岁

一月二十七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其转告×××："赶紧再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并将《庄子·盗跖篇》译为白话。"×××当即表示乐于接受这个任务。

二月三日，通过秘书向江青写信报告他所布置给×××的任务。

二月二十二日，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转送江青；《痛骂》一文立即送《人民日报》发表。从此之后，影射史学成为江青得心应手的反党武器。

三月十日，江青亲笔写信向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

推荐康生授意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三月二十七日，收到江青送来的《庄子·盗跖篇》译文修改本，立刻批示道：“完全同意江青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编写材料时，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

四月，指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迅速编写《鲁迅批孔言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料。

五月，指示其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康老说他身体不好，关于《鲁迅批孔言论辑录》等几个材料搞成后直接寄给江青同志，但要写上‘遵领导嘱咐送的’”。

六月，病情严重，委托江青代管中央党校唐晓文写作班子。

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江青带迟群等人和梁效、唐晓文两个写作班子，浩浩荡荡地去天津进行反党活动。康生对江青一伙的天津之行十分重视和赞赏，并看了天津之行的全部《简报》。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重病中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又说：“现在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但是我不甘心死。”

一九七五年　七十七岁

继续生病。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届人大在京举行。康生因病未能出席。但仍被大会选为主席团的二十三位常务主席之一。会议结束时，继续被大会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五月，把外交部的唐闻生、王海容两同志叫到病床前，询问毛泽东同志批评“四人帮”的具体内容。唐、王转述后。康点头沉思，没说什么话。

八月，再次把唐闻生、王海容叫到病床前，一面表白自己“没有叛变”，另方面又说“江青、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让唐、王将江、张的历史问题转告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十六日，病死，了此一生。但其反革命面目并没有随其死亡而被揭露出来，相反，在讣告中还戴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项桂冠。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康生评传
作者=仲侃
页数=437
SS号=10324342
出版日期=1982年8月第1版